

宣傳心理研究

FS-5
S03

耕耘版 薩空了譯

立市
女一
股書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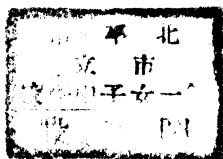
宣傳心理研究

薩空了編譯



耕耘出版社

• 1 9 4 8 •



宣 傳 心 理 研 究

編譯者 薩 丁 斯

發行人 黃 哲 賢

發行所 聯 華 出 版 社
上海龍華路八十號

分發行所 聯 華 書 店
重慶·漢口·成都·

· 有 所 權 版 ·

版 二 第 月 一 年 七 十 三

序

本書係就英人華特 (Amber Blanco White) 所著「新宣傳」(The New Propaganda) 一書編譯而成。

華特的書出版於一九三九年，寫作於一九三七——三八年間，他自料不到第二次歐戰在他的書出版後不久就會爆發，並發展成第二次世界大戰，因此這本書要介紹給今日中國的讀者，自非改寫過不可，再則他寫書的目的，與我想介紹這本書的目的，略有不同，他的目的在討論納粹法西斯的宣傳方法，是否可為英國的進政黨採用，我的目的是在使中國同胞了解納粹法西斯宣傳的性質，影響和後果。目的不同，也是使我不翻譯而編譯的原因。爲了這兩個原因，使我對華特的書有許多增添與刪節，但書中大部分的內容仍是華特的，所以特以編譯二字，說明我所作的這一工作的性質，兼示不擬掠美之意。

我第一次見到這本書，記得是一九四〇年在重慶鄒韜奮兄的案頭，曾借來翻閱了一遍，打算譯出，但以種種事務的糾纏，未能如願。前年到桂，又在邱茉莉女士那裏借到這本書，目的仍是想譯，又以忙亂未即動手。中間這書且經過一次失而復得的故事，現在總算已把這工作作完，了却了一樁懷了三年的心願。

我所以想介紹這本書，最中心的目的只是想叫大家更進一步了解什麼是納粹法西斯主義。說一句該打的話，我感覺我們的同胞有許多許多還不大真懂納粹法西斯主義是一種什麼鬼玩藝，雖然他們已很堅決的表示要打倒牠們了。這話也許說的太直爽了一點，然而事實的確如此，如果不信，請看下文：

『我們先拿德國的鏡子來照一照，大家都知道，在第一次歐戰德國戰敗之後，牠們有的兵艦，輪船，大砲，飛機等等通通被沒收，當時德國人有一句話：「你們儘管拿吧，但是我要告訴你們：我們有一樣東西，是你們拿不走的。什麼東西？就是我們德國人的頭腦，日爾曼民族的精神！」他們這個話說的很深刻，是一句有歷史意義的話，但是德國人終算倒了霉，第一次大

戰倒霍在黷武主義的威廉第二手上，這次戰爭又倒霍在納粹主義的希特勒手上，可是我們要評量一個民族倒不能單以成敗論英雄，儘管現在希特勒太誇大，說德國民族是英雄民族，統治民族，優秀民族，而且終於把整個民族瘋狂的盲目的拉進歷史的火坑，然而你看他們那種文化建設，那裏精神造詣，我們能一概抹煞嗎？」

看了這段話我們不能說說這話的人似乎不站在反對納粹的立場上，但誰又能說他懂得納粹主義爲什麼應當反對！這段話是一篇極長的講演中之一段，曾刊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下旬的桂林一家報紙中，說這話的先生還是一位掌握中國政治宣傳大權的當局，他的見解竟以爲希特勒只是太誇大，而希特勒治下還有不應抹煞的文化建設，精神造詣，而我們中國人且不應以成敗論英雄，就是他用的「倒霍」之類的字眼，都帶有深爲惋惜的意味，如果站在這種立場上反納粹，只是爲了他們今日不幸倒了霍而已，如果他們不倒霍，誰能擔保他不變反對爲同情？像這位先生一類的人，我想或者很不少，比他更荒唐的也許一樣有，所以我感覺深入的

研究納粹法西斯主義是什麼，為什麼應當反對，在中國今日依然很需要。

此外我以為納粹法西斯主義不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之後在世界上便歸消滅，似乎還有待事實證明。稻香村歇業改名稱香春重張，是一種可能。還有雖為稻香村的分店，經營一樣的營業，只以未掛稻香村招牌，既可不受歇業影響；在世間仍留下稻香村的根基，又是一種可能。前者，如愛麥虞限二世與巴多格里奧成為繼續統治義大利的人，便有點類似；後者，如佛朗哥將軍戰後仍能繼續統治西班牙，就是最好的證例。納粹法西斯主義在世間既有可能遊魂不散，甚至借屍還魂，我們自不能不切實防範，最好的防範方法當然是深入的了解牠，為此，我才作了這一工作。

我介紹這本書的第二目的，是因為補還可以叫我們了解許多納粹法西斯宣傳的伎倆。在今日的社會中生存，誰也已不能逃避的了宣傳的影響，你總要看一份報，一二份雜誌，幾本書，或者看看電影，戲劇，偶爾參加一下講演會，音樂會，畫展，乃至在街頭聽聽無線電廣播，於是你就已被包括在接受宣傳的羣衆之內

了。今日不論是誰，在這地球上生活，便躲不開宣傳的影響，除非處在與世隔絕的荒島上。一個桂林小雜貨店的老板，半生沒看過一張報，他只能避免宣傳的直接影響，而躲不過間接的影響，報載火柴缺貨時，他也會把火柴收起來不賣，便是最好的說明。在宣傳包圍中生活，認識宣傳的性質及其作用，自然是生存必需常識之一，納粹法西斯宣傳手法是很妙的，納粹法西斯主義既不見得會因這次大戰中德義日軸心之覆滅而在世界上絕滅了解他們的手法，對今後在這世界中生存的人自有很高的價值，就是爲這一點，我以爲大家也應當讀一讀這本書。

介紹這本書還有第三個目的，就是這本書的研究中心放在心理分析上，依據奧國名心理學弗洛特（Freud）的學說試用於研究政治經濟現象，這也是一種新的嘗試，對中國研究心理學的人們，尤其相當的價值，而研究政治經濟學的人們，由此也可以進一步知道人類心理對於政治經濟現象同樣有影響，而提示他們在判斷實際的社會現象時，也須兼注意到人類的心理，那麼無疑的必可促使他們的判斷，更能臻於精確。

總之，這是一本什麼人都可一讀的書。研究政治，經濟，心理，新聞，乃至不作什麼專門研究，而願意具備生活應具的常識的人皆不妨看看，我想大家多少皆可由此得點裨益的。

最後我還擬表示一點希望。我以為在中國，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是早已有譯本，但在歐洲流行的駁斥「我的奮鬥」的書，却至今沒有人譯過。這不能說不是使中國爭取民主的運動，不能迅速積極展開的緣由之一。所以在這本書印出之後，盼望在中國能多有一些有價值的反納粹法西斯主義和推進民主運動的書繼續印行。既可促當前殘餘的法西斯日本早日崩潰，且有益於戰後永絕納粹法西斯主義的死灰復燃。即就建立一個強大的，幸福的，自由的，真正民主的新中國而言，這種努力也不可少。願中國文化界的朋友都積極的來參加這一思想上的戰鬥！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春節燈下寫成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改寫

目錄

序

第一部 獨裁者心目中的宣傳

第一章 導言……………一

第二章 訴諸理性與訴諸感情……………七

第三章 現代宣傳的性質……………三一

第四章 使國內團結的方法……………四八

第五章 敵人的用處……………五六

第二部 人民接受宣傳的緣因

第六章 論羣衆……………七三

第七章	論領袖	九五
第八章	焦急，犯罪意念與敵意	一二四
第九章	人民與統治者	一三八
第十章	幸福的代用品	一四八
第三部 獨裁政府的宣傳統治所得的心理效果		
第十一章	社會制度的穩固性	一六一
第十二章	納粹法西斯的門面	一七一
第十三章	老一輩的人民	一八八
第十四章	新一代的人民	二一〇
第十五章	納粹法西斯國家的知識恐慌	二三三
第十六章	戰爭促成納粹法西斯政權的崩潰	二四五

第一部

獨裁者心目中的宣傳

第一章 導言

以宣傳爲工具尤其作政治工具，當然是由來已久。在中國，商鞅的布告移竿重賞又布告移竿重懲的故事，就是以宣傳樹政府的威信。但宣傳之成爲主要的政治工具，却是二十世紀初，才開始於歐洲。因爲只有在二十世紀的物質文明基礎上，宣傳才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威力。高速度的印刷機，無線電……使宣傳在政治上成爲比槍砲威力更大的武器。也就因爲宣傳成了政治上最有力的武器，於是才爲二十世紀歐洲國家的政府所重視，一反過去歷史上的慣例，把宣傳緊抓在政府手中作爲政治利器使用。而過去慣以宣傳造成輿論推翻政府的歐洲民衆，却漸漸失掉宣傳這有力的武器了。

在歐洲以宣傳震撼了世界的國家，是納粹主義下的德意志，法西斯主義下的義大利。（社會主義的蘇聯政府雖然也是善於運用宣傳武器的，且較德義運用在先，但對歐美影響不大，因爲過去歐美皆不願細心研究蘇聯。再則蘇聯的運用宣

傳，基本上也與德義不同，以後本書將有較詳分析。此地所以只指出德義，係因事實上世界各國之重視宣傳，確多半由於德義之影響。）希特勒墨索里尼之得掌握政權並不是由於革命，（當然進軍羅馬，不能算是革命）只說是由於宣傳與陰謀僥倖成功。（何以竟能僥倖成功，以後將有詳細解說）他們的成功，大大的增加了宣傳的地位。宣傳遂成了一般國家統治者對內的一種重要工具。

鑒於納粹法西斯政府的利用宣傳，使德義民衆馴順的服從其願望，信其所信，感其所感，甚至犧牲自我的一切利益，相當的成功。於是以為只要善用宣傳，政府遂可為所欲為，民衆無不俯首貼耳，唯命是從。

宣傳是不是這樣一貼萬應靈藥？可使統治者隨心所欲無往不適？——這是本書所擬答復的一個主要問題。

宣傳曾使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對內獨裁獲得相當的成功，並使效尤的日本齷齪主義者，有了相當的成就，都是事實，甚至到今天，墨索里尼雖已場台，希特勒東條鬻雖在同盟國的嚴重打擊下，却仍在頑強支撐，也可說明他們的宣傳政策還

有相當的效力存在，否則，他們便將無疑的崩潰了。希特勒東條輩，現在仍在靠了德日人民的血汗來支撐盟軍的進攻，德日人民爲什麼還肯貢獻其血汗給希特勒東條作垂死前的掙扎？我們都知道德義日三個國家在納粹法西斯勢力掌握政權之前，都是已具規模的民主國家，而這三國都未經大流血的鬥爭即使納粹法西斯掌握了政權。三國民衆，爲什麼就那麼輕易放棄了他們的民權甘作納粹法西斯主義下的奴隸，說是只由於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等的高壓手段，使民衆不能不屈服，是完全可信的麼？如果可信，爲什麼盟軍進攻之後，德日人民還不起來反抗？義大利雖已倒掉了墨索里尼，但也不是人民的力量，而是義王，巴多格里奧與墨索里尼爭奪政權的結果。所以我們不能否認德義日普通民衆相當的受了納粹法西斯宣傳的影響。爲什麼民衆肯接受其虛偽宣傳？——這也是本書所擬解答的一個問題。

要想解答這兩個問題，我們遂不能不很科學的對納粹法西斯政府的宣傳作一番探討。我們必須研究納粹法西斯政府在德義日的國土上執政的時候，德義日的

社會環境如何，及所造成的人民心理如何，我們只有從社會的人類心理的根源上來追尋，不能找的出來德義日三個民主國的民衆何以任納粹法西斯勢力劫奪了政權的緣因。由這裏追尋，我們也遂可以找的出來納粹法西斯勢力終將歸於失敗的因素。

這種研究的意義，與投機政客的看法納粹法西斯勢力強勝時便想投入其懷抱，看到他們日暮途窮，便想跟着起闖打死老虎，是完全不同的。我們是想以純科學的精神來研究這一產生於二十世紀的人類社會中的現象及其運動的因果法則，使人類能夠由此鑒往知來。宣傳這一武器助成了納粹法西斯的政權，釀成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全世界人類直接間接受了無窮的災難，在本書寫作時雖已可斷定納粹法西斯勢力必歸失敗，但盟國的達到勝利之途，依然漫長而艱苦，納粹法西斯勢力雖已必能為民主勢力戰勝，但所出代價也已不為不高，如何接受這一沉痛教訓，今後使納粹法西斯勢力不再死灰復燃，正是我們人類所不能不審慎研究的。我們都已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之芽，即萌生於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果的凡爾

賽約簽字之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果，我們自不希望他成爲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因，但只說不希望是沒有用的，只有以真正的科學研究尋求出一切現象的因果法則作爲行動的指針，才庶幾能收到預期的實效。關於宣傳的研究，雖然不能負荷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全部任務，但這一研究會有裨益於防止方案的構成，却毫無疑問。

研究宣傳除了上述的世界意義之外，縮小範圍，以一個國家爲單位來說，這一研究，可幫助人民了然宣傳與他們有切身的利害而能知所警戒；也可使政府了然宣傳的真價值，濫用不只無利且有弊害，不復以宣傳爲政治的萬應靈藥，而認清只有真正民主始能使國內安定。對一個國家的人民與政府自也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所以本書的研究中心雖置於納粹法西斯國家的宣傳政策上，但其目的却不只是爲了研究他們的宣傳政策，而是希望讀者能夠舉一反三，由此攝取到更有用的實際知識。

這本書研究的方法注意於社會的根源，尤注重於人類心理的分析，採用奧國現代心理學大師弗洛特的學說，以之分析當前的政治經濟現象，這是一種新的嘗試，希望讀者們能夠不誤認牠為一本普通的反納粹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宣傳刊物，而忽略了他在學術上的價值！

第二章 訴諸理性與訴諸感情

人類在動物中之能成爲萬物之靈，是因爲他能製造工具和合作。一直到今天，不論是在征服自然以增加人類幸福方面，或在國家形態仍存的現世界上，想使一個國家不落他國之後，製造工具和合作這兩個條件，仍爲決定的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民主國家的同盟之所以必能戰勝納粹法西斯國家，也是因爲（一）在製造工具上佔了優勢，（二）民主國家間以民主爲號召而產生的合作遠勝於納粹法西斯國家。

合作既爲人類求生存的主要條件之一，遂不能不講求合作的方式，於是產生了人類歷史上的種種組織形式。氏族部落的形成，政府組織的出現，都是適應着人類社會構造之發展而產生的。在人類中政府這組織由其開始出現到如今，隨着社會性質的發展，在世界上已有了種種的演變，但其主要任務應爲組織大多數人民合作，爭取共同的生存，是不可能改變的，一個政府如已不能肩負這責任，牠

自然會被取稍，而代以新的政府組織，所以任何政府都要設法求民衆的擁護，因為沒有民衆的擁護，牠即將不可能存在。

雖然人類社會自從原始社會步入封建社會之後，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而造成人類間的階級，政府的形成也是一部分人統治大多數人的一種組織，然而政府雖爲統治組織，但也決少不得民衆的合作，否則那組織就必然的要解體。有人把人類的歷史叫作一部「相斫書」。人類之所以不斷相斫，就是爲了政府組織不能適合人類要求，成爲組織人類合作的機構的原故。社會不斷在發展，政府機構不能順應着社會的發展而進步，甚至想阻止那發展，牠是在夢想爲了保持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妨礙大多數人的利益，完全違反了大多數人希望他們領導合作共存的願望，於是遂沒有不被大多數人把他推倒另建新政府之理。少數人抓住政權，不適應社會的發展而自爲改進，且不顧大衆福利想阻害社會進步的現象不能絕跡，政府之被推翻的事實也將不斷發生這乃是必然的。所以不論什麼形式的政府，無不以取得民衆的擁護爲第一件事。過去專制帝王的愛民表示，今日爲民公僕的總

統的願爲民衆之福利而服務的宣言，都是志在爭取民衆的擁護以求自保。由帝王的君臨萬姓，到總統的爲民公僕，這種演變就是一類社會進步的表徵。人類社會的進步是不可能阻止的，人類完全平等的合作，以及能組織人類合作於完全平等基礎上的機構，一定可以代替了以少數人治多數人的政府形式下的人類合作。也就是孫中山先生所說的「世界大同」一定會實現。不過這中間還有漫長而艱苦的路程，要靠我們努力去斬荆披棘，才有達到的可能。

以上這一段話，是想試以最少的話，說明政府與民衆的關係，以及過去現在政府的任務，及其未來的展望，因爲我們必須略具這種認識才能進一步研討政府與宣傳。

政府在今日的社會中顯然牠的地位還是站在民衆的上面的，經濟環境決定着這事實，民衆只能接受這種現實的關係。人類不合作即不能生存，歷史，環境，造成了這一合作的組織形式，他們自然只好在這形式下求生存，否則其生存將不免遭遇到很大的危機。英美即使是最不滿意現政府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也是

支持現政府的，因為不如此，將使他遭遇覆巢之下無完卵的危險。不過民衆雖然接受其所屬的政府的形式，却仍永遠希望着政府進步，因為政府進步一定可帶給他們幸福。如果是政府開倒車，那也可以危及他的生存，（如橫征暴斂）在無外的危機時，政府如開倒車，民衆在國內遂不能不爲生存而擬改造一下領導他們合作的政府了。

政府在現在既是在民衆上面的一羣人組成的機構，他們是必然會以民衆的痛苦疊集成自己的幸福的，他們也深知這將招致民衆的不滿，於是遂不能不一面不放鬆自己的幸福，一面又不斷的努力平息民衆的不滿，以求奠政府於磐石之安。在這情勢下，在二十世紀的物質文明基礎上，政府遂不能不以「宣傳」來團結民衆，爭取民衆的向心作用，打消其離心可能性了。

利用一切可作宣傳的工具，儘量對民衆作有利政府的宣傳，全世界上的政府都是一天比一天更注意的在進行着。報紙，無線電廣播，電影就是今日政府作宣傳最有效的武器。

宣傳的目的既是在爭取人民的向心作用，又因為人類是在不斷進步着，過去任何政府的宣傳，遼大都以接近當時當地一般民衆的進步理想爲內容，以求民衆能擁護其政權續持。這一類宣傳都是以訴諸民衆的理性爲目的。

中國清末時的宣布籌備立憲，在愛新覺羅皇族來說自是對民衆的一大讓步，他們雖根本不願意，但迫於民意不能不宣布籌備。宣布籌備的確又延續了清朝幾年壽命，到後來他們並無真心實行立憲，昭然於天下之後，於是清朝遂不能不爲革命勢力所摧毀了。

當宣布籌備立憲，派五大臣出洋時，就是前清政府想以一種訴諸民衆理性的宣傳，延續其政府的生命。當時民意反對專制政體，是一致的，不過其中又分爲君主立憲與民主立憲兩派，前清政府知道專制政體已無續持可能。君主立憲，對愛新覺羅氏說，他們一家還可世代作皇帝，比民主立憲要把他們降爲平民有利多了，所以才採取了宣布籌備立憲的政策。當時勸愛新覺羅氏接受君主立憲要求的人，實是他們的一大忠奴，因爲這計劃如真被認真執行，其政府生命是一定會延

長的，只以他們仍無誠意，結果遂招致了整個的覆滅。

所以不論任何政府，新王即位，新總統就職，新內閣成立，乃至一個省行政當局就職，一定要宣佈一個施政方針。這個施政方針，一定是針對着當時當地的民衆要求而講的話，實行不實行是另一問題，但宣傳時一定要宣傳的頭頭是道。所說的方針，訴諸民衆的理性，必須合乎當時民衆公認的真理，否則將無以使全國民衆團結一致擁護這個政府。

「理性」的歸依是真理。與「理性」尖銳對立着的是「感情」。人之異於禽獸的就是因爲他們的理性發達，理性能夠控制住其感情。一個政府要說服他的民衆，信任他的政策，自須以理性來說服，違反理性的政策，自己說起來就不響亮，希望他人信從的可能，自然更少。

不過想以理性團結民衆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工作，尤其是民衆知識水準高低懸殊過甚的國家中，一定要經過很長久的努力才能成功，因爲民衆知識過低時，對真理的認識也會很遲緩。

納粹法西斯政府對這一點認識的很清楚，他們以為以理性使盲目的民衆信仰，功效太小了。希特拉曾說過，只在你以為知識份子有說服的必要時，才用的着理性。至於羣衆，是完全「無理性」的，對他們訴諸理性，不但是浪費時間而且是自我麻煩。所以他曾提出來下列的口號：「我們唾棄理性」，「理性可以使你入地獄」。墨索里尼也贊同這意見，因為他們的要求是只要能使人接受其唾棄理性的說法，就可以減少了一切立在理性立場上加諸他們的攻擊。理性本來就是納粹法西斯主義最大的敵人。不過這說法也不是希墨二魔的新發明，他們是從宗教那裏剽竊來的，有些宗教就認為真理是超現世的，是在人類理性領域之外的。希墨二魔不過把這種說法引申到政治經濟領域裏面來而已。

扶倒了理性，自然只好趨向感情，所以希墨二魔就苦心的剗造了許多鼓動民衆感情的口號，代替訴諸民衆的理性。像「亞利安種族」，「我們民族的傳統」，「我們不可遏阻的志願」等等的口號都是在這基礎上提出來的。日本的「八紘一宇」，「神明子孫」，也是同樣的一套。

但是希特勒是不拋棄「理論」的。在他的「我的奮鬥」中曾說：對一種世界性的理論，只有用另一種世界性的理論去戰勝牠，僅憑武力去遏阻是沒有用的。

俾斯麥有整個國家的權勢爲後盾，但不能消滅德國的社會主義就是明證。所以一定要以理論反理論再以武力爲輔來壓倒對方。希魔很懂得裝備完全相同的軍隊，如果一方有狂熱的熱情爲了一理個想而作戰，另一方只是僱傭兵，從事沒有目的的防禦戰鬥，後者一定失敗無疑。他尤其自作聰明的以爲「理論」不一定需要合於「理性」，使用一些「無理性」的口號，只要動聽，也能叫士兵爲之效死。

納粹法西斯政府的宣傳當然是根據着希墨輩的這種荒謬理論，納粹法西斯主義是經不起理性的檢討的，所以他們的宣傳不能不離開真理只求「成功」。希墨二魔爲了事實的需要，不惜隨時改變其主義。例如希魔爲要保持他還需要的幾個金融界猶太人時，他曾說「我可以決定誰是猶太人，誰不是猶太人」。到了和日本簽反共協定之後，希魔又欽定了日本人是高貴的亞利安種。墨魔則更乾脆，他說：「權力第一，主義第二」。在這種情形下德國首先提出了「領袖至上主義」

。在這領袖至上主義之下構成了一種新的社會組織，改變了整個的社會生活，成爲民主主義社會的一個鮮明的對照。在這個社會中一切都是由上而下，政治上什麼措置，都是由上面下命令，下面的民衆只有承認，服從。上面的人對下面的民衆作事可以不負責任，只對比他更高的人作事才負責任，如沒有比他更高的人那就儘可爲所欲爲，完全不負責任。於是權利遂只掌握在少數特權階級的手中，尤其是憑了所謂領袖的意志而決定。納粹法西斯政府制度的主要基礎，就在這「絕對集中的專制性質」的「領袖至上主義」上。於是他們的宣傳所追求的，自不會是由理性而得的真理，他們要求的是：「民衆的信仰一致，便於領導。」

的確訴諸理性的宣傳，根本是不利於納粹法西斯政權的，因爲在他們看來除了前面提到過的「收效太慢」之外，還有兩個弱點，一個是牠的效果，在短時期內，只能影響有理性的人民，另一個是在短時期內可能使民衆的意見趨於分歧甚於團結。而最基本的矛盾是前面已說過的納粹法西斯主義，根本就是反理性的。

我們都知道訴諸理性使大家都相信某一結論是真理，並不很容易。在現社會

制度中人類的立場不同，不能不各有偏見。如想使一個工廠老闆和所雇用的勞工，訴諸理性，決定工資，工作時間。要想迅速獲得結論，是不容易的。往往兩方愈訴諸理性，愈有爭辯，愈有爭辯，愈難一致。

還有人類的知識不齊，即使大家都熱心於求得真理，但是各人據以論斷的基
本知識不在一個水準上，所得結論也往往不同。人的「觀點」與所引用的根據，
材料，都可以影響結論。所以以一問題訴諸知識水準不齊一的人的理性，也必然
要產生爭辯，難於一致。

但是真理却終將由爭辯中產生，事實的印證，將使虛心追求真理的人能夠放棄成見，歸於一致。自然科學界中爭辯甚多，但真理一經事實證明，謬說自然消滅。例如地方地圓，之爭，在哥倫布時代地圓說相信的人極少，但今日誰還能否認地球是圓的？不過真理雖終將由事實證明，然在未證明前，大家以理性追求時，見解分歧的可能大於一致，是一定的，而且分歧才能相互印證參考，使兩方的追求日近，真理由分歧到一致，需要相當的時間也是必然的過程。在自然科學研

究上已然如此，在政治上問題就更來的複雜困難，不過原則却仍然不變。一個政府即使採行的政策，是在當時當地最適合國情與真理，最有利老百姓的政策，牠最先能得到的也只是國內大多數進步知識份子的擁護，因為他們訴諸理性，認識了這政府所行政策的正確。至於一般民衆，則要經過相當的時間，一方靠了政府的宣傳，再由事實上證明了政府的宣傳確已兌現，了然於政府政策確有利於自己，才能表示擁護。在未經事實證明之前，國內的反動勢力一定要用種種手段來阻害有利老百姓的政策之實施，他們一定也有一套欺騙宣傳可以淆惑民衆的觀聽，使民衆感覺惶惑，但是一經事實證明，那種欺騙宣傳自然粉碎了。所以即使一個開明進步的政府，想立即獲得全民一致的擁戴也不可能。一定要經過相當的時間，有了事實上的確證，才能獲得。一經獲得這個政府即將相當的鞏固。除非牠又改變了政策，經過民衆以事實證明牠已變了質，變成了反動政府時，牠才會爲民衆所厭棄而又被推翻。

納粹法西斯政權最怕的是民衆的要看「事實」的要求；在求得真理的過程中

民衆一定要「批評」，並要求「答復」，這他們也無法應付。所以他們基本上已必須離開「訴諸理性」。更何況訴諸理性效果之慢，短時期內影響之小，可能引起分歧成分之高，都與他們所希望宣傳者相反，是以其捨棄「理性」乃屬必然。

希特勒雖然唾棄理性，他却主張對一切反對的意見予以「答復」。他高唱「答復一切」，這也是他聰明的地方，因為如果有人攻擊而不答復，這種無抵抗態度，對自己的黨徒將引起恐懼，對一般民衆則增長懷疑。所以必須答復，答復雖然強詞奪理，雖然滿口謊言，但有答復總可安了一些下愚的羣衆。不過希魔的答復一切只是口頭的，另一方，則以高壓手段消滅一切反對言論的發生，如果必不可免時，他就予以「滿口謊言」「強詞奪理」的答復。例如一九三三到一九三四年的冬季德國農村中的貧困，引起了德國民衆的怨言。納粹的宣傳人員對每一地區的民衆都說，其他各區都已恢復繁榮，繁榮不久也會在這一區內實現了。到了第二年的冬天，各地貧困情形更趨嚴重，於是他們改變口吻說，貧困是猶太人造成的。鼓動「排猶」，同時作爲支吾民衆責難的藉口。一說不成再造一說，這也

是納粹法西斯黨徒的慣技。

此外納粹法西斯領袖的不喜歡訴諸理性還有一因，就是訴諸理性，即指示理性比領袖更高，不免有知識份子根據事實否定了領袖的至上地位的危險，所以要獨裁就無論如何不能不否定理性。

否定了訴諸理性的宣傳改操訴諸感情的宣傳，上述的許多短處就都可避免了。訴諸感情的宣傳，比訴諸理性的宣傳不只可以使許多人團結一致，而且收效極快。很有理性的人，在墨索里尼倒台的消息傳來時，他明知道盟國距獲得最後勝利還遠的很，但在許多民衆大放爆竹之際，他也會有愉快的感覺，在一瞬間跟着民衆分享他們勝利已近的興奮感情。一個意大利的農民因為農村太窮想放棄了耕種到都市中去作工人，如果能以理性說服他自很不易，法西斯黨徒到處寫些如下的標語：「墨索里尼，我們將留在農田中工作，因為你也是一個農民，在農田中我們就接近了你跳動着的心」，這標語如能發生效力，那是很快的。

還有訴諸感情的宣傳其效力可能及於一切的人，知識份子也可能一時被激動

，前面已經舉例說明，至於沒有知識的民衆，以及對政治毫無興趣的民衆，更容易被感情宣傳所激動。

訴諸感情的宣傳最爲納粹法西斯宣傳人員所歡迎的主因，還是因爲牠可使他們避免要以事實證明的窘困，和要答復批評的危機。一個聰明的宣傳工作者如果善於左右民衆感情時，民衆不但可以信仰宣傳者所說的一切，甚至他人對他們，對他們所信仰的宣傳，對他們信仰的領袖，有所批評時，他們都會表示不滿，他們接受了宣傳之後猶如他們所信的已成定案，不容再行翻案。因爲一種很強烈的感情佔據了人們的心時，一定生出來一種依據那感情而來的信仰。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們是盟國的人民，我們擁護着保衛民主的戰爭，我們相信盟國的軍隊一定不會虐待軸心國家的民衆。假定軸心國家宣傳盟軍對他們的民衆有虐待情事時，我們起初一定不肯相信。後來不幸竟被許多事實證實了，在理性上講，這一小部分是盟軍的錯誤。我們本應承認這是他們錯誤才對；可是在感情上我們站在盟方，我們就可能說出來這種解嘲的話：「要作雞蛋糕，怎麼能不打碎了雞

蛋？」我們總以為卽或是有虐待他們的事，也一定是因爲那些民衆也不好，虐待或係出於不得已，所以那行爲是可原諒的，甚至認爲誰叫他們不自己起來反抗其政府呢，今日就是受點委曲也是罪有應得。反之如果敵軍對我們有什麼暴行的消息傳來，我們一定立即相信，並認所有報告的情形，一定都是事實。

人類憑感情決定一切事時常常有類似的情形。長輩加體罰於兒童，理由是爲了孩子的幸福。人生了病只要有醫生來看，吃幾片他全莫名其妙的藥片，就覺得自己的病會由此而被治好，都屬這一類。

這種現象之造成，是人類的感情通常多根據他們過去的個人經驗感覺，而不是根據當事件發生時，那一瞬間對現實環境的感覺。人類常常服從其感情的支配，而不能解釋其行爲是根據當時當地情形下，應有的合乎邏輯的反應。有了這種情形，我們也不會承認我們有了什麼錯誤，因爲人類不願意自己不合邏輯。假使一個人服從了一種強烈的感情的支配，他很少時候肯說：「我有了這種感情，但我找不出什麼理由來解釋」，另外他的心一定在尋找他的信仰，爲那感情作辯解，

自然他一定可以找到一種信仰可作說明。小孩子跌了一交，他站起來會踢兩下地板，怪地板頑皮，絆倒了他。鄉下人怕打雷，他認為雷會劈死人很危險的。這種理由沒有一個是真實的，而是混合了他們所經驗過的其他事實而造成的，並自以為即是事實。

納粹法西斯宣傳人員，基於人類的這稱弱點，遂不以真理與合乎邏輯，為其宣傳的基礎，而使其宣傳建築於感情與信仰之上，至於感情是否適當，信仰的是否正確，完全不管。當他們要民衆相信一件事時，他們就指出來「相信吧，這是真實的」。假使知道民衆不會喜歡那件事時，他們就說「爲了領袖，我們應作自我犧牲」，或說「這是表現我們民族不可阻遏的志願，應有的表示」。這種宣傳的不斷的進行，並要運用一切含有戲劇性的有興趣的方法來加強。

在廣場上集聚若干萬穿納粹制服的男女青年，場四周遍插卐旗，最好在夜間，燃上幾千個火把，然後像演話劇似的給台上演說者打上「腳光」。這位演說者，於是大喊「日耳曼人的靈魂是要無情的毀滅了一切赤色的蛇蝎——布爾什維

克主義、猶太主義、和平主義」。台上高聲嘶叫，台下的黨徒鼓掌喝采，這種情景可使參加的羣衆，產生一種和他們感情上完全一致的力量。在這大的羣體中，你除非離開那羣體成爲一個細小的個體，是沒有人能批評那種集體一致的力量爲不對的，在這羣體中喊的口號，在每期內一定有相當的影響。

納粹法西斯的製造他們的領袖，也用這種方法。他的肖像，他的言論到處都是。義大利各城市中四處都寫着引自墨魔的演講和著作中的言論，畫上他的肖像，給民衆一種印象似乎如不奉墨魔的指示，就到處都有墨魔的眼睛在監視着。在一種特殊的場合下，這一切宣傳更須加倍。像一九三七年墨魔到西西里之前，在他要到的一個小村中，先攤去了一羣宣傳人員，懸旗掛肖像，在一個村子的小菜場中竟密排了一百四十九張墨魔的肖像，而且在村中每一塊石岩上都寫上長十英尺的大標語，民房教堂的牆上也都一樣。在德義兩國，領袖的名子，在學校兒童每飯之前，在教徒祈禱的時候，都要以一種含着光榮的意義提到他們。而義大利的教科書且有這樣的句子，一個人如果要增長個人的「志願與精神」，應當虔

敬的去巡禮一次墨索里尼的出生地。

任德國希魔是公認爲不會有錯誤的，純粹黨領袖赫斯（現在英爲戰俘）曾說過：「我們帶着驕傲的認爲：一個人必須永遠自批評中除外——他就是我們的領袖。因爲依據每一個人都感覺到，都知道的事實：他過去永遠是對的，將來也一定永遠對！」

以上的這種情形建立成功，一切其他的事就可以跟着順利行進了。不過這種情形雖已建立成功，納粹法西斯宣傳機關也不能夠廢除。卽或把領袖已捧得跟神那樣神聖，宣傳工作依然不算成功，他們還得努力於繼續保持民衆之願意承認領袖的沒有錯誤用不着批評。這工作在德義一刻也不會停止過，在希魔墨魔完全失敗之前，也將不會停止，因爲他們的宣傳是訴諸感情的，以致環境的關係很大，他們一定要追隨着環境的改變，不斷的工作。

人類要接受一種信仰認爲真實時，一定是那信仰一時適合了他們心上，原有的一個「構造」，不過那信仰也不能永久適合其心上的「構造」，所以人也不能

永遠作某一感情的奴隸。人心總是要求合邏輯的，因此即使在極熱烈的情緒影響之下，他也不能完全接受別人給他的一種解釋，而仍將自己找出來他可以接受的認為有可能的解釋。此外由在戰爭的宣傳中我們可以體驗到人類對真理的熱望遠不如求其心理上舒適的熱望為強。在戰爭的痛苦生活中，向民衆強調的宣傳，戰爭勝利之後大家將會如何幸福，民衆很容易聽得進，這時如有一個人為民衆指出，不錯，勝利之後我們會有幸福，但那是將來的事，眼前我們應當努力的是爭取勝利，眼前不努力爭取勝利將來的幸福如何能夠到來，這自然是真理，然而在民衆正狂熱的作着未來的幸福美夢時，這樣為之戳穿，民衆心理上一定有點不舒服——人都不大願意接受那足以困擾他們的信仰。有錢的基督徒必然有點懷疑耶穌是否真說過「有錢的人要進天國比駝駱要穿過針眼還難」的話。

宣傳工作人員作宣傳時，一定要注意到人類的這種心理，英國一個政治家說過農村三年歉收可以倒掉一個政府，因為三年歉收必然造成農民心理的焦急，他們很可能遷怒於政府，以求發洩他們的怨氣。因此，不管是創造一個宣傳故事或

標語，打算用以振奮民衆的感情或減低民衆的感情，一定要注意到適合當時民衆的心理。

在一九一三年在德國，如果有一個人站在一塊石頭上招來羣衆之後尖着嗓子喊，「猶太人都有花柳病，他們將玷污我們的妻女。」大家一定會認爲他是一個瘋子，甚至會叫警察給逮捕了去，找醫生研究研究他心理上是否有點變態。但到了一九四〇前後的德國，就沒有人認爲他是瘋子，因爲他們已常常聽到這樣攻擊猶太人的話。明白他是一個納粹黨徒在作他的工作，所有聽見這話的人，已很少有人會問問自己信不信他所講的話了。偶有些會想想他所講的話的人中，對猶太人沒有什麼意見的，或者會感覺好玩。至於全無「反猶」偏見的人，一定立刻走開，覺着說這類話太難聽了，猶太人和其餘人不也一樣麼？如果是有點偏見的，自然其偏見將會加深。至於厭惡花柳病和玷污他人妻女的，則會把猶太人和他所厭惡的事聯繫到一起，尤其是當時的警察是在保護着這個講演人，更可助長其厭惡猶太人的意念。如果有一個心上有着反納粹「構造」的人聽到，則將增強他反

納粹主義的怨恨，警察的保護使他感覺不公允和壓迫，震怒，失望，並以爲猶太人真是好人，這種污蔑就是明證。

這種對猶太人的污蔑，世界各國人都不會相信，然而由德國人的行爲來判斷，有許多德國民衆是相信的。若干年來德國人已在恨着猶太人了，第一次大戰以來猶太人在需有高深學識的職業中頗露頭角，這很傷他們的自尊心。自一九一八以後德人飽嘗了不幸與失望，而自信這不是他們的過失，要轉嫁這過失給別人，於是找到了猶太人。

所以一個宣傳工作人員，在他們宣傳他們的主義時，一定要注意到他的聽衆的感情狀態，如果聽衆並沒具有他所要求的感情，必須設法製造（如果他可以製造的話）。因此了解聽衆乃是現代宣傳方法的主眼。宣傳工作人員需要懂得聽衆所恐懼的，所憂慮的，他們的失望，他們的信仰基礎是什麼，什麼是他們認爲對的，什麼是認爲錯的，然後從中運用。告訴他們那足以引起對你有用的感情的話，這就是使他們的感情傾向於信仰你所要他們信仰的一切，你的陳述只要能掛

高其感情，這宣傳就算成功。反之和你的陳述不能適合其感情，他就不會信仰你要他信仰的一切了。

希特勒告訴德國人，第一次大戰德國的戰敗並不是爲了軍事的原因。他們是有人在背後給暗算了。暗算德國人的就是和平主義者，共產黨，知識階級，還有猶太人。德國人相信了希魔的這種話，德國人是一個軍人的民族，他們是常以其軍隊自傲，一旦戰敗受人輕視，爲他們的感情所難容忍，希魔給了他們這種他所歡迎的話，於是許多人承認了他是一個偉大的人物，可以承認他是領袖。如果希魔告訴上次戰敗的原因是爲了德人的愚蠢，不能忍受痛苦，那根本他就組不成納粹黨！

是以多麼熟練的宣傳人員決不能任性去講他喜歡講的話。和科學家不能不注意「假設」一樣，宣傳人員就不能不慎選他們的謊言。成功的講演家必須了解他的聽衆，一點也不能放鬆和他們的接近。希魔的宣傳部長戈培爾說過：「政府一定要以極科學的精確方法診視人民的靈魂，必須確知民衆的心理傾向。」很顯然

的，如果聽衆是全國民衆時，其宣傳就一定要能訴諸全國民衆的普遍的感情。

不過以訴諸感情的現代宣傳，宣傳某種主義時，不是在任何社會中都可以成功的，一定要在某一特定社會中，所宣傳者適合了那社會中人民，由其文化程度而產生的感情，才能有效。（關於這問題以後將有詳細的探討。）所以我們應當了解納粹法西斯政權的唾棄「理性宣傳」，運用「感情宣傳」，在民衆沒有某種感情衝動時，他們還可以創造那種感情衝動，而獲得一時的成功，並不是說這種宣傳是一定有效的，只是在軸心國家的人民心理上，基於其傳統與當時的環境；先有了可以產生那種感情的可能，他們才僥倖的有了一些成就。人的心理雖然極爲複雜，但它是基於人的環境而爲一定的發展的，加以科學系統的研究，一樣有因果律可循，所以人的感情並不是可以任人任意擺弄，如一些納粹法西斯宣傳人員所希望的那種樣子。

前面已經說過，訴諸感情的宣傳決不能停止工作，就像養了一個什麼動物一樣，必須不斷的喂以所需食物。雖然如此不斷的喂以食物，也仍不能保證牠一定

受喂養者擺弄。宣傳人員即使是一個天才，善於製造謊言，巧辯，懂得一切宣傳技巧，但其宣傳的效果也不能決於他所想像的願望，而將決於接受宣傳者的心理狀態的反應。

第三章 現代宣傳之性質

前章說明了訴諸理性與訴諸感情宣傳的區別和納粹法西斯政權所以要採用訴諸感情宣傳的理由，本章將進一步來探討納粹法西斯宣傳的性質與其他民主國宣傳的性質，不同之點何在。

我們知道納粹法西斯獨裁者的第一目的是要保持他的黨和他自己的權勢。如果他是不惜流血攫得的政權，那麼起來推翻他的，也將以不惜流血來為過去流過血的人們報仇。過去的專制帝王倒曾有人志願的敵視尊榮禪位他人，現在歐洲的各國主人中，還沒有這種前例，他們都希望儘量保持其地位。希特勒甚至告訴德國人，他們將永遠在納粹黨領導之下。在這種要求下，他們的宣傳部，就是替民衆作好了他們所希望於民衆的答復，例如：「這是我們不能改變的志願，某某應永作我們的領袖。我們愛他，信任他，我們相信只有他能領導我們走進樂園。」和「墨索里尼，為你，我們生；為你，我們死。」這本是他們的願望，却作為民

衆的願望寫出，跟着不怕人厭惡的翻翻覆覆的宣傳，一定要人都能這樣想：「爲什麼我們相信這個，我們相信這個是因爲我們知道他（領袖）永遠沒有錯誤。」

這種宣傳戰術在二十年前是不會成功的，現在我却至少已經承認他們曾有過成就。民衆被教導着給那類自命的領袖，以超乎理性的崇拜。認爲他是一切有益活動的指揮者，政治的社會的甚至宗教的知慧的淵泉，和「正確」與「錯誤」的判斷人。墨魔曾發表過一個官文書，解決一個新出士的希臘彫像的年代問題。專家們對其年代問題爭論不休，他說年代應爲某年，於是這個問題的爭論，就須認爲已經解決了。因爲這是上峯的命令。經過什麼步驟，這類的半神半人的領袖獲得他們的權勢，是值得我們研究一下的。

自然大半由於幸運，機會巧，造成了他們的地位，如果經濟情形有利於獨裁者，他真能給其黨徒帶來幸福時，他們自然要愛戴他。不過就是神仙也不能使一切人都滿意，假如他的政權建基於資本主義制度之上，那社會中不同的利益，社會的分野，將時時迫使他幫助他自己這一部分的人反對另外部分的人。幸運不會

長久，人又貪得無厭，結果作領袖的把自己弄成了一個誹謗與訴訟的箭靶。

獨裁者當然不願意當箭靶，也不許人誹謗或有異議。訴訟在納粹法西斯政權下更是完全不許。墨魔在他的「權力與服從」一文中曾說：「沒有一個政府能夠叫牠所有的民衆都快樂。對一切問題所作的任何解決辦法，就是你有神的智慧，也不可免的要造成一些人不滿。……：你將怎樣避免這種不滿的傳播以免使牠形成危及政府的鞏固的危機呢？你只有以武力來求避免，用最大的武力來擔當這任務；只要需要，在任何情形下都可以無情的使用武力。」這就是獨裁者的辦法。

我們知道德義兩國都是由一些小的封建領土形成的，其殘餘的封建性猜忌性有多少仍固執的保留到獨裁政權出現之日。這新政權是以反對共產主義而得產生，於是也就注定了與資本主義的結合，更組成了社會中階級利益的尖銳對立。所以他們的領袖就用種種的說法要求他們的民衆不能享受，只有犧牲。沒有和平與安全的保證，只有普遍的徵兵和一切黷武主義下的財政負擔。一九三七年希魔在紐倫堡向納粹青年訓話，曾說：我們有一個訓練青年的新觀念，就是叫他們能擔

常艱苦，勇於犧牲，有健強的體格。德國人曾向英國協會教育組的人解釋，說今日德國教育的最高目的是服兵役。還有一個德國的高級官吏曾說，「在他醒着的時候他就完全是元首的士兵，德國不許人有私生活。」

不錯，希墨在德義曾被大部的民衆崇拜過，甚至他們自己，在起初都會對人民怎麼會產生這種心情感覺驚訝。希墨曾自認爲不可能從勞工階級中獲得黨徒，但是熱烈擁護他的竟是最窮的勞工。這是怎樣一回事？什麼方法使他們成功的呢？這是研究政治的人不能放過的問題。

一個人怎麼能在一個國家中保持一種幻象，說他是「全能」「全知」的人物？如果一個人想這麼作，他怎樣才能作得到？

第一件他須作的事就是扯謊，一個人想自詡爲全知全能，勢非逼着自己扯謊不可。墨魔爲了把自己造成該撒大帝第二，想建立一個帝國，不惜把義大利的財富都虛擲到阿比西尼亞的沙漠中去。他知道人都不愛貧窮，喜歡富足，於是他在繼續要求他們犧牲其事實上所有的金錢時，却開一張建立帝國之後將會如何富足

的空頭支票給義大利民衆，甚至給他部下的軍官。欺騙他們繼續貢獻生命財產。希魔會告訴我們他的集中營是以一種「母親之愛」的制度來管理，至於有人說他的集中營中如何暗無天日的話，都是猶太人的惡意宣傳。可是我們立即可以想起來，他在未握政權之前曾說過，他如掌握了政權，一定要用最兇殘的手段撲滅一切敵人！納粹法西斯領袖都是扯謊的專家，說了不算，作了不認帳，是他們的慣技。墨魔在侵略阿比西尼亞之前總是否認他有意侵略阿國，侵略戰發動，則說阿國是侵略者。以後又說他已證實了阿國士兵在用英商供給的達姆彈，事實上卻由國際的救護隊證明他用毒氣進攻。希魔也是一樣，國會縱火案，誰也知道是他爲了逐出德議會中的共產黨議員，他就可以掌握政權，於是由戈林導演成這麼一場火燒，嫁禍給德國共產黨，但他却以共產黨縱火向世界宣傳。他進兵奧大利則以阻止內戰爲藉口。至於日本法西斯軍閥們的扯謊，更是拿手好戲。蘆溝橋戰爭之開始，是因爲他們詭稱失走了一個士兵要侵入宛平縣城而引起，太平洋上日軍已進攻了，來栖和野村仍在與赫爾談判未斷。舉此二事已可證明日軍閥的扯謊伎倆不下

於希墨二魔。扯謊是納粹法西斯政權的主要政治武器。

希魔以爲利用謊言，乃是作宣傳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的「我的奮鬥」中就充滿了謊言以求德人擁護他。他有兩句警語對於宣傳工作，一個是前章說過的「答復一切」！還有一個是「統一你的敵人」！統一敵人的目的是如果說我們有幾個敵人，那麼即使最忠實的納粹黨徒，也可能集中其敵意於某一敵人而忽略了其他的敵人。此外還容易發生不同的意見，即到底某一種「蛇蠍」應在一切之前，先以「兇暴的手段消滅」。納粹黨中不能有不一致的意見，所以希魔自己在所發表的文字所作的演講中，永遠是訂定的，並且屢屢重複着說：「猶太人，共產黨，和平主義者，國際金融機構，社會主義者，是一個東西並且完全一樣。」但是誰能相信猶太人，共產黨，和平主義者會完全一樣呢？其實就是希魔自己他雖然這麼說，他也不能相信聽衆會相信他這種不合邏輯的話，但他們卻能跟着他喊，好像他們相信這話，他所需要的，也就是這個了。

這種種的假話，我們用不着一一的去研究牠，總而言之，這是納粹法西斯政

權必不可免的把戲。要想統一民衆的意見，一定要以種種不同的東西給種種不同的人，因為不同的人民需要不同的煽動，才能引領他們趨於某一一致的意見。對德國的勞工，一定要告訴他們元首特別注意到他們的利益，不論多麼有權勢的資本公司，不能允許他們虐待神聖的亞利安勞工。而對資本公司則告訴他們，他們是元首的代理人，在負責使神聖的第三帝國的工業在進行，一切自下而來的共產黨的計謀與行動想與他們爲難，都不能容許。爲了使羣衆永遠有熱情，如不能使他們信仰，也要使他們感覺，在一切的時間空間內永有些什麼值得以熱情奔赴。是以沒有一個極權主義的獨裁者能不用欺騙的手段，不過欺騙手段能夠有效的時間相當長，却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一切的欺騙，一時雖可成功，但同時也產生了責任，不論多麼巧妙，適時，有效的謊言，牠總是一個謊言。早晚會如事實所證明，那是謊言。於是自然的就要產生兩種情形，一種是在扯謊者心理上的不安，一種是扯謊者必須設法辯解，轉移他人的注意力，爲了不叫謊言被人戳穿。

也許讀者會以為在政治上扯謊並不算什麼新奇，也不一定就會給扯謊的人帶來什麼不幸。大半號召人民擁護的理論，都是騙人的。最著名的例子，像「美國是自由之邦」，「英國所有男女人民，在法律之前，完全平等。」不過這與納粹法西斯之欺騙並不一樣，這是為人民樹立起一種可喜的理想使他們信仰趨赴，還有說這種話的人並非先不信那是事實，而是他們真相信那是事實，只以我們今日更進步的眼光來看還不是事實而已，所以這兩種例子只是認識的不夠的問題，與納粹法西斯之純屬欺騙全不相同。

不過扯謊以求民衆信仰或製造一個感情的浪潮，扯謊者當時自己相信不相信那謊言本不重要。據說希魔自己也相信他所說的關於猶太人的一切話，然而民衆並不是因為他自己相信，然後他們也就肯信。他們信是因為希魔很會迎合他們的心理，那正是他們所肯相信的。所以宣傳的好處是：第一一些對經濟不甚了了的人民以為如猶太人都被驅逐離開他們的職業，將使許多納粹黨徒可以獲得職業，第二虐遇猶太人，是一個安全的激起敵對破壞衝動的方法，有利於侵略性的國

家主義的宣傳。第三傷害無助的，愛和平的猶太人，納粹黨徒可以展開一種有力的兇暴實例，用以威嚇納粹政權的敵人，而不致引起報復的危險。

宣傳完全是扯謊，即或有成就，宣傳者自己因為那是謊言，一定也會自覺不安。至於自知所宣傳為真理的宣傳者，雖然也一樣不高興有人反對他的意見，但想到他終將由事實的證明而壓倒對方，和想到壓倒對方時的愉快，他是會以愉快的心情來與對方辯論的。而扯謊的宣傳家則一定要有點神經過敏，他怕人家發覺他在扯謊，謊扯的愈多，愈神經過敏。因為一謊被人揭穿，他們便將整個場合，他們自己也許並不自覺自己的神經過敏，而只感覺對他們所欺的傻子們有一種無上藐視心情，其實這也就是他們的神經過敏的表現。他們一定隨時在搜尋什麼地方有可以引導向整個爆炸的火藥線，如果找到，就要用最無情的手段，立即不顧一切的去應付牠。他們將盡一切的可能去保衛他們的謊言。例如整個的統制輿論，製造輿論，箝制報紙，無線電廣播，新聞電影片，檢查一切作家，戲劇家，講演人，教授們的言論著作，戈林會連畫家，建築師的作品都要檢查。他們一定要

以嚴峻的刑罰加諸敢說他們扯了謊的人。同時建立特務制度以恐嚇人民使他們知道說他們扯謊的危險。

有人以爲蘇聯也曾是統制輿論的，在農工專政階段中，政治意見也統制的很強烈，不過牠與納粹法西斯不同，他們是因爲新政權建立時，民衆多爲文盲且無政治認識，種族繁多，反對爲人民謀福利的政治野心家勾結帝國主義者時時在想顛覆這新政權，所以他們不能不採取那統制的手段。不過他們的專政是一個階級的專政而不是一個人的專政，一件事在未成爲政令之前，儘有討論的餘地。一到成爲政令，便不能再反對。這與一切由一個人欽定，自亦不同。還有他們的政策都是訴諸理性的，有識的人都可判斷其目的純在爲民衆謀福利，而不是在扯謊，欺騙民衆，給他們以虛空的夢想，而叫他們獻出來生命財產。到了蘇聯憲法實施，牠已成爲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英作家斯隆著「蘇聯的民主」一書中語）。第二次世界大戰更以蘇人民之樂爲保衛這一國家而效死的熱情，證明其政府之爲人民所愛戴，一使過去以惡意譏讕蘇聯者，也不能不刮目相待。這事實的證明，

比什麼都有力。如果蘇聯是與德義一樣的以獨裁統制民衆，那在德國回戈東侵時，蘇聯必已崩潰了。

是以納粹法西斯政權是不能與過去的蘇聯相比擬的，他們在作賊心虛的處境中一定要用種種稀奇古怪，異想天開的不合理的手段，保衛其政權。德國有所謂「保衛黨國防止陰謀破壞律」。日本則有取締不穩思想的法律，這種法律是由軍隊、祕密警察、特務人員、來執行的。他們檢查人民的函電，偷聽電話，管制使用無線電收音器。所謂正義已置於政權的腳在踐踏着，所謂法律，只是一黨的如意武器。德國在一九三八年頒佈了一條法律，說是信仰納粹政權的人，才能領得汽車牌照，誰能不爲此感到滑稽？不過這也是必然的，宣傳一經胡說白道，以後爲環境所迫，必須說更多的謊言與不合邏輯的話，也爲這個，他們會一天比一天更神經過敏。

但上面的話，希魔是不承認的。他認爲人民的記憶力很短暫，理性的思維能力更不存在。他可以說已整個的否定了他的德國人民的知慧，例如他曾放逐一個

有名的物理學者因爲他不採用另一納粹黨徒又是亞利安種的某物理學者所主張的原子學說，而採用了愛因斯坦的原子學說教授學生。這種行動自不能算聰明，不過他是想他不管民衆理智上是否信仰他的話爲真實，但那不能影響他的行爲。大約這不管民衆的意見如何而硬幹，在獨裁者們倒是真的。說他們以爲民衆沒有理性的思維能力，那恐怕是假話。人類都有理性，並且都爲環境所迫，爲應付日常生活非運用其理性不可，不論獨裁者統制的如何強，也不能改變這事實。一清早就把人民從牀上拖起來練早操，一天都叫他們工作的很忙，每晚還強迫他們去參加什麼黨的集會，然而人民仍然能夠思想仍然會表示不滿，仍然可以相互議論。扯一次成功的謊，可以一時的打斷這種思索議論，等那謊言所造成的感情潮浪過去，漸漸的懷疑就又復燃起來。於是獨裁者必須又製造一個新的謊言，或把民衆的注意引到別的方面去，否則事實上就將會發生不利獨裁者的危險，民衆的記憶力量並不壞的，痛苦與不平的記憶，民衆能傳記幾世紀都不忘，像太平天國的戰爭，庚子之役，帝國主義的聯軍攻入北平，中日甲午之戰，在現在四十五十歲的

人作小孩子的時候，是常常聽見他們的父母講的，因為那會使他們很痛苦過，所以要講給下一代聽。他們決不是痛定即忘，而是痛定更會思痛。

只以現在的獨裁者不許民衆批評他們的政策，理論與實踐都須由他決定，民衆遂只有全部接受。一種政權如果對於一個人是否適於結婚，小孩子在有空閒時應作什麼遊戲，都要負責爲之指定，他們給與人的心理活動的壓迫自己是很廣泛了，所以除非有很大勇敢的人，決不敢站出來反對。當民族想反對時，他們首先要想到自己的安全。現代的人民大多數又都會親眼看到過許多道德的宗教的教條的建立，最初似乎是不能更易的，沒有幾個月又成了爲大衆所攻擊的對象，這種現象，加上自己安危的權衡，於是他們想，反正早晚他也是要被告定的，我又何必站出去自尋苦惱！

獨裁者也就把握住了民衆的這種弱點，所以完全禁止反對，不允許以他的制度與別的制度作忠實的比較，如以其他的領袖比他自己，以其他的政府比他的政府等。因爲如果其他政府其他領袖好時，就對他太不利了，所以必須禁止。

在民主國家中，自然不會有類此的問題。民主國家中政府是應隨時準備着依照民意有所變易的，起初是由少數國民的研究建議等到其意見漸為大多數民衆所贊同，形成了一種輿論，於是政府中的部長們就不能不認真考慮了。雖然在戰爭中美國的總統羅斯福國會授予了類乎獨裁者的特權應付緊急的事件，但是羅斯福決不能以獨裁者自居，而國會也時時在注意着其行動，甚至時時想削減他的特權。所以民主國家的民衆如果研究國外的政府制度，對政府也有益無損。在二次大戰之前英美民衆對於社會主義的蘇聯，納粹主義的德國都會熱心的加以研究，這種研究已在英美造成了一種社會的改變。真正民主社會是準備接受他人的實踐經驗的。如由他國的實驗證明了自己國家社會制度的不完善，他們是要學習攝取的。

納粹法西斯政府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獨裁者要求一切的改革只能由上面發動，他是惟一的改革的創造人，一切福利的源泉。在實踐中，他有一羣顧問給他幫忙。這些人都是他尊重其意見的，和他信任得過的。據說墨魔的成功是因爲他

善於運用專家顧問的意見。這就是說一切的建議都要從一個狹窄的瓶頸那裏通過一下，結果這獨裁者變成了一個形式的首腦，實際上掌握着政府大權的乃是一小圈子人的心智。由民衆發動的一切不只需要而且禁止。在德國就是我們前章說過的領袖至上主義。一切變動於上，自上而下，下面的人只有服從。納粹法西斯之不許知道國外的一切事就是爲那樣給了民衆以比較的材料，比較乃是獨裁者最痛恨的，所以希魔的宣傳人員告訴德國人民，蘇聯的共產主義是完全失敗了，蘇聯人民生活標準愈有進步，就愈要宣傳蘇聯失敗欺騙德國民衆。

一九三六年有些德國兒童到英國參觀，他們被領到海德公園去看那些在園中講演的人。德國兒童發見幾個講演者在那裏公開的批評政府，覺得非常奇怪，殊不知在世界真正民主的國家中，這本是家常便飯，無何新奇。獨裁者們也就爲了這種緣因才不願意他們的民衆知道外國民衆如何作、如何想、如何感覺一切。他們自覺建立起來一個極大數量的徵兵軍隊，在國內可以鞏固其地位時，他將說我們的國家在敵人圍繞之中，某某強國正以我國爲目標而備戰，必須民衆對他國全

不了然才可使民衆同意其建立龐大的軍隊。在對外政策上，爲了玩民衆於股掌之上，聽從他說與某國親善就親善，敵對就敵對，也必須使民衆對他國全無所知。甚至卽或納粹法西斯政權不想以其對外關係爲解決內政的手段，其政權基礎已相當鞏固，不怕與外國比較時，他們也不願意使其民衆得與外國自由交換意見，就是因爲獨裁者和他的黨徒們非扯謊不可，還有他個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是一神話，非不顧一切設法保全不可。獨裁者今日所要求的不許批評性質是比教皇還要更甚的。英王雖也是不能批評的，但因爲他不是負責實際政治責任的，責任屬於內閣，內閣可任人批評，英王不能批評已無關於政治的實際利害。獨裁者則不然，他要求一切方面的自由，隨意而爲，統治一切。他自不願意其民衆接觸外國對他的批評，破壞了民衆對他的尊崇。像外國報紙上關於他們的諷刺漫畫，他們就不能容忍使其民衆看到。至於教皇發表的關於希魔虐待天主教徒的文件，英美蘇報紙所載希魔虐待猶太人的報告，就更不能叫其民衆看到。所以民衆的心扉必須在強制之下對外國關閉起來，不只不能知道外國對自己的國家如何看法，就連外國人

如何想他們自己的事？有什麼事在外國發生，也是禁止知道的。

第四章 使國內團結的方法

獨裁者不願意民衆接觸國外的思想與現實，已如前章所述。要實現這希望自然要照他們一貫的辦法以武力鎮壓，於是焚書，禁止外報發行，限制無線電收音機的波長，加強特務制度，使收聽外國廣播成爲一件極危險的行爲。本國的報紙更要澈頭澈尾的統制，阻止一切要求改革的批評，煽動，建議，藉以撲滅國內民衆對政府的敵意根源。不過我們根據人類歷史的昭示，知道用武力阻止民衆的敵意生長效力並不宏大，當民衆處於被封鎖的狀態之下時，事實仍然會滲透其封鎖而達到民衆之間，謠傳的盛行，可能更不利於政府。武力因爲壓抑民意，是既不經濟而且非常蠢拙的一種武器。清末時的以武力壓抑民意，封報館殺革命黨，北洋軍閥的封報館殺記者，全未能阻止了民意的流傳，封，殺的結果，只是自彰其惡，更加深民衆的痛恨，更堅定推翻他們的政權的決心。歐洲進步的報紙除了應有的編報編輯之外，還設有一種「坐牢編輯」準備坐牢，可見武力鎮壓效力

實在有限。

納粹法西斯政權很懂得武力鎮壓效力有限這一事實，於是他們遂運用一種技巧使大部民衆歡迎他所加諸他們的限制，而不滿他所加給他們的限制。再以納粹法西斯黨徒的攜有武器列隊遊行，及以布告宣示奸細已被斬首之類作爲輔助手段，其辦法相當的有效。因爲在任何社會中實際上需要思想自由的人總是少數，其餘的，都以爲思想自由不關重要。他們只要能感覺自己可以獲得一切報道，並能在他們想審查所告訴他們的是否可靠時許他們審查，就夠了，他們個人並不一定真切感覺獲得報道及有權審查，有什麼必要。並且在民衆中一小部分人熱烈的關心真理時，另外也會有一部分人以同樣的熱情歡迎據說是爲了他們自己的利益的限制。在民主國家的民衆中也有人有限制自己的觀念的要求。爲什麼會有這種要求呢？他們怕有一種什麼知識會影響到他們的心理。例如虔信的民衆是要避免閱讀無神論者所作的文學書籍的，因爲那書可能叫他失掉了他的信心。或者怕損害了別人認爲是他們的美德的行爲，例如節儉的習慣，情願接受較低報酬之類。

是他們不願損害了的。是以一切民主國家的人民，都給自己劃有一個界限，如某些觀念是含有毒素的，某些真理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英國也有檢查文學戲劇電影的法令，英國雖號稱民主，因為怕有道德的政治問題發生，所以只要求檢查辦的很寬大，而不想整個取消這法令。美國是不許無神論者，革命黨人登岸的，還有節制生育的宣傳品不能由郵局寄發。這些限制可說都是民衆自己遠想要，否則在英美應並不難取消。

獨裁者爲了要割斷他們自己的民衆和他國人民的知識上的連索，就是廣大了上述的那種民衆的心理構造。他引導着民衆相信舉凡他們的制度，信仰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外國的制度信仰則都是衰落的含毒素的。在納粹法西斯國家中利用廣大的宣傳，宣傳其「民族的使命」和其傳統的先天的良善與偉大，藉以輕視外國，獲得了相當的成功。他們告訴民衆他們這一民族是遠在他國民族之上的，他們是天生來的優越，他們的思想體系比外國的那一種思想體系都高一等。

「你們是西利

——或

族

上帝

民，神授權給你們統治

歐洲——亞洲——以及世界，你們從低劣的外國民族，缺少教養的人，異教徒，無信仰者，外國狗們，那裏沒有什麼可以學習。凡他們所說的一切，都是出於妒嫉心，想損害你們的優越性。

這種方法也是舊方法，牠是基於人類習慣的傾向。凡是未受過教育的人民，他們照例是輕視外國人的。一切不好的行爲不好的傾向，也都可能歸於外國人。歷史上國內的不安多歸罪於隣國國王派來的奸細。有一樁罷工事件，歸罪於外國人的煽動，比說由於環境使工人不能容忍，要容易爲人所贊同。在歷史上攻擊政敵說他們領外國津貼是很有力量的一個辦法，美國革命時，「當英王喬治第三的奸細，領他的津貼，」曾是一個攻擊政敵的口號。到二十世紀，這口號一樣有效，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現在英內閣重要閣員之一的史丹佛·克利浦斯爵士，也是常被攻擊爲受蘇聯津貼的人。中國北洋軍閥殺文化人也常常連用領「盧布」這頂帽子。爲什麼這一攻擊的方法古今中外都喜歡運用，因爲這是最容易激起民族感情，最容易收速效的武器。到今日這武器比過去更爲有效，因爲今日已不像

過去各國之間交通只限於極少數的旅行者。外國讀物只有極少數的人讀，所以誰什麼人爲奸細，領外國津貼更容易爲人相信。獨裁者也就利用人民這種心理，而製成一個定律：「一切壞事都是外國人幹的，一切好事都屬於我們自己。」

墨魔一九二二年在那不勒斯講演，他曾說過這樣的話：「我們已創造了我們神聖的理想，這理想就是一種信仰，也是熱情。牠並不一定需要成爲一種現實。其實事實上已是現實了，他是一個目標，一個希望，一種信仰，也是勇氣。我的理想就是這個民族的偉大！對於這個理想，對於這種偉大，我們希望把他變成整個的現實，其餘都要從屬於這一理想。」

德國人就更完成了他們自己的另外一套，納粹的科學——粹的正義——亞利安種的外貌——舊日的諾第克的英雄——諾第克族的不可阻遏的意欲——是預定了他們是世界上最優越的民族。使民衆的心理久浸在這種東西之內，外國人及其觀念自然就格格不入了。不過有的時候對某一些外國人又須成爲例外，像前面我們說過的納粹在一九三五年，突然間把日本人認爲是亞利安種。還有耶穌會是納

粹一個痛苦的難題，在納粹掌握政權之後，一面說耶穌是亞利安種，一面會努力使德國民族拋棄基督教，改信舊日的諾第克的神祇。在過去德國人曾說過莎士比亞是德國人，假如他們崇拜他，一定會更進一步解釋莎士比亞不只是德國人而且是一個納粹，不過可惜在莎士比亞的著作中，找不出來一段可認為是預言元首產生的話。

這種民族的自驕對於獨裁者有雙重的利益，因為作為這自驕民族之領袖的人，自然烘托的極為光榮了。他是他們的領袖，他一定適於代表他們一切的美德，他是「德國團結的象徵」或「義大利帝國的創造者」「命運的主宰」，（自然他也是外國人忌恨的對象。）這種偉大的感情一形成，民衆就將承認他們的領袖確有適合於領導這個世界上極光榮的，極有威力的，文化最高的民族的品德，正如他們自己是世界上極光榮的，極有威力的，文化最高的民族一樣。至於平心靜氣，尊重事實，以及謙虛的外貌，獨裁者和他的宣傳人員是都不會具有的。

蘇聯的民衆對他們自己也是自視甚高的，不過他們認的是他們的社會制度

，以及在那制度下他們所有的成就，並不是靠了他們是什麼神聖的民族，具有爲別的民族所不能分享的崇高優越性。由於不同社會性質的教養，蘇聯的兒童勞工已成了一種典型的人物。但他們並不是什麼神祕的俄國集團之一份子，乘着上帝的特殊使命，來統治這個世界的人物。

乍看起來，似乎納粹法西斯黨徒的自驕，和蘇聯民衆的自信，區別並不大，但是事實上區別是很大的，一方是基於一種完全唯心的無彈性的教條，一方則是基於事實的純現實的立場。因此蘇聯的民衆如由經驗證實一件事不正確時，他們可以在不改變其整個意識形態的基礎上接受一切人的意見糾正其看法，使適合於新的情勢。納粹法西斯黨徒就辦不到了。那半神半人的領袖是不能批評的，所造成的災難，所要求別人作的犧牲，所幹的欺騙勾當，是一點也不容別人議論指摘的。

由以上兩章所論，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獨裁者如果想一切大權都由他

個人獨攬，一切都自上而下，而以他一個人作為全國的知慧與權力的代表時，他自己就被逼着非扯謊不可，非禁止他人的思想與表現的自由不可，同時還要創造一種民族的或國家的屬於自驕型的一種神話的理想。他和他的宣傳人員是不是偶然也有些真話，這是要由當時他們的環境決定的。就是他們扯謊時，扯什麼樣的謊，也是一部分要依當時他們的環境決定，一部分則基於過去他們所曾扯過的謊言。但禁壓限制人民的意見發表則是絕對不能改變的。因為納粹法西斯主義與其領袖至上主義，自上而下的統治人民生活是不可分割的，除非根本取消了納粹法西斯主義所加於民衆的壓迫絕對不會改變。

第五章 敵人的用處

在第二次大戰開始之前曾到過德義兩國的人，如果你問他在德義街頭納粹法西斯的宣傳，什麼最惹他注意，他答復決不會提出來前兩章我們所提到的一切，而多半會說他們宣傳的是黷武主義，旨在備戰，以爲侵略。這觀察是不錯的，納粹法西斯的宣傳非是在平時也像戰時不可。獨裁者如果自覺不能完全控制得住國內的軍隊，他是感覺不安全的，就是在民主國家中政權向不握在軍人手中，一旦政局有變，軍隊即可能發生決定全局的作用。至於政府根本握在軍人手中的國家，軍隊的服從自然更是舉足重輕。一隊募集的士兵，經過一個軍事領袖的嚴格訓練。使他們完全爲他個人的工具，下什麼命令他們都照着作，是很容易作到的。所以獨裁者們就希望能以徵兵制，徵得大批的士兵，訓練他們，忠於他個人甚於他們的直接的上級軍官。希墨二魔都會這樣努力過，尤其是希魔爲了控制住德軍忠於他個人，用力尤多。爲了叫人民肯作一切的犧牲，一定要叫他們具有戰時的

心理，所以不管獨裁者是否真想發動戰爭，他的宣傳也必須是贗武性質的。爲了叫民衆肯受他的宣傳，還要製造一個敵人，甚至兩個，三個，愈多愈好，但其中須有一個最可怕的敵人，並不一定要真有其事，只要說起來很可怕就夠了。在二次世界大戰發動之前，德國全無外在的危險，各國都熱切的希望和他保持和平關係，張伯倫之流一面儘一切可能想滿足她的貪慾，一面向希魔言甘禮卑的謀求妥協，然而希魔却告訴他的軍隊：「德仍在種種敵人壓迫之下，你們曾在過去爲那紅色的毒龍布爾什維克主義蹂躪過，現在你們應在神聖的旗幟下盡你們的任務：……」在德義干涉西班牙內戰時，戈培爾却說猶太人共產黨在奪取世界的領土，現在是開始於西班牙，德義都將不免被蹂躪。

納粹領袖們並不愚蠢，他們爲什麼專說這類毫無意義的話？就是因爲這類話可以達到他們所希望的目的。對於獨裁者一個敵人可以達到兩個目的：（一）可以使民衆贊同備戰，增加軍事費用。（二）民衆只有在戰時或怕受他人的進攻時，才肯接受甚至歡迎他們自己的自由權受到限制。

對於反動的宣傳人員，戰爭是大有利於他們的。當民衆身心都爲戰爭而激動的時候，對內部的不滿自然停止了，同時他們還自動的不願意與外國的意見接近。沒有一個國家在戰時能夠自由的允許書籍報紙入口，甚至個人的書信自由全受限制，人民也不再公開的自由的表現他們的思想。所以在一個國家中，人民接受一切檢查制度的程度是要由民衆對個人自由與戰爭之感覺的比重來決定的。人類中的大部分對於一個戰爭發動之後，總是希望自己這一方面勝利的，如果自己的國家能否戰勝尚有疑問，那這個國家的民衆能夠準備犧牲更多的個人自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人所接受的關於個人自由的限制，即大於過去的波爾戰爭（Boer War）。而在這第二次大戰中所犧牲的，尤大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明證。

造成強敵環伺的空氣，獨裁者不只可使民衆接受個人自由的限制，且可使他在內政上爲所敵爲。並可加強那種英雄的民族的神話理想，產生自驕誇大性的國民團結。

在一個共同的目的下，使人們團結在一起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叫他們感覺在他們這一羣人之外兇惡而危險的東西在威脅着他們。喊出來「與污穢，愚昧，貧窮戰鬥，」比說我們應保持公共清潔，掃除文盲謀求普遍的富裕要有力。英國在第一次大戰後若干人呼籲國民的體格標準日弱，社會並不注意，直到在畫報上看見納粹士兵的體格強悍，想到這些士兵將來有一天會來與英人作戰的威脅時，他們才認真的注意起來國民的體格。

這種現象，我們很容易在宗教史中找到證例，凡是現代獨裁者運用的以外在的危機為恫嚇，使人甘願接受約束的生活以及造成羣體的團結意識，在過去許多宗教的奮鬥經過，可供我們參照。

每一宗教的建立，多是由於一少數的熱心人士爲了他們的信仰，打算犧牲一切，甘願作爲敵視，譏笑，詈罵的對象。這一羣人可以忍受一切，因爲他們感覺他們這一個小團體，是爲敵人和魔鬼所環伺着的，他們會永保持着這觀念奮鬥下去。度着一種嚴肅的生活，凡是離開了宗教的情緒，都認爲是罪惡，過於愛自

己的兒女妻子也是罪惡。(這自然是指歐洲的宗教而言)人類在地上的牛活就是爲了奮鬥，教友就是共同奮鬥的同志。

有許多教會在精神上已獲得了勝利，教友的地位已爲社會所承認，他們還保持着上述態度。這時候我們可以說這個教會已由文化的戰鬥，步入了經濟的戰鬥，例如土地貧瘠，氣候或地理的情形使生活不能富庶，或是在一種苦難的或方在開拓的社會中，人民要生活即須戰鬥，在這社會中那教會就必須在精神界中配合着這戰鬥，或則予人民以安慰和滿足他們的精神願望，或則二者兼而有之，於是人民的扎拚也可藉教會而不致感覺到失望和無望了，生活雖苦，有信仰的人民則可把希望寄託給天堂。人類永覺着一個敵人當前，無法在人世間克服他時，自然就會造成了出世的意念。反之如果生存漸漸變得容易，社會繁榮，生活的壓迫解除了，於是除了一部分極端份子或把自己幽閉在寺院中，或則到曠野山谷中去繼續他們的苦修生活，其餘的人則將漸漸使自己穿的華美，逃避齋戒，苦禱，改爲吃的也好，其感情思想也漸漸離開天堂了。教友之間，也因爲壓迫已除，而不

再是一羣弟兄，與不敬上帝的異教徒也有了往來。財富與社會形態把他們分裂爲若干小組，教會首先失掉了掌握他們生活的力量，繼而失掉了他們的信仰。所以如果一個社會安定富庶使每一個人都能安居樂業，教會的當局就要痛苦了。歷史上有不少的前例，今日世界上也有許多實證。

這種宗教的衰頹的挽救，就是要她再遭遇到迫害，不必說有實際的迫害加到教徒的身上，就是一種意識形態方面的攻擊，也可以叫她獲得改革與新生。有了新的迫害，大家又可以有了新的奮鬥精神新的團結，迫害一過，自然衰頹也會漸漸又復產生。

在一個被圍攻的城中，民衆團的結合作感情一定非常之高，在危難中，民衆無須有人指揮，團結感情自然展開。在戰場上的士兵的敵愾同仇精神，向來是非常之好。所以什麼團結人類，也沒有使大家感到處於相同的危機之下來得有效。在這種情形下，他們也遂願意承受一切的限制，一切的困苦，一切的災難。也就爲這理由，使現代的宣傳人員對於「敵人」，覺得是最有用的東西。利用「敵人」對內，

方法既簡單又經濟，因為恐懼在人類心理中是最容易使其發展的一種情緒。同時在真實的或理想的危機下，還可產生一樁有利的條件，就是使大家容易信仰一個領袖。因為在危機下，他們必須有一個領袖，就是最有勇氣。最有創造力，不須依賴他人的人，也知道一個個人對應付經濟危機和外國軍隊是沒有用處的。顯然的在那種情勢下，一國的力量必須組織起來。所以在戰時，每一個人都服從一個可信的領袖，除非那領袖有了太大的過失顯然的無能，和不斷發生不幸事件，他很容易得到民衆的信任。只要戰事一起，羣衆的心理會有很大的變化，八一三戰爭開始上海民衆幾乎是狂歡的歡迎這戰爭的到來，即使平日反對戰爭的也表示了歡迎。在戰爭中任何的將軍只要有能力有幸運打幾次勝仗，很快就會變成英雄。假使戰事進行的很不順利，現當局使民衆失望，大家就希望另外一個人——一個救主的出現，把事情弄好。邱吉爾在二次大戰中對英國人差不多就是以這麼一種姿態出現。民衆要求這救主能夠創造出來一些奇蹟，如果他真能作出來一些成績，他就會使大家像小孩子一般的信任了他！爲什麼人類會產生這種信仰 其心

理在以後我們將另詳細探討，現在我們可以指明一件事，就是民衆的心理，使作宣傳的人產生了一種觀念，以一個個人爲中心，作宣傳更有效驗。他個人的行爲，可以使人發生興趣，在無線電中，他個人的聲音，可使民衆感覺熟習，一些英勇的行動，機敏的決斷，凡可打動大衆的心的，都可以歸於這一個人，如果歸功於一羣人，那宣傳的效力就差多了。

甚至在蘇聯其偉大的成就，很顯然是由於一大羣由選舉產生的有能力的人們共同努力而得的結果。他們仍覺得推出一個史達林來，使他成爲若干小民族以及由那些民族形成的蘇維埃共和國的效忠焦點，作爲蘇聯的一個象徵人物是有效的。因爲人民固然尊重議會，爲了保持這制度及其所代表的意見，甚至不惜以死力爭，但他們也可能愛一個領袖比愛一個觀念更多一點。因爲人是一個實體。

在中國每當社會紊亂到頂點時，鄉民就會希望「真龍天子出現」也是這種心理。所以一個領袖不一定事實上真是很值得信仰，但在危難中也却可能意外的獲得人們的信仰。英國的伊利莎白皇后她猶疑不決，喜怒無常，她使國家所賴的

海軍挨餓，她不能信任英格蘭的最有才智的人，在平時她是一個凡庸無能的皇后，只以她在位的時候英格蘭外來的危機非常嚴重，於是在英格蘭人民眼中她是他們的獨立安全的象徵，不論她如何虐待他們，依然對她效忠。

前一次大戰的時候，英國的徵兵當局以爲印貼下列的句語，對徵兵較有效力：「你們的國王和國家需要你。」同時伴隨着第一次大戰的苦難，當時的英王喬治第五，獲得了比平時更廣大的擁戴。事實上英王對英國的苦難，並不會有太大的幫助，依照憲法他並不能有什麼可作，但人民覺着他曾有了很大的助力，大家都承認他領導着他的民衆渡過了一個最困難，最危險的時期，自然實際上他並未領導，他只是照常的生活着，他是一個嚴正堅實的人，他愛人民同情人民的困苦而已，經過報紙，電影天天的宣傳，使人民知道他仍在照常工作生活，（這是國家安全的保證）並同情他們。在戰爭中，人民心理上所需要的就是同情與保證。宣傳以他爲代表把這兩者都給了民衆，他於是得到異乎尋常的擁戴。

危險，混亂，絕望，可使人們傾心想望一個領袖。同時沒有什麼比可怕的敵

人及其威脅更易於造成危險與混亂感覺。所以對於敵人的厭懼，使民衆可以原諒領袖的許多破壞的暴虐的以及其他的行動，給領袖許多便利。精神分析心理學家弗洛特曾說過，人類實在比他們自己所擬想的自己更爲道德。在文明國家中的人民自幼被教養成不相信把刺刀刺入他人的胸膛，用炸彈把婦孺炸得粉碎；或者把婦孺餓死，派間諜出國而不告訴他們，他們可能被捕被槍決，是一個有知識的人的組織會作的出來的，其實他們完全錯了。假如是一個他們信仰的領袖叫他們去作，他們會很容易的去照辦，而以爲領袖這種行爲是可寬恕的。

人類受了威脅就會傾心於一個領袖的趨勢。獨裁者及其宣傳人員，是最注意的，製造一個敵人爲他們所造成的其他的方便。都不如這一趨勢對他們更重要。製造一個敵人既對他們有這麼多這麼大的好處，我們自可了然一些獨裁者爲什麼那樣容易震怒和喜歡作愛國的狂熱的表示了。敵人是他們最好的武器，一點也不錯。

不過我們如說獨裁者，對他們的行動自己都很清晰的了然，也不是事實，人

們可能很熟練的運用一種力量，而不了然其真實的性質。他不一定會自己對自己說，「我需要一個敵人——到那裏去找一個敵人？」他可能只憑經驗來工作，假使他有一個理論也一定是零斷不合理的理論。像希魔並不見得懂宣傳理論，他只知道在什麼時候要叫那些暴民叫喊，又知道煽動戰爭的言論可以使他們叫喊，並增加對他個人的信仰，於是他就說那類話引起暴民的反應。

人類的敵人，可以是一個人，一個國，也可以是蝗災，旱災，疫癘，不過納粹法西斯獨裁者們，却不會使他們的民衆以蝗災，旱災，爲其敵人，他們的口號多是觀念的像「亞利安主義」，「民族的光榮」之類，但他們的敵人却須是人。希魔說過，好的宣傳，一定要用最愚蠢無知的人都能了解的內容與形式。愚蠢無知的人所能了解的，一定要是人身化了的觀念。像罪惡化爲魔鬼，頭生雙角還有尾巴。共產主義化爲頭髮蓬亂的布爾什維克黨人，手上染着貴族僧侶的血污。沒有知識的人告訴他們，我們要和日本人，德國人作戰，比說和納粹法西斯主義作戰容易叫他們了然。爲此獨裁者遂要求有一個「人」的敵人。

還有如使民衆團結，反對人類的觀念敵人，尚可產生種種不便的情形，例如以疾病爲敵，就可能引起來爲什麼不以貧窮爲敵的疑問，因爲誰也知道貧窮是百病之源。再則以觀念爲敵，很容易使人牢記而不能改變。獨裁者的敵人却最好能夠自由改變。假如他想要把人民用於救治病人的款，改撥爲製造毒氣的經費，他必須有權自由移用，而不必爲人民的考慮這兩種用途的價值的觀念所縛束。所以一定要造成不論是用於病人或用於毒氣的好不好，須由他決定。他說好就是好，說不好就是不好，思想與決定權只能屬於獨裁者個人。

如以人爲敵，就沒有這類不便了。這類人一定被認爲是惡人，如能把他們殺掉，則可以再代以其他的敵人，即或不能殺掉，而獨裁者的政策有了改變時，也可以說因爲自己的勢力日增，這種敵人已不值得重視，或說已看出了他們的無能，不再可慮。或竟說已可不再注意他們了。一個胆怯的人，深夜在一個森林中，幻想着其中有野獸盜賊要得他而甘心，於是他的畏懼與敵意可能爲了一些聲音，一點光亮，踏上一塊石頭，或撞了一株樹而隨時變易。一個國家的人民如不

了然一切在如何發展，而只相信他們在敵人的包圍中，國內到處都是間諜和奸細，在這種情形下，自然也很容易改變其敵人。如果獨裁者對國外方面的敵人想稍停止一下進攻，他可以把目標轉移到國內的奸細身上來。獨裁者要製造一個敵人，爲了兩個原因，一個原因前面已經說了，使民衆感覺是他在領導着他們，反抗着一個國外或國內的敵人，而使民衆認爲他很重要，如果他們的緊張弛緩下來，懷疑消逝了，他們需要一個保護者的心情也要泯滅了。

第二個原因則是：當民衆在懷疑緊張中（這種感情容易使之產生，而不易於使其消滅。）他們的感情將像深夜在森林中的人一樣隨時隨地可以找到一個敵人，但可能不是獨裁者所需要的敵人，甚至失敗到獨裁者不能把握那局勢時，他自己却變成了民衆的敵人。所以獨裁者爲了找一個替死鬼，爲了對國內施行軍事獨裁的藉口，一定要自己製造一個敵人。如果獨裁者殺了一個人，這個人的親友將都恨他，如果他攻擊另外一個強國，即或一國的使節知道那是獨裁者放的空砲，然而那一國的民衆都將恨他。所以最好的辦法是指摘另一獨裁國家，由兩個

獨裁者先訂一紳士協定，使各自的民衆不知另一方說了些什麼。但這辦法，獨裁者們也會感覺這不是完全可行的，這是一個很危險的難題，往往因為掌握不住環境，他的戰爭宣傳本另有目的在，結果竟真的造成「戰爭」。基於同一理由，革命叛變，往往也緊隨着戰爭而來，由國外敵人引起的敵意，結果轉到了國內高壓的統治者身上。

是以獨裁者的宣傳，必須是贖武主義的，恐怖主義的，並且是永不間斷的，因為非如此不可！

國外的敵人，需要國內有軍隊；鎮壓不服從的人，需要國內有軍隊；爲了獨裁者的榮耀，也需要。希魔常常說，軍事訓練，在獲得他所需要的像牛一樣馴良的公民上，是很好的一種方法。作爲軍事的最高領袖，獨裁者還可以得到民衆中體魄壯健可以形成一個危機的人們，願效忠於他的親切感情。德國的全部軍隊，都要宣誓效忠於他們的元首。——宣傳贖武主義的好處在此。

宣傳恐怖主義，在獨裁者也是必然的，用點野蠻手段，對於獨裁者可說等於

很聰明的投資，在軍隊中要注意到每一伍的份子從根本上阻止反對力量的產生。聰明的用一點恐怖手段可以恫嚇住一大部分已想反對的人。如果所製造的一外國敵人」的宣傳仍有效力，民衆就會想，我們已有儘夠可怕的敵人了，不要再惹惱這可怕的政府，再添上一層恐怖。

說到這裏也許有人以爲過去蘇聯的宣傳也對國外國內的敵人特別強調，其意義是不是也和納粹法西斯政權的宣傳一樣呢？這是全不一樣的。德義的納粹法西斯之得掌握政權，並不是由於武裝革命，而是由於得到資本家的慫恿支持，和納粹法西斯急於想攫取政權而甘心願作資本家的工具，從他們攫得政權之後，雖也會有不少的困難，但却全未遭遇過任何真正的危險，不論是內部的叛變，或外國的進攻都不曾有過，這第二次的世界大戰事實上也是他們自己發動的，而不是那一國想先進攻他們。雖然事實上如此，但德義自希墨二魔執政後，卻沒有一個星期中止過，激動人民反對國外的敵人和反對國內的猶太人，天主教徒，社會主義者等，在這些宣傳中，還永遠伴隨着對於他的兇蠻和無敵的誇張。至於蘇聯共產黨

之得掌政權是經過了艱苦的軍事努力，他們不只要應付很艱苦的內戰，且須抵禦可怖的外力侵略。列寧曾遭暗殺，史達林也是反動派想得而甘心的人。蘇聯在過去可說從未能沒有外敵進攻的危險，她的外敵認為什麼時候適合，便會什麼時候對她發動戰爭，在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義大利從未放鬆過威脅蘇聯，希魔更是用了無數的金錢，想在烏克蘭為蘇聯引起糾紛。所以當時蘇聯的納粹法西斯敵人是千真萬確的現實。至民主列強的友誼或中立，却不一定靠得住，依西班牙內戰的前例，蘇聯便可推想到一切。在這種環境下，世界上那個政府能不加緊警惕着她的敵人？所以納粹法西斯的強調敵人與蘇聯之強調敵人自不可同日而語。

現在再回到納粹法西斯的宣傳技術上來，他們的宣傳必須力求普遍並須永不斷。在一個謊言將露馬脚之時，必須先把民衆的注意力，轉移到其他方面去。發見所創造的感情浪潮漸趨衰微了，必須再為民衆準備一個新的刺激。一項諾言已顯然不能保持了，必須再以一个新的諾言來代替。

此外獨裁者的功業是不能允許民衆遺忘的，所以德義兩國有這樣的標語，「

我們能生息於此，應當感謝元首。「謝謝你，領袖，我們能吃到我們的麵包。」同時須以虛擬的敵人鼓舞起來民衆的信仰與恐怖的熱情。還要使大家相信政府是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無何不知。並且宣傳決不能鬆弛，因為一有空隙，就可使民衆產生懷疑而妨害了那人工造成的信仰。

基於同一理由，宣傳必須普遍的觸及，一個人也不能放過。對嬰兒，要說他們是獨裁者的嬰兒，對老人也要說是獨裁者的老年的部卒。學校要用爲製造兒童崇拜獨裁者心理的場所，不論什麼性質的機構，如若允許他存在，也要以代爲造成崇拜獨裁者的心理交換條件。最愚蠢的人的心也要觸及，每一個人都要能懂得他的領袖需要他怎麼樣。任何方式，不論是藝術方面，教育方面，宗教方面，都要運用，任何工具也不能放鬆，不論是無線電，標語廣告，講演，展覽會，報紙全都一樣。不許討論，不許有相反的意見，不給人類的理性一點點機會，使他破壞了獨裁者的神話式的理想。

第二部

人民接受宣傳的緣因

第六章 論羣衆

在前面我們曾說過宣傳一定要適合了當時當地民衆的心理，才能產生效力。如果這是事實，那麼即使作宣傳的人是一個極有權勢的獨裁者也必然是一樣。所以在我們了然納粹法西斯的宣傳真象之前，我們先要解說一下，各該國家民衆在接受其宣傳時，他們的心理狀態如何，還有獨裁者在建立其特殊地位時，民衆對他們的感情狀態如何。

爲什麼獨裁者要以我們所知的他們所採用的那種方式宣傳而不以其他的方式宣傳？要知道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先問爲什麼一種宣傳會在一個社會中成功。爲什麼成熟的文明的受過良好教育的民衆，會擁護削減自己的政治權利，並降低自己的生活標準？爲什麼他們，敬重他們的領袖到近乎崇拜？爲什麼在幾個月之前他們會嘲笑爲異想天開的主義，在幾個月後竟信仰起來？不錯，各種樣式的納粹法西斯政權，開始都是以武力壓迫並非心甘情願服從的大多數民衆。但是爲什麼

後來似乎民衆已樂於擁護這類政權？

這種現象是可注意的，這是許多社會學者經濟學者都未能事前見到的現象，因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許多人已相信民主戰勝了，民主已比過去有了保障，不意竟又出來了這種極權主義。

在一九一四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的前五十年，現在的納粹法西斯國家的人民都顯然顯示了他們的進步傾向。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已極有勢力，在義大利已選出來了自由的政府，日本也已成爲亞洲的先進的立憲國家，在政治社會方面都已變得相當民主，但這些國家竟一旦之間很輕易的放棄了他們所有的成就。

納粹法西斯政權下的許多事都叫我們難於相信，例如在德國到處貼着標語說，猶太人殺了亞利安種的嬰兒喝他們的血。還有德人本是一個有教育的最具科學頭腦的民族，會又把千年來已沒有人再相信的斯堪的那維亞神話中的神祇搬出來崇拜。還有德人今日竟已大部相信了亞利安種族是命運注定了要統治歐洲的，尤其是這種行動與理論竟是政府所支持的，或奉政府的命令而行。回想各國的歷

史，這種逆轉，寧不可怪？

在二十年前，這些情形一件事也不可能在社會中出現，現在竟出現了。什麼理由什麼力量造成這現象？就像一個醫生爲病人診病一樣，我們不只須注意到他的身上出斑疹，喉痛，頭痛，高燒之類的病象，我們更要注意造成那種種病象的原因。爲什麼第一次大戰終了之後在人間仍不能有一「兄弟之愛」展開，仍不能由狹義的國家觀念向廣大的國際觀念，爲什麼不能採用更科學的方法來解決政治的社會的問題？雖然在少數人類中已產生了上述的各種情形，爲什麼不能是更多的大多數？爲什麼已產生了的少數進步份子甚至又行夭折？

要解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對我們所面對的現象的發生和發展之實際情況加以解釋才能了然。只注意到面前的一般情況，是不能澈底了解的。要解釋這些現象的發生和發展，自不能不訴諸心理學的研究（當然人類心想的基礎構造又是經濟），否則很難能完全說明許多事實。

從心理學的觀點來看，爲什麼獨裁者能夠很長期的愚弄人民，其非理性的宣

傳可以能有成就呢？一般的說法就是：「當一個人真變成了羣衆之一員時，他往往不再是原來的理智的自我了。」作爲一個個人時，他可能很有理智，有批評力，可以判斷社會的政治的事件的是非，並可以以理智抑制自己的行爲。一旦他置身於羣衆之中成爲羣衆之一員時，往往這種能力就都中止，而純依本能來動作了。他的心志可能降低到很低的水準，他的批評能力完全停滯，事實也把握不住而變成了極易接受他人的演講並聽從其指揮的人了。在他人影響下，他可以作出極貪婪，野蠻，兇暴的行爲，有時候也可以使他有極端勇敢與自我犧牲的精神，換言之就是他變成了感情的動物而非理性的動物，——並且成了極原始的感情動物。

這一說法，首見於十九世紀中葉法國勒蓬（Le Bon）所著的「羣衆」(The Crowd) 書中。這裏所以要提到勒蓬，是因爲希魔雖不一定曾經讀過勒蓬的書，大致他是襲取了勒蓬的意見。勒蓬是一個法國革命中的反動份子，他所謂「羣衆」在他的心中指的是巴黎的暴民，他以爲巴黎的暴民，只是在街頭集合，變成非常神經質非常危險的一羣，他的理論是在這個假定下形成的。例如他描述一七

九一年九月的屠殺，暴民打開了監獄，殺了所有的囚犯時，他說「馴良而體面的巴黎商人，也加在暴民羣中，變成了野蠻殘忍的兇手，以一種非必要的酷虐狂，把他們殺了的人慢慢的切成許多小塊。他覺得這是一種可怕的值得注意的現象，將強迫一切有思想的人對人類的本性，尤其是民主，完全失望。

假使他的話是真的，一個人如成爲羣衆之一員，他就落在了講演人的掌握中，他叫他去殺人，他也會去殺，那麼現代獨裁者宣傳的成功就可以獲得充分的解說了。希墨二魔都是駕馭羣衆的專家，他們所組織的，廣大的示威運動，是他們的政權中的一種不可磨滅的事件，其熟練的集合，遊行，裝璜，煽動，他們要求什麼就會得到什麼。如果這種魔術就像勒蓬所想的那樣有效，那情勢就太可悲觀了。

幸而事實或並不完全證明他是對的。仍以法國的九月屠殺來說，似乎也不能認爲他說的全是事實。我們知道當暴民打開監獄之後，確有些人從事屠殺，但也有一羣人並未參加。布瑞德萊（E. D. Bradley）在所著法國革命簡史中說：「

羣衆看着屠殺只有一小部分人從事殺戮。有時候由馬賽人及其他的人幫忙。『所以那種說馴良體面的商人，也在羣衆中改變了本性的說法，是不盡可信的。這一屠殺並不是一種未經預想過的暴民的一時感情衝動的表現，正相反，牠是事前曾經籌畫過的事，並經天天盼望着牠實現。

那屠殺之發生，是當外國開來幫助王室的軍隊已侵入了法國。革命的成功已有了危機之際。八月十日法王被囚，屠殺始於九月二日，那時前方有種種不好的消息傳來巴黎。羣衆知道凡爾登堡已再守不了一個星期，法國的兩隻軍隊已被切斷，兩週之內敵人已可能進抵巴黎。民衆大家互問：『假如我們到前線上去，我們能在後方監獄中留下我們的敵人，使他們可能隨時打開監獄屠殺我們的妻兒麼？』這可說明屠殺的動機。而且在這屠殺中，娼妓普通罪犯並未與政治犯同被屠殺，可見這並不全然是一種盲動。

在現代各國的示威運動中，如有打破窗櫺，搶劫了商店，據警察的報告，罪犯幾乎全不是示威者之所爲，而是歹徒乘機騷擾，如有由體面人領導而發生的

混亂，那也是由罷工糾察隊和工賊的鬥爭而造成。所以勒蓬的說法是太誇張了。

不過勒蓬的說法，也有一部分是事實。人在一羣激動的羣衆中是比較易於受他人感情的影響與指揮，比單獨一個人時減少了自制與傾向理性的可能。一羣羣衆的感情是易於傳染的，其中的每一個個人很難抗拒其感染。例如恐懼的感情，在羣衆中就傳播的很快。個人在羣體中感覺是無抵禦力的，不能堅持其個人意志，因為他已是不能自行負責的人而追隨着其他羣衆。

同時，個人在羣衆中成爲一個無名氏，一般道德的制裁，法律的限制，以至輿論等全都對他失了效力。雖然旁邊有幾個警察，但警察人少，羣衆數目大，於是自覺勢力已大於警察。羣衆中每一個人都會作此想：「我們幹什麼，也沒有人管得了。」這一感覺對大多數的人，尤其是平日自覺地位卑微的人，會使他們很激動甚至很快樂。

然而甚至就在這時候，他們的行爲，仍可能不爲公衆所同意，因爲在那時還有屬於這「羣衆」的「輿論」。作爲對他們行爲的限制。不過在羣衆中，民衆以

爲避免批評而預備放任自己的感情，也是事實。在幾千同志參加的擁護下，他們可能作出來他們一個人時，所不敢或不要作的事，作了之後自己回想都會暗覺驚訝。美國的商人自己或和家屬到一個飯店，他們的舉動，絕對合理，但他們成爲一個會議中之一員時，在同一飯店中他們能盡掠飯店中可以攜出的什物，他們的藉口是要拿那些叉匙，面巾，煙碟，小雕像等去作紀念。英國法庭曾審過一個案子，二十三名伍長到一個咖啡店去吃了許多食物，不肯給錢，一哄而散。伍長誰也知道是由士兵中選擇出來的品格優良的人，似乎不應有這類事。但一多至二十三人，他們竟幹出來這種行爲。爲什麼在羣衆中人會有這種感情？又爲什麼常常其行爲又多是暴亂的，而不是人類純良本質的表現？在羣衆中，爲什麼其文化程度較高的份子的情緒，不能壓倒其他份子的不良情緒？比如一到假日，大家的遊戲地方一定弄的狼藉滿地，這些人平日並不都是不愛清潔，或是自私的人，實在是因爲他們偶爾作一點犯規，自私，留下點什麼給別人打掃之類的放縱的事，使他們感情可以得到快樂。

所以爲什麼羣衆中的各個份子常常比他們自己只一個人時易犯「惡行」，其主因是並不難了然的。社會中的領導者總是以刑罰爲手段，要求民衆按照所領導的方向前進。在不同的社會中領導的方向雖不相同，然而多半是要求有「善行」。這種要求往往與民衆心理上的要求不一定能夠完全一致，要經過種種的人工手段，說服民衆，使民衆自己約束自己，依照領導前進。民衆自己很了然，他們只有不斷的努力或多方努力，才能服從某種道德律條，如果發見有違反的危機時，就須設法預防，例如脫離有發生危險可能的環境，禱告，向教士懺悔，或設法使自已抗拒引誘之類。人類常常能自覺的冒這類危險，有時是我們勝利了，但失敗的時候也難免，在羣衆圍繞中，當其他的人都想放縱一下自己的衝動時，就更難於控制自己。我們誰都是不願意喝醉了的，但當有一件極快樂的事發生的慶祝筵席上，人一多，就許大家完全喝醉了。

這種自覺的掙扎，我們大家都很熟習，我們也知道我們具有一種對禁止的行的衝動，非常強烈，社會勢力如果稍爲微弱，就可能使我們不能勝過我們想破

戒的衝動。

人類所不知道的——這是到最近才發現的——是我們的意識也是由衝動圍繞着的，如果我們了解這個，我們會很悲哀，但是我們往往不知道。

這是很普通的，例如有些人陷於狂烈的嫉妬而不自知。他們對造成他們嫉妬感情之人，很難保持常態的行為，和他們接近的朋友，可以很顯然的看出來。但是他們自己既不認爲那是內在的錯誤，也不認爲那是「本能的」不喜歡，他們也拒絕承認他們的感情含有敵意，也不承認他們的行為反常。假如直接指出，他們的行為純然的是由於嫉妬，他們會大笑着說：「什麼？我喜歡那傢伙！」或者變成非常氣忿。

同樣一個人如在盛怒之下殺了別人，可能在他已殺了他的那一刹那，完全不自知他作了這樁事。

事實上我們常不自知的被一種引誘不斷侵襲，或被一種錯誤的企望引誘着，我們却自以爲那是一種正當的企望。假使我們不爲牠們所屈，也不是因爲我們未

被誘，而是我們用以克服那種企望的心理機構，根本否認了有那種企望存在。讀者對這種心理的解釋，也許以爲很新奇吧？因爲這種心理及其所引起的現象，在個人和羣衆的政治行爲上有極重要的影響，所以雖似離題較遠，也應略作解說。

我們都知道，有一種不顯明的力的緊張和衝突，存在在物理界中，一座古老的大教堂，看來似乎很和平的矗立着。但是實際上牠的每一堵牆都在受着上面屋頂的重大壓力。同樣一部汽車可能駛行的很安靜，平滑，使一個人忘掉了牠的機器，不知道在這汽車的引擎中，正有着廣大迅速無間歇的變動。這兩種事實對於建築師和汽車設計者都很重要，沒有這種知識，他們將不能進行他們的工作。同樣現代的心理學家也可以很顯然的看到一個文明人類的心的平滑的功能，是許多極劇烈的力的緊張與衝突的最後結果。雖然他們並不能直接的觀察，但可由其影響而了解。一個人不能自知其心理，猶如不能自知其身體內部的化學變化過程，和他每有一動作時其每一組肌肉和另一組間的牽引情形一樣。

爲了對這種心理衝突有一些滿意的了解，以期適合我們研究宣傳的目的，我們必須知道兩個要點。(一)是人類的心理的領域內有由普通的觀察不能接觸到的地方。(對於這原則，本書不能多作解說，可參看其他關於弗洛特心理學的書籍，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中，即有關於弗氏精神分析學說之書籍)(二)心理衝突之出現，簡言之一方由於原始的生理的要求形成的一種概念，而這概念却被人認爲是惡的不應有的；另一方則是阻遏的力量，例如意識，美感，社會的或社會學的觀念。上述生理的要求，我們可以在動物，嬰兒或極小的幼童身上找到牠自由而不成熟的表現。至於阻遏的力量則在人類日常生活中隨處都可以發見。這兩種衝動可以相互劇烈的反對，但雖有這種衝突在一個人的心上發生，他却可能完全不知道。

這一說法也許仍不能使讀者相信，猶如一個建築師之不易說服一個游歷名勝的旅客，使他相信那和平矗立的教堂的牆在受着重壓一樣。除非那旅客原有一些「重力」的科學概念，否則他一定以爲那建築師是在白晝作夢。所以讀者如沒有一些心理學的常識，這說法也就比較難於得到他們的信任。不過如讀者仔細觀察

你的親友，教師，或你的上司的行爲，每當與一個他們不願意接近而又被環境壓迫非與之接近不可的人的時候，你就可以找得到這學說的證據了。還有在一個家庭中我們可以看見，一個家長發脾氣的時候，當他想到自己的家長地位時，他的脾氣就消失了。再如一個教師在一班學生中有他心愛的學生，有點偏待他，每一個學生都看出來了，可是那教師自己却仍以爲自己是一秉大公。在政治上，政敵很容易看出來對方的擁護與反對某些政策，都是基於其階級或個人的利益，而他自已却以爲自己的行爲基於爲公衆謀福利。在兩性間一般朋友都以爲他們兩人已經有相互愛慕了。可是他們自已也只覺得對方相當有吸引力而已，到最後，一定有一天，其中之一對對方說了：「我雖然過去並不知道，但我想我已愛你愛了很久！」

工廠主人的兒子送到廠中來學習，儘管這孩子馴良而尊重工廠中同伴的經驗學識的，也會引起工廠中同人心理的許多揣測誤解，誤解一經產生，他的一舉一動，都可解釋爲故作謙卑，或者侮慢，驕傲。「你看見咱們的『太子』，今早驕

傲的和我點頭了麼？我想他一定以為我們會認爲他注意到我們是榮幸呢！」這位說話的人，他可能完全不知道他爲了嫉妒而歪曲了一切的事實。

一個女孩子可能受到種種關於她的品行的誹謗，其實那誹謗的流傳，並不一定是由於傳說的人都相信她不道德，只是因爲她美麗動人，遂招來了這種敵意。「那個女孩子對男人們的那種樣子簡直叫我『惡心』的要吐，我活到一百歲也不會像她那樣下賤。其實她也很蠢，她不知道她那樣反叫男人看不起她，我真可憐她。」用這種話攻擊另一個女孩子，她決不承認爲了嫉妒，或想中傷對方。如果一個女孩子是很害羞馴良的，就受不到這類攻擊而又要被入說驕傲，看不起人之類了。

人類的感情可能一時隱藏不顯，而到後來才能發現。一個中產階級的人，一朝在思想上有了改變，他會自己感覺到多少年來面對着社會上不平等的事實，自己竟瞎子一樣的視若無睹。他其實到這時仍然只了解了一半，他如進一步追求，才能了然那使他視若無睹的原因。是他自己的一種不自知的願望，——即想儕身

於富貴豪華之羣，和想避免在金錢上，時間上的損失以及發生不幸的犧牲。

知識份子往往也不自知其失敗之因，也不完全了然自己每一行動的動機，而且他們自己還不肯承認有這種事。事實上乃是我們的心機械運動，影響了我們的意識行爲，我們確是完全不了解。

我們不自知這種種衝動的原因是什麼？我們或可如此解釋：

動物和小孩子都有很簡單的需要，最顯明的是食物，飲料，棲身之所，溫暖。當他們需要時，他們立刻便要得到。並盡一切自己的能力，想得到牠，而不管是不是會被認爲頑皮，自私，或煩擾他人，有害他人。如果他們失敗了，於是他們變爲害怕，也許變爲憤怒，跟着遂充分表現出來他們這種感情。動物園中的獅子，或六個星期的嬰兒，爲了飢餓而吼叫而大哭，是沒有人認爲不禮貌的，如果一個孩子爲了害怕而驚叫，也不會被人批評爲怯懦。

但是人一受了教育，這些簡單自然的態度就都消失了。兒童甚至小狗，人要教給他們，要什麼也許得不到；如果自己去拿是一種錯誤，如果爲得不到所要的

東西而吵鬧是頑皮，粗魯，如果仍然這樣作，就成了「壞」孩子或「壞」狗。事實上小孩子是被大人教育（或由模倣而自我教育）爲：「許多他們的願望，都是惡的。」如果要作一個好孩子，有禮貌的孩子，或將來作一個紳士，一個淑女，或者什麼大人物就不能那樣。更進一步並且教育他們，如果得不到所要的東西，還不許有失望怨恨的表示，如果爲此而恨或不愛使他失望的父母襟母，也是不對。簡單的說，就是兒童一定要學習，不要他所想要的，還須接受許多他所喜歡的，像清潔整齊，安靜，爲他人設想之類。不只是應當不要所想要的，接受所不喜歡的，還須作或並未想要那些東西，並未不喜歡那些事。如果不這樣作，他就是壞，而將不爲人所愛。

這種教育把兒童陷入一種難堪的境地。兒童的一切生活是依靠着所有圍繞着他的大人的，他的最原始的需要，自希望都能得到大人的同意。兒童需要有人愛，更希望時時在指導着他的人愛他，想作被人愛的好孩子。沒有一個孩子不爲這「得大人愛」的問題痛苦，害怕過。同時每一個孩子也有他原始的衝動與需要而

非他所能負責。他只能學習着漸漸控制牠，這學習使他要經過許多的艱苦。例如一個兒童很熱切希望得到一塊朱古律糖而且很有希望得到，可是忽然爲了某一原因得不到了。他也許要搶那糖，也許要爲失望而大哭，也許要打那不給他糖的人。最後在失望和自己是一個頑皮的孩子因爲想作許多壞事的知識下，他變得絕望了，而遷怒於他的母親，踢她，並喊「你是一個不乖的媽媽，我恨你。」其實他是並不想踢媽媽的。他並希望她愛他說他好，可是他的行爲却成爲傷了她，與她疎遠。一個人怎麼能喊了恨媽媽而又希望她愛他呢？這情形是太糟了！經過現代的關於人類心之發展的研究，說明他並非意識的作出來這種事。他是愛母親的從未恨過她，他之踢母親只是因爲他發了脾氣，他自己也只能作這樣的解說，——像這類不能表明的事，也可能在我們任何人身上發生，他在事後已想不出來當時爲什麼要踢，並且很快就忘了他曾踢過母親這件事。

所以在人類的心理上所受的「壓抑」，並不是由於我們人人都具有的原始的衝動而是由於教育我的人所指出的某些確實不對的一切。由他們的態度（或由我

們所認為是「他們的態度」的態度）形成我們的正確與錯誤的觀念。例如我們自己對自己的每一衝動的考慮：「這一衝動是可憎的，我不能容許他成爲我的人格之一部分，另外的一衝動是錯誤的，我知道他存在着，一定要和它鬥爭。至於第三衝動，這是可以容許的。」在不同的社會中的大人，會給他們的兒童注入不同的這類觀念。在獵戶家中長大的兒童，和一個信仰不殺生的佛教家庭中長大的兒童，對於「殺生」的觀念完全不同。一個現代的美國女孩子可以自知直在父母上，她與中國的舊式女孩子相比，相差的程度極大。

因爲由不同的社會，形成的不同的道德觀念，使個個人在控制其原始的衝動的能力上，有了很大的差別。一些神經有問題的人，不能忍抑不說他有性的要求，而正常的人，則只容許自己希望有子女，而不容許自感覺需要配偶。這都是真實而殘酷的事，爲了公共生活的可能，人不能不阻遏或減少一大部分其貪婪以及他種的獸性要求。每一個人以不同的方式與之戰鬥，退讓，有意識的控制，拒絕我們所憎惡而難免發生的一切，以求適合於不同的公共社會。

這種被壓抑了的願望與感情，當我們把牠逐出意識之外時，並不是就消滅了。牠依然存在，我們的教育，我們的詭辯，我們的生活經驗都不能消滅了牠們，牠們依然是照樣，原始的，稚氣的存在着，並且依然活躍。那希望得到朱古律糖的兒童，並不承認恨母親，然而他因爲得不到糖而生的忿恨感覺並未消逝。這種被壓抑了的感情，總是掙扎着要求作正常的表現。

要將一種願望與感情逐出意識之外，一定需要一種更大於它的努力，這努力雖然很大，可是我們並不自知，猶如對願望與感情被壓抑了而不自知是一樣的。這當然很叫我們驚訝。然而這類事在人類的行爲中是很多的，當我站直或走路時，一定要使自己的身體平衡，可是我們並不自知，卽爲一例。現在有人反對這種不自知的衝動（或名潛意識衝動）的學說，猶如十九世紀中大家反對達爾文的生物進化學說一樣。人不信自己會降低到以人猿爲祖先。同樣也不信他的心是由人猿的心進化而成。如果沒有弗洛特的研究，我們對這問題依然可能是全不了解。難題而談的話，到此可以勒住了，我們本在討論羣衆的行爲，說到一個人成

爲羣衆之一員時，一個人何以會作出來本來他們會不肯作的事，或者幹了他們平常所不能幹的行動，現在我們已可以說明了，那就是一個人站在羣衆中被激動了之後，他不只已不再是他所自信的具有理性，意識，智慧，的人類；也已不再是能夠控制若干原始的願望感情的動物了，不論他自己自知或不自知。同時羣衆的力量掩護了他，並使他分負了大家的感情與行動，更有一種威脅使他不能反對，於是一個個人的心的平衡力量被破壞了。原始的願望大大增強，掙阻馳的力量大大削弱，羣衆遂作出搶掠破壞的事來了。作了這種事的人，第二天他看見那搶掠與破壞的殘跡時，他都不信自己會幹出來了這種事。如有人看見羣衆從事破壞，一定對人類的本性懷疑起來。

不過羣衆也可能不顧一切作出來好事，例如不從事破壞而從事於自火場中搶救兒童。這時我們看見，不久將對人類本性之勇敢與不私自表示讚美嗎？其實在羣衆不過表現了相反的一面，其心的平衡力量傾向了英雄的行爲而已。每一個人都可能以勇敢的精神戰勝他自然的恐懼，或者說他的恐懼已變成了怕人說他怯

懦：「大家搶上前的時候，我怎麼能退後，他們能幹的，我自然也能幹！」

所以羣衆一定要能由控制着他們的其他約束自己的衝動中解放出來，才能加強其已存在的衝動。這是一種衝動程度的強弱的問題。一個可恥的懦夫決不敢跑進火場，他不只會退後，並爲了掩飾其行爲可能到處亂跑，並對別人下命令。一個真正有大智大勇的人，在暴民要實行破壞時，才能極力阻止，這樣的人，也可爲人踐踏致死或被亂打致死。至於中庸的人就只有接受一般的感染，跟着羣衆行動了。

此後，我們要進一步研究爲什麼某一羣羣衆，會發生某一種特定的衝動。這一問題，可說在上面所述的種種中，已經解答了一分，不同的社會不同的階級中的人，各傾向於壓抑不同的衝動，美國南方的貧苦白種人的集會，可能造成濫殺一個黑人的事。而英國「朋友教」教徒的集會，則決不會有這類結果。對於虐待猶太人的提議，在德國雖能成一種盲動，在其他國家則不會如此，不過任何的羣衆在任何地方都可能作出來許多可好可壞的行爲，例如能夠搶掠鄰近的居民，也

能夠聯合起來成爲一羣了不起的英雄。他們將作什麼，作到什麼程度，則以所予他們的刺激的程度以爲斷。現在我們更要進一步研究的，就是什麼是決定羣衆行動的一切，因爲羣衆的行爲也不是偶然產生的！

第七章 論領袖

在前章我們談了許多關於羣衆的話，不過我們並未給羣衆下一個定義。我們所說的羣衆大體是指一羣人集聚在一個地方而言。而羣衆的集合，還可以分爲有目的的集合或無目的的集合，又可分爲有組織或無組織的羣衆，暴民或知識較高或較低的羣衆。不過這對我們所要研究的宣傳，並不是十分重要。因爲今日的報紙，電影，無線電廣播，已使宣傳人員的工作效能不只限於集合在他們面前的羣衆了。蔣主席就職的影響，並不只及於他就職那一天，在國民政府參加典禮的文武官員或在重慶國府路一帶居住的市民，而是凡能看報紙聽廣播或過若干日在電影院中看到就職典禮新聞片的人，都等於參加了那一典禮。所以今日的政府宣傳是應以這種方法來看才對。一個部長準備一篇演說與其說是爲了直接的聽衆，無寧說是爲了新聞記者。外國羣衆的示威遊行，並不一定是只爲了叫在街上遇見他們這遊行行列的人看，而是希望得到輿論的反應。這種宣傳戰

術的成功，就表示出來，一個人雖然獨處，但因為讀報，聽廣播，看電影，而恍若置身於一羣人中，並對他們的意見發生反應時，就是在心理上他已是在羣衆中間了。一種情緒的實現，不會很尖銳，也不會很突然，只要天天不斷的宣傳就可以收到那效果。宣傳人員因為他的羣衆是分散開來的，遂更有可以欺騙他們的好處。對於他所宣傳的一切雖然舉國漠然他却能硬說舉國若狂的歡迎。報紙則可命令牠們只許刊載與此相同的報道，如果沒有，可以偽造。其餘方面，如廣播等，也可如法泡製。所以在納粹法西斯國家中，其真實的輿論情形，很難斷定。宣傳一走上這條路，羣衆心理的力量就要開始發生作用了。製造成了必需的條件，於是所需要的感情的力量雖不存在，也可以有假冒的產生。

必需的条件是什麼？為什麼在某一場合之下，羣衆會作某一件事而不作另外的事呢？

這就是要以當時的情勢來決定的了。過新年的時候，人總有點狂歡，因為那

是過年，喝醉了酒，也不算不對；賭錢，也不妨一試。不過一羣人在作一件意外的事時，一定要有一個或幾個領袖。否則雖然一羣人個個都很激動，至多也不過無目的浮動一陣，作些不一致的動作，笑一陣，叫一陣，最後一哄而散。當英國的前王愛德華爲了辛博森夫人這表面的理由遜位時，消息傳出，街上充滿了沒有的但是相當激動的羣衆。那時曾有英國的法西斯黨徒奉命由街上跑過高喊：「我們需要愛德華」，然而這呼聲沒有一點影響，羣衆一點也未認爲他真有需要愛德華的印象，他也未能把自己造成一個領袖。他們的企圖完全失敗了。這失敗大約是基於三個原因：（一）羣衆雖然有點困惑，激動，但一點不失望焦急。（二）沒有人相信英國的法西斯黨徒有什麼行爲能有影響於大局。（三）那青年由街上跑過不但不像給羣衆一種領導，而更多一點像是逃跑，如果他們爬到一個比較重要的地點，提出來一些具體的建議，也許結果要有力一些。我們從個人的經驗可以知道，作一個臨時的領袖的條件雖很簡單且不很確定，但必須具備那些條件。我們可以列舉出來，（一）一個墊高自己的東西，一張凳子之類，（一）

宏大的聲音，（三）有自信的態度，（四）有打動聽衆的能力。

墊高自己的東西，非常重要。牠可以使說話的人被羣衆看到他的樣子並聽得他的聲音，尤其重要的是給了他一個有權的地位。因爲在羣衆中他比較地高了。人人都曾有許多年習慣於由比他高的人——卽成人，長輩，——那裏，接受命令與意見。等他長大之後，他又常坐在低的地方聽人講演，或由音樂指揮，領導着唱歌。大家都承認，一個個人在羣衆當中，是特別容易接受他人的建議的。確實的原因是什麼雖尙在爭辯中，但這事實却已爲大多數的人所公認。他站的高，這地位是已向羣衆「建議」着，他所站的是一個權威的地位了。

宏大的聲音，不只可以使許多人聽到他的話，且可以喚起聽衆兒時的記憶。講演的人如果他的聲音像孩子一樣的窄，弱，尖，很難控制的住羣衆，在戶外，他更要失敗。即使在室內有講演台，有主席，聽衆也是專誠爲着聽講而來，對他也依然不利。至於高亢而沉重的聲音，可以叫聽衆想起來父親的聲音。如果他發出一種表示生氣的可怕的聲音，好像一隻熊在叫，又像隔壁有許多惡狗，這給聽

衆一種暗示，即對他的話，最好是聽下去。

自信的態度也是一樣的情形，當羣衆尚未團結在一起，沒有目的，也沒有自信之時，如以有自信的音調向羣衆說話，不要說：「這是我的建議，大家以爲如何？」而要用更肯定的口吻：「這是無可置疑的——非常正確！——自可以獲得羣衆的信仰，而成爲他們的顧問。如果「這顧問是對的」一念建立，以後再要教導他們的可能就很大了。在我們有能力批評，考慮引用証據與有否可能之前，我們都是接受別人所告訴我們的。如果不是如此，我們所能學到的就很有有限了。我們常常以他人的「確信的態度」作爲我們信任與否的標準。「看樣子他真是作此主張，大約是正確的！」我們可以隨時聽到這類的話。所以要作領袖，一定先須造成有自信的態度。

至於能打動聽衆這一問題乃是最主要的了，勸蓬的理論，也是在這問題的考驗下完全失敗了。他很單純的以爲一切羣衆是會接受「任何領袖」的「任何建議」的，所以他非常失望，因而痛惡民主。其實只有暴徒才甘於接受一切邪惡的

影響。不過今日的專制領袖們，似乎也在相信勒蓬的假設。「使我們站在權威的地位；用我們高亢的聲音使全國的羣衆每一個都聽到（利用無線電，報紙，不斷的自我宣傳，造成自己無所不在的印象之類）；再形成我們是全智全能的地位；於是全國民衆變成了一羣羣衆，一羣暴徒，遂可由我們任意揮使。民衆是無助的，他們會永遠是這樣！」這就是他們的理想。

現在我們要討論的就是這種假設是否事實。爲了決定這一事，我們先要決定三個問題。（一）在什麼條件下，羣衆才服從領袖（在什麼情形下，他們就會拒絕服從），（二）在服從領袖這行爲中都包括些什麼，（三）怎樣才能使服從的態度繼續存在。

先討論第二個問題，當領袖地位被承認了的時候，會發生什麼情形呢？弗洛特教授說，當羣衆們承認了領袖的權威和建議時，就是以之代替他們自己的意識。凡他以爲對的他們也以爲對，他們自己的意識中的一切標準與一切約束能力，都從他們的心上消失了，——也就是被壓抑了，而代之以領袖的建議。

這似乎已可說明了一切的事實，兒童所認爲「對的」，是以其父母告訴他的「對的」爲標準，卽或沒有告訴過他，他也將照如果他父親在這裏時，推想他們全認爲「對的」那一假定的標準，而決定何者爲對。當一羣羣衆，接受領袖所給他們的標準時，正和兒童所作的一樣。一個高高的人，用宏大的聲音，立於權威的地位上說：「來呀孩子們，我們來點起了一把野火（如在郊外露營時）！」雖然在他們心中本存有關於火的一切禁止的意念，如弄髒了自己，弄壞了衣服等，到此都沒有了，而認爲點起一把野火來是「對的」事了。兒童這時再不會使懷疑影響他的快樂，他也用不着耽心懲罰或批評了。對羣衆也是如此，當一個人能把握他們並指揮他們時，這個人的意識，或把那算作他的意識而介紹給他們的意識，也就變成了他們的意識了。

弗洛特又說，在這以後，這種以一個人的意識代替大眾的意識的作用，是會不久又消失了的。每個個人的懷疑，原本會一時被出意識之外的，遂又浮現出來。羣衆也不再是羣衆，領袖如果要想阻止這種情形，就須重新提出來新的號

召。

現在再來討論第一個問題：一個領袖如何建立他與羣衆之間的圓滿關係。在什麼條件下，他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擁戴。沒有一個有經驗作政治說教工作的人會相信勒蓬的假設，以爲不論在什麼場合，對什麼羣衆，都適合於作政治說教。試想如請希特勒到英國的皇家學會去演說，將有什麼結果？再如大家正在爲慶祝新年而狂歡的時候，一個人忽然想對大家發表一篇政論，大家將對他作何感想！

英國的工黨黨員對於羣衆心理多很有經驗，比如他們要想在工人散工的時候，在工廠門外造成一個「治性的集會，他們知道這很不容易。工人都很累了想回家，或想去找些娛樂，所以只有真對政治有興趣的工人，才會停留，其餘的不是連聽也不聽，即是站住看一看講話的人便又走開。在什麼條件下這集會才能成功的形成？有人說在工廠有工潮的時候，其實也不盡然。有的工人一樣不肯停留，也許家裏有更緊要的事，也許他們對工潮已感得很心煩了。所以最容易成功的環境，乃是當工薪要減低，工廠要裁汰工人，或者當政府要實施徵兵的時候。此外

再能引重大政治興趣的，是個人的罪惡之被揭穿，例如政府的領袖有什麼叛國，誤國的行爲的時候。五四運動的時候學生火燒趙家樓，在街上講演反對曹汝霖等賣國，北平乃至全國民衆，都很感興趣，就是證例。

再如在民主國家中如美國的兩黨競選，競爭極烈的時候也會使民衆注意。如果一個候選人是過去從未聽見過的，要發表演說。就更有力量號召羣衆。因爲好奇心與爭鬥的精神引起了大家的興趣。如果競選已顯然形成了一面倒，知道某黨一定戰勝時，大家就又不感興趣，兩黨都不可能號召成有大多數人參加的集會了。因爲民衆認爲甲方勝利已經在握還麻煩什麼？對乙方，則以爲失敗已定無可挽救，忘了牠就算了。同樣的情形在工業界中也存在着。生活條件最壞的工人，竟是最難引起他們的政治興趣，和最難加以組織的人。只有生活已經改良而又遇到威脅，但尚有希望可以保持的工廠工人，才易被說動。

我們知道廣大的羣衆，對於其他人民的極大災難，雖可引起他們的興趣，但仍不如他們自己或他們的朋友的災難，更使他們注意，甚至就是戰事，如果是其

他的兩國作戰，除了認爲那戰爭結果可以影響到他個人的人，會注意外，其餘的人是不會注意的。中日的戰爭，在太平洋戰爭發動之前，英美民衆大多數都不注意，當時只有認真反侵略的英美人民才注意，再不然就是他們在中國有投資關係，或作軍火生意的人才注意。到珍珠港被襲，菲律賓失陷，香港新加坡淪入敵手，英美人民，才認識中日戰爭的重要性，但對日寇的憎惡，美人還是甚於英人，因爲美人認爲日寇是更直接的在威脅着美國。

簡單的說，普通的男女公民對於公共的問題，並不很有興趣。他們並不願爲了聽政治經濟問題的演說而打破了他們每天的生活秩序，如果他們去聽了，一定是因爲心上有所懷疑的時候。如果他們心上並無問題，像前舉的過年狂歡的時候，他們是拒絕去聽什麼演說的。他們因爲懷疑而生出來一種特殊的感情，這種情往往是因恐嚇而產生，這就是說他們在「焦急」中才能有虛心接受他人說教的態度。

以上我們所引述的足以引起政治興趣的實例，都差不多是足以引起焦急的情

勢。如不知將有什麼事發生的焦急；爲決心對一件要事負起責任來的焦急；爲了生活標準受到了無助的打擊而焦急，也許是一種觀念的⁴制度在威脅着他的焦急。

在有些情形下，焦急並不能一下就被發見，例如利用歷史上的仇恨來煽動民衆政治興趣，像過去美國芝加哥曾有一個由流氓匪徒出資支持他競選市長的人，叫作B·湯姆遜，居然一度當選，因爲他很巧妙的說，芝加哥的不幸不是什麼匪徒造成的，而是英國派來的奸細在各關中向各級官吏行賄所造成，他利用美國獨立戰爭時遺留下來的對英國的仇恨，掩飾了他們流氓的罪惡爲資本的事實，他能引起民衆的政治興趣。還有利用虛榮的損害來煽動，過去軍閥時代北方軍閥煽動士兵作戰時可以說：「他們南蠻子素來看不起咱們，叫咱們『北佬』，弟兄們爭一口氣，跟他們拚一下叫他們知道咱們的厲害！」北方士兵直覺的感到了地方性虛榮受了傷害，「北佬」是什麼意思雖不大懂，但恨意已被煽動起來。這種例子雖未直接引來焦急，但其中仍含有引起了焦急的成分，英國奸細的活躍可以引起他們感覺美國前途可慮的焦急，南蠻子的輕視，已是使他們焦急自己優越感的

喪失了。何況又是在戰爭，南蠻子打勝了那還得了？

當政治興趣在民衆中升高的時候，一多半是環境在可憂慮的不安定中，這環境給從事政治說教的人以很好的機會，他們要求於說教者的是講到他們心中所焦急的事，如能解除其焦急就更好。所以一個領袖在講演時，一定要搔到癢處，民衆在焦急着生活日高，你却向他們講我們的國民道德標準日低。今後應當注意禮義廉恥，不只當時得不到聽衆的注意，聽衆轉過去還要罵你和你所隸屬的政黨，你想作領袖領導他們，就更是作夢。

所以你對罷工的工人講演，必須講到罷工，最好能解決他們在罷工中所痛苦着的問題。例如他們在深恨着工廠經理的行爲，他們要求聽到的是：他們應當繼續爲妻兒的生存而堅決鬥爭下去，還是時機不對，不可能成功，不必徒然犧牲。應當再忍耐一下候更好的機會。如果聽衆自以對上述兩種感情之一已有自知的決定，講演人的機會就不大了，因爲聽衆所要求的已只限於對他們已決定的一切加以鼓勵，他們已不會依賴他了。一個人如想在羣衆中獲得感謝與擁戴，他要能幫

助羣衆下決心，決定問題，同時鼓勵羣衆相信他們作的決定（不管是什麼決定）完全正確，——因為這是一下子爲他們解除了兩種焦急。

人類是要聽他所愛聽的話的，所以在大選中美國民主黨明知羅斯福不一定會再當選時，他們一定仍說「羅斯福一定當選」，而不願說「請幫助羅斯福使他當選。」因為說他一定當選，就是在作宣傳戰，比說請人贊助更可博得人的贊助。人類都希望勝利，也都有一種感情喜歡別人稱讚他們強盛有力，他們能不顧正確的知識判斷，只爲表面的理由而欣喜激動，就是有一張標語證實他們的感情他們也會很高興，因爲那可以減輕了他們由失敗這觀念而生的焦急。

人類都是自信爲很有智慧的，如果一個講演人因爲不能回答一個問題而說「我知道我是在很有智慧的聽衆面前講話，所以我一定需要留心我所說的一切，」會使聽衆都愉快的笑了，因爲這小小的高帽子使他們都感覺很舒服。

不過，這却不是說沒有可能在民衆心中創造新的興趣和使他們接受適的意見。兩者都是可能的，不過那新的及尚未受歡迎的材料，一定要與已存在着的需

要有關聯，如有關聯則雖在起初那新的興趣與他們距離很遠，或尙未與他們的常生活發生關係，甚至那意見和他們所感覺應當歡迎者正相反，他們也會接受。

在現在我們已能夠以銀行制度、貨幣制度這類問題使民衆發生興趣了，在前幾年我們還作不到。這都是由從事政治宣傳的人造成的，他們第一步訴諸民衆的意識。第二步訴諸他們的錢袋，在社會繁榮安定的時候，民衆對銀行貨幣制度，認爲是銀行家的事。在有直接的、壓倒的、不應有的痛苦逼着民衆時，他們就不能不對素不注意的問題發生興趣了。

所以與人類現存需要的關聯這一點，非常重要。對於貨幣問題完全無知的農工，如果想給他們講貨幣與他們當前生活的關係，而如此開始：「我今天想給你們講講貨幣問題，貨幣就是……」是不會引起農工的興趣的。如果這樣說：「你們的團體領導人叫我來給你們講講貨幣問題（用這種話可以轉移因強他人用心力於不想知道的問題而引起的忿怨）你們一定覺得很特別，爲什麼要用這樣抽象並與你們距離極遠的一個問題來與你討論，當你們心上充滿了生活困難的問題

時，但是……這貨幣問題對農工雖然依舊是不合口味的，但因為講演者的口吻完全是深知他們心理的。他們會認為他是他們的朋友而歡迎了他的演說。英國的瑞德爵士有一次被請向一羣會計人員演說，當時正有一個眼鏡公司發生訴訟。社會上正爭論着會計師對股東的責任問題，會計師的行爲，正受着社會尖銳的批評，他演說的話是這樣的：「前一位講演者說諸位是大英帝國的警犬，我則想叫諸位爲守護文明的警犬，我們剛才聽到了許多關於會計師的責任的話，先生，現在我想說的是：警犬會咬那喂他的人的手麼？自然不會！那麼誰在喂我們的警犬？就是公司的董事們！」這演說引起了驚人的哄笑。因為瑞德爵士的父親似的儀表，和所造成的和善空氣，雖然他有的是那種不利於會計師們的思想，因為接受了他們請他演說的邀請，他們不是認爲他說的話是出於善意的。本來聽衆中都有一種焦燥的感情，有的少數人是與那訟案有着關聯，其餘的大多數則感到他們的職業正受着攻擊，但他們對他的感覺則是「他雖知道一切事情的經過而不滿意，不過他也知道我們的艱難也還在承認我們算他的朋友。」

再例如一個熱心宣傳「福音」的人，他可以用極兇惡的態度攻擊他的聽衆，責備他們犯了罪，並指出一切黑暗與罪惡。不過他一定要指出來——甚至聽衆在他未說出來之前，已知道他一定要這麼說了。——就是他們之中最惡的人，也有一條可使他得救的路。他如果不提出來這一保證，那他作傳教士的主要任務就算失敗了。所以要作一個領袖或牧師，愈把罪惡的意識說的重，引起的焦急也愈大，而他們的成功也就會愈大了。

因此一個領袖要獲得他人的擁戴，一定要利用現存的焦急，並表明出來他有解脫牠的辦法的印象；或者造成一種潛伏的焦急，而預爲準備一個救治的方策。任何有經驗的講演人都知道不能只說一些改革的辦法，還要攻擊現狀的不良，喚起聽衆注意他建議應改革的那些壞事，然後再堅定的說，我可以掃除這一切壞事使人正途。現存的焦急愈大愈廣，他被承認的機會被擁戴的可能性也愈大。焦急很容易親切的感覺到一種危險無法避免時。自然只有挺身與鬥。在這環境下，如果有人能爲指出一條出路，如歸罪他人，向他進攻即可勝利之類，自然將被當作救

主看待。

許多人因失望而生出焦急之後的反應，多是想攻擊，恨，傷害，——這是古老的生物本能的衝動，想以戰鬥毀滅了敵人。如果攻擊那使他們不幸的真正緣因，是無用或不可能的，他們就會轉移其譴責而攻擊別的東西。在第一次大戰後的德國最初本是既不能攻擊協約國的各政府，又不能攻擊經濟情形。他們也曾想攻擊這兩對象，但都受了打擊，遂為希特勒預先造成了機會，使民衆信仰了他的嫁禍猶太人，共產黨，和平主義者的主張並毀掉那些人，以代替使他們不幸的真實的環境。

所以一個「民族英雄」的產生，一定是在真實的民族危機（焦急）存在着的時候。他們之成為英雄，因為他們領導着全民走出困難環境，戰勝外敵，或者為他們準備好一條出路，並為證明恐懼和痛恨從裏面在蹂躪着民衆。假使作到了後一點，就是說能使他們在焦急中產生獲得保證與自由的感情，那麼作到前一點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這遂可解決了當前的實際問題，解脫了實際的危險。

爲了證明上述的一切不是空想，我們將在下一章中解釋人類產生這種信仰與行爲的心理機構，在以下，則將繼續着說明這種信仰和行爲的模型。在歷史上在現世界中我們都可找到證例。

當羣衆的感情在暴風雨狀態中，一個領袖一定要能使自己適合於那環境，並知道如何以適於羣衆感情的方式求有利於自我。有許多領袖都知道如何形成一種感情的狂潮，並能適合的表現牠，領導牠。如果他想做一個永久的領袖，這樣却還不夠。他更需要幸運，第一流的自我廣告，雄大的組織能力。他還應當懂得如何駕馭民衆在平靜的時期。只在危急之中能駕馭民衆，固可以造成他的權威地位，到了平靜時如不能駕馭，他自己就又會陷於危險。

民衆對領袖的崇拜，並不是爲了他的天才。而是崇拜一產生，也就產生了信仰。遂認爲他具有所有使他值得崇拜的才能。他們想他應有什麼品德才能，也就認爲他已經具有了。想着他有了那種品德才能，於是才應當被愛戴而不再受任何批評，進一步且幻想着他是無所不在。試以一些領袖的真正人格和民衆所想像的

他的人格來對比，我們可以察覺那想像是幾乎完全離開了實證的東西，希特勒自己會比興登堡更得德國人民的崇拜，這事實是連他自己也會驚訝的！

民衆對領袖的這種態度可以保持一個時期，在這時期中領袖將是「完人」，信仰他的人將信任一切他所說的話，使自己的意識完全跟隨着他活動而不自覺。把他看作比道德還尊貴。他說虐待猶太人，他們就以爲虐待猶太人是正確光榮的行爲。只要那造成他們信仰這領袖的焦急還存在或繼續膨脹着，他們就會永遠盲從着，一旦那焦急轉移了，領袖的魔力也就中止，理性遂出現了。民衆也要思考那結果了。殺戮放逐猶太人是因爲那領袖告訴他們猶太人是不幸的根源。但是猶太人已殺戮放逐了，環境並未改善，他們遂不能不找一頭贖罪的羔羊來代負所犯的罪惡了。「如果不幸的根源並非猶太人，那麼造成不幸的是誰呢？我們應該殺了他！」獨裁者的危機也就在此了，他如果不能給民衆再提供一個目標，從歷史上看來，民衆的敵意就會轉移到他身上來。美國的華盛頓總統，英國的威靈吞公爵，第一次大戰的英首相勞合喬治，都會受過其國人至高的崇拜，但到後

來，也都曾飽受人民的攻擊。法國大革命時的領袖盧賓斯拜，蘇聯的托洛斯基，或被其過去的同志處死，或被放逐都是明證。在艱難的日子裏，感恩這一觀念是很短命的。民衆一致的愛戴是一種最容易消逝的情緒，一旦那造成愛戴的感情降低或轉移了，領袖想再保持自己受愛戴遂非常困難。如果一個人本只是某一部分運動的領袖，而想站上全民的最高權威地位，連原來並不信仰他的人，也置諸自己的統治之下，這工作就更困難。即或不是這種環境，而是確能得到全民擁戴的領袖，我們在歷史上也可找得許多前例，他們並未有什麼太顯著的錯誤也被放逐了，而在晚年的生活很悲慘。人類如果在不正常的感情影響下，想了或作了什麼事，他們是非常不願意記得牠，並引爲羞愧的，因爲有這種心情，所以往往他們最後就把一切的罪惡寫在舊日的領袖身上。過去使他受崇拜的品質，態度，行爲，可能也就是他被殺被咀咒的原因。

最好的證明是法國大革命時代的狂放感情的結晶人物馬拉(Y. P. Marat)，他是一個人民代表，新聞記者，他並不謀私利，不過非常驕矜，驕矜的人照例

多疑，他覺着到處都是敵人和奸細，不是國家的敵人，就是個人的敵人，在天，大家會以爲他是患迫害狂的病人，在當時，他自一開始就要求流血。他可說在法國是第一個被稱爲獨裁者的人，他的統治是一開始就殺掉一切馬拉的敵人。

在當時的代表議會中，馬拉的煽動性的文章常被指陳爲不當，在議會中馬拉的報復是每當軍事失敗，他就說議會有計劃的想戰敗。他鼓勵士兵屠殺將領，指斥將領們是奸細，那有名的九月大屠殺，他是主要的在報紙上爲文唆使的人。他受其他同爲議會中代表的人們的責難，他所指斥的人數也更增多，恐怖也更延長，致使巴黎人人自危。有一次一個人在馬拉講話後也登講台發表意見，他說在一個永在「滴瀝着誹謗，惡毒，血污的人」後邊講話是非常可憎的，這可以表示出來當時大家對馬拉的輿論。

馬拉本是靠了當時有力的政黨「吉洛丁」而得勢，而吉洛丁黨的護庇他是因爲他對巴黎公社的影響。後來他們的關係破裂了，吉洛丁黨控告了他，却因爲沒有人願意干涉報紙自由又把他開釋，不久他爲了報復竟又設計控告了吉洛丁黨

的領袖三十一人。此後他即不出席議會，但又不甘心離開，兩週後又回來了。六星期後他被刺殺在浴缸內。

恐怖達到了頂點——指斥其他公民同志，強要他們流血，所有審訊都要迅速通過，不許作自我辯護，據說這是表示公眾的精神。馬拉變成了英雄，刺殺他的女兒手，被穿上表示謀殺長親的紅襯衫，拉上了斷頭台，馬拉的葬儀非常盛大，他住過的那一區，改名為馬拉區，他的半身像陳列在戲院以及其他的公共場所。敬重他變成了守正確政治立場的證明，愛戴馬拉為他死而哭過的，可以被寬宥其罪惡。在一七九三年十一月盧賓斯拜曾以宗教的名義，反對崇拜馬拉。他的遺體，仍在一七九五年移入了巴第翁廟。也就在那年一些青年反動分子，毀了他的胸像，希望引起騷動。再過一年，一切都成了過去，馬拉變成了憎惡的目標，從此再沒有人願意記得他了。

以個人性格說，馬拉無疑的是恐怖主義者中最壞的一個。——他並不自私，也不血口噴人。侮罵被他犧牲的人，也不以他們的痛苦當作自己的快樂。不過他

也無建設性的建議，也沒作過什麼有用的工作。他像傳染病，他是一個被自己的多疑，恐懼，忿恨弄得瘋狂了的人。他只能被在像他一樣情形下的人崇拜，他們抬高他，以爲他很崇高偉大，以爲他是一個值得崇拜的人物，於是他們遂可原諒了他的兇殘。

在事實上似乎任何成了功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領袖都不能夠永保他的聲威，革命成功之後，黨內便將分化，互相攻擊，甚且比反對黨對他們的攻擊更猛烈。如果能夠沒有這種事發生，領袖仍能保持其地位，那一定是他的訴諸民衆感情而生的情緒，不只沒有漸漸死滅，且能追隨着事態的變易，繼續保持着。

現存於世的領袖，其地位之獲得，並未利用欺騙，自我宣傳，或暴力的是印度的甘地。他未利用歐洲獨裁者所認爲必不可少的任何手段，就變成了印度印度教徒的崇拜目標，他的地位大約是不易改變的。印度民衆以半神性的崇敬情緒對待甘地，對我們似乎是一種欺騙，但那是合乎印度教義的，且是基於印度人民的情緒體系——那本是印度民族性的特徵。在印度社會中他是一個「聖者」，在印

度的社會裏一個領導公共活動的人，一定要具有這爲衆尊重的「聖德」。並且他所領導的一切運動，表面雖有變易，骨子裏却純基於一種不變的政治感情，那就是反對外族的統治，拒絕爲征服者所吞滅。

我們再以世襲的君主專制制度與這種事實來對比一下看。在過去世界各國中，往往有最可憎惡的君王，應當一點也得不到人民愛護的，但仍能在很長的時間內得到人民的愛戴服從。法國的路易十五，最殘暴的俄皇，以及現在印度的王公們，他們依據傳統的慣例，統治人民居然會一時的得到人民不合理的服從擁戴，有些君王爲了想作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可能反置自己於不利的境地，所以有些君王遂把改革責任放在他的大臣們的肩上，如果民衆不滿時，他可以殺他，譏貶他，以謝民衆。

這兩種趨勢：（一）反對革命領袖，（二）擁戴世襲君主，是基於人類的深刻而有力的心理的原因，這似乎是人類普通都有的一種潛在概念，他們可能一時爲當時的政治經濟情勢所掩蔽，所鼓舞，所阻撓，他們却仍在其影響之下續持着，在

情勢有變時，牠們會又繼續活躍起來，納粹法西斯獨裁者如果想使其政府制度穩固，他們必須領導控制這種力量。事實上納粹法西斯領袖本是立於極易受攻擊的地位。因為假如一個人使自己負起來全國一切活動的責任時，民衆還是生存在一個不要他們負什麼責任的國家內，漸漸的民衆會覺得什麼都是他一個人的責任，他們滿意的事固由他負責，不滿意的也由他負責。等到環境與民衆的心潮有了改變，認爲他們想要的日子並未到來，怨恨的焦點就要集中到他身上來，不管那責任不應由他負。起初民衆將只是怨謗，進一步是找應負責的人，領袖還可暫時除外，最後如果他獨裁的時間相當長，那焦點一定要集中在他身上了，因為獨裁者把自己置於全國一切生活之外，這一印象是很顯明的在民衆心中，所以當焦點集中向他時，他將毫無躲閃的可能。

至於立憲政府，就是君主立憲如英國，情形就不同了。英王也是不能作錯事的，不過他在政府中只處於一種形式的地位。責任是由內閣負的，所以民衆如有怨恨，也不集中於英王，而在當時執政的政黨內閣身上宣洩，下次不投該黨的

票，就是宣洩的辦法，敵意的箭靶只是一政黨的領袖而已。所以統治者功能在這種情形下分成了兩點，（一）是可愛的仁慈統治者，一切美德的榜樣，同情並保護其子民的人，自然沒有人想到去攻擊他；（二）是壓抑並懲罰人民的統治者，他強迫許多人民作他們所不喜歡作的事。他自然是有缺點的，人民常常想脫離他的統治而獲得自由。

在這種安排之下，即使環境不利，也可使政府相當的穩固。改革運動可以由許多小的革命而達到目的，革命可以由合法的形式進行，用不着流血與兇殘，並可使好的統治者不成爲一切罪惡的焦點而受攻擊。

君主立憲自然不是最好的政府形式，牠有很多的缺點，如世襲制度使階級制度永存，財富的分配永遠不勻，但比獨裁政府究易有進步。且不一定要經過流血革命才有改變的可能。民主立憲優於君主立憲，但也有牠的弱點，且在不同的國家環境內，含有不同的結果。所以現在說那一種政府制度好，須要看那政府的實際工作表現，而不能由抽象的名詞來下判斷。今日世界的政府制度只有「較好

的「一壞的」的區別，完全好到不須再有一點修正的政府制度是沒有的，而且也許永不會有。所以凡以自己的政府制度，已好到不能再有一點改變，那完全是欺騙。凡持這種態度的政府，也就註定了牠一定要為人民所推倒。一個政府如想要比較穩固，只有一切措置，力求合乎理性，公平，誠實，迅速掃除一切人民不幸，不由感情的衝動採取行動，而竭力注重事實與合理，才庶幾有望！

現在我們可以總結一下以上的討論了。人類當在憂愁的時候，不論爲了他們的行爲，期望，或有危險不知如何應付，他們多願聽宣傳者的宣傳，並預備對其建議作相當的反應，只要那建議能叫他們感覺可以應付他們所遭遇的難關。所以宣傳者一定要能叫他的聽衆由他的宣傳而放寬了心，並得到保證。他應減輕他們這方面將要失敗的恐懼；減少他們這一方的行動是不對的意念，減少他們的日常生活基礎已有問題的威脅。如果能作到這地步，他的聽衆將會普遍的對他發生信任，而認爲他或他所推荐的人作爲他們的領袖。並且他既有一次幫助過他們，他們就可能在下一次仍希望他給他們以助力。

領袖並不需要具有依照理性一個得民衆擁戴的人所應具備的品德。他所需要的是能夠訴諸民衆的感情，滿足他們的願望。甚至民衆自己也許不知道他們有那種感情與願望，但是他必須知道。如果羣衆的焦急，困惑，無助是由於他們的地位叫他們感覺非常難堪而產生，誰要是能給他們找出來一條出路，他就會得到信任。愛戴，擁護，他的主張也被認為正是民衆們要信仰的。這種反應的力量的大小，是由其原有的不幸程度的大小而不同的。如果那不幸很嚴重，他的主張是有意義的或虛妄的都沒關係，一樣能得到民衆的信任。

如果他的主張是虛妄的，甚至不是虛妄的，但在他解除了他們的焦急感情之後，他雖由此獲得他們的信任，而他的危機也由此而產生。因為他們的正常感情恢復，理性也恢復了，他遂可能會被深愛而變為被他們深深的憎惡。這就是常欺騙其人民的獨裁者爲了保持其政府所亟須注意的問題了。在前面我們會說過，納粹法西斯國家所用以阻止民衆焦急的消逝的計謀，是創造新的危機，不論是外敵也好，內奸也好，他們想以這種把戲不斷的串演來維持其政權。結果他們終在外

敵的強調下把自己驅入了戰爭，由戰爭引起內在的不安，斷送了自己。墨魔的命運已成了希魔及日本軍閥們的前車了。

第八章 焦急，犯罪意念與敵意

要使宣傳發生效力，一定要使宣傳能與接受宣傳者的心相調合。所以要了解宣傳的效力一定要了解大眾的心。討論宣傳而研究起來，犯罪與焦急的心理，讀者或不免以為離題太遠，但是事實上在違背理性的政治現象中，這種心理的力量實佔着很主要的地位。

在不同文化中，如在蘇聯，美國，這種心理效力，以不同的社會形式而有不同的表現，牠們並且是永遠在活動着，所以作宣傳工作者必須對這種心理有相當的認識。例如焦急，就會使各國的進步的政治運動不能收到應得的果實，特別是在像英國那樣的國家中，她的大部分勞動階級，就仍在投票反對自己的經濟利益。爲什麼社會革命的收場往往是造成反動的獨裁政權？這只有由人類的焦急和由牠而生的犯罪意念來解釋，才能說明。要明白這種心理在怎麼影響着一國民衆的行爲，我們先要了解組成一國民衆的每一個個人的個性與信仰受牠的影響有多

麼大！

焦急的根源可以達到人心的最深處，其深度可以與人類最早，最原始的要求——自保的衝動相比擬。常有危機來脅的時候，焦急就產生了，不論我們是否自知，不論我們是否打算把牠排除到我們心的外邊去。小的焦急還不是痛苦或破壞性的。正常的人冒些小險且引為快事。例如爬高，駕滑翔機，開汽車等即為證例。只要人覺着他能有把握控制的住，對那危機所引起的緊張，他還會覺得有刺激性。如果他覺着他控制不了，他會失敗，焦急即會非常盛旺起來。不過在這時候，人可能全不自知而急於圖謀自救。等到一切安全的過去，他才由出了許多汗，口乾，手顫而了然他已有了一度極危險的遭遇。

大多數的人都已承認了那由外在的顯明的危險而造成的焦急，一個青年的士兵，在若干月的極危險的戰鬥中，他能夠一點也不害怕。不過因為環境永是那樣緊張，他漸漸喝起酒來了。他喝酒是為要了以酒淹沒那他想心中排除掉的焦急。一個汽車司機如被逼駕駛一輛舊式汽車，車燈又不好，駕駛時間再極長，停

下車來他可能感覺非常困倦，作噩夢，神經失常，爲了長期的過度緊張，他的健康可能日壞，不過雖在這種情形下，當他駕駛時他並不感覺他在冒險。這種實例現在已能爲大家所承認了。

但有另一種情形還未能爲大家所公認，那就是我們有一種恐懼是由我們所感覺到的內在的危險而造成。這危險之產生，是由於我們相信，我們本性的可能作惡。這是現代心理學的一個極重要的發見。惡的衝動是沒有人能避免的。以前我們已說過兒童生來即有需要，並要求立即得到滿足，但是往往不可能，所以他的早期教育完全在如何約束自己。所有叫他不能滿足的一切，都會使他產生焦急。所有的失望使他產生忿恨。這種感情雖被壓抑，但仍存在。

人類遇到阻撓，不論他自己承認與否，總是要感覺忿恨的。在我們的兒時，我們的這種感情是對着我們所愛所依賴的最有權威的人而發生，使我們覺着非常悲苦。等我們一天天的長大，我們對這種感情就自己爲牠下了一個定義，認爲是犯罪的意念。

這種感情是非常令人不快的，所以一定要設法減輕這種不快。就像一個人爲了止住身體某一地方的疼痛就要揉擦那地方，或暫時停止呼吸一樣，他們將試着減輕那由焦急與犯罪相雜揉着的心理上的痛苦。成人仍將試着求得其所需而改變了整個的情勢，小孩子則作不到這一點。如果成人或小孩子終於失敗，絕望了，他們一定要有一二反應表現。

小孩子一定會嚎啕大哭，因爲母親不給朱古律糖，他甚至會打她。但他也知道大哭會使母親更不愛他。這實在是很危險，因爲母親甚至會爲此懲罰他。這情形能使那孩子陷於完全絕望的境地，以後他長大了，如遇到與此類似的情形，許多人會都覺到同樣的痛苦，而引起來犯了罪的意念。

孩子爲了不能控制其危險的衝動而覺得很害怕，他心上有了由犯罪與焦急混合而成的難題，想拋掉牠。有的孩子遂會喊：「是你叫我不乖的，你應當受罰！」當他恨他母親並打她的時候。用心理學的術語說，他對他母親「放射」了他的犯罪意念。把那受責難的責任轉推給母親。也算他攻擊了那罪惡的對象。這是處理

犯罪一念之最普通的辦法。——這一點在國民心理上是很重要的！

小孩子的把自己犯的罪放射到自己以外去說母親：「你應負責任，你不好，你阻撓我，你應當受責備！」這心理是人類中常有的行爲。兒童跌交怪地板不好，得不到朱古律糖還惹來一場不快，兒童也會怪朱古律糖引誘他，他長大了如果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當他運氣不佳時，他會說那是他的敵人的陰謀所造成。不成功的女演員多嫉妒女明星，她總以爲那女明星是在妨害着她。這種心理之以特殊形式表現的例子，我們可以舉出來前章說過的馬拉的行爲。他排斥一個個的敵人，結果只是增加自己所犯的罪惡；他殺一個敵人，便他又想找第二個；敵人於是成爲無窮盡的。他也相信敵人確是永遠存在着。同時這也是使希特勒獲得政權的若干詭計中之一種。「你們是不負什麼責任的，是那些猶太人，和平主義者，布爾什維克黨人出賣了你們，除掉他們，你們就可以獲得和平了。」

不過人類也不是只用這一種方式應付這種情勢，別的小孩子也許會有不同的反應。例如一個女孩子也感覺非常失望而哭泣，——爲了母親不好，和那誘人的

朱古律糖，她也感覺憤恨，但却出於另一形式，而用於增加自己的過惡。她不打她的母親，而責備自己，如果舉極端的例子，她可能因此而對於朱古律糖失掉了興趣，再也不愛吃朱古律糖。如果有了這種事，那就是在她的感覺中，那過惡比現實更擴大了。一個小孩子的不受約束的衝動，如果顯示出來對他很危險，有力，並在蹂躪他，雖然是一件小事，他却能以爲是大事在圍繞着他，於是他的反應，遂與他個人的感情相一致，而不與那件事的實際效力相一致。所以那女孩子的感情如果變得很強，使她無法忍受，她會覺着非常焦急，自覺是一個大罪犯，她的反應將爲：「我太下賤了，太危險了，我不能信任我自己，——我應當受懲罰。」人類心理如果入於這種狀態，他遂會歡迎有人約束他，甚至懲罰他，因爲他已自承應受懲罰了。人民的心理如入於這種狀態，這個國家遂可能容許苛虐高壓的統治者存在了。

如果情形並不太嚴重，我們所假定的那個孩子，也可能找到另一條出路來應付那種情勢。不放射她的犯罪意念到他人身上，也不感覺超乎實際的後悔，她還

可以壓抑了牠。壓抑一種感情，當然不是消滅了牠，只是把牠趕到意識之下而已。所以牠很可能影響他的性情和生活態度。他可能強化了自己所犯的罪惡，舉極端的例子，他的一生將用於努力壓抑和否定這感情。這種人可能變成非常限制了自己的人，不信任自己可以有任何自由，享受任何特殊權利，或負任何重責，因為這些事都有機會使其內在的可怕的罪惡本能復活。他將表現為異常的馴良，異常的不敢越軌，無理由的害怕，異常的拘謹。這種反應在現代社會的所謂愛體面的階級中，極為常見。這給現代社會中進步的宣傳工作者以極大的困難，在他們作宣傳工作的時候。

我們常常可以發見一種現象，在改良或革命運動中，使這種運動日趨衰弱無力。那些改良或革命領袖，雖仍謂自己和過去一樣忠於其原來的信仰，可是他們的行為却變成了急於使一切改革、革新的計劃都停頓下來。他們曾經攻擊當時的當局，想推倒他，如果他們這些人在他的潛意識中，那兒時怕反對父母的恐懼還相當強而不自知，於是他們的犯罪意念可能無理由的擴大起來，即使他們所作的

事，其結果極為有利，也能使他們自己感覺：「呵，夠了，我們不要幹的太過分了吧，現在已經夠危險了。」於是他們開始用種種頑固的方法阻礙其同志，左一個理由，右一個理由，使他們勿再努力前進，其行為與他們的主義都不符合了，也全不管。

我們當然也不是說，當所有的領袖喊「後退」，而其同志喊「前進」時，就都由於這一心理。也許領袖是正確的，由於環境要求他們應當努力於自己的團結堅固甚於前進，但也許出於極簡單的動機，他們已有了相當的成就，他們已要求和平享受了。也許他們雖有成就，但社會已使他們腐化了。也許還有許多其他的原因，而且常常是幾個原因混在一起而形成那種情形。就是人類極簡單的心理結構與生長，也是很複雜的。要想正確的了解每一個個人的心理，需要由一個專家長期而且耐心的研究，才能達到目的。至於在羣衆間的人們的心理，却比較容易，因為羣衆的每一傾向是浮露在表面的，然甚至在這時候，每一個人之趨向這一傾向的原因，也往往人人不同。

一個有名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黨人，曾承認在希特勒當政之前，該黨也曾因為焦急與犯罪的心理改變了他們的行爲。不錯，他們有許多可怕的困難與阻礙，但是他們的只在暗中摸索，馴良的，不肯用明顯的防禦手段對付納粹，實在不能完全合乎理性的理由一一加以解釋。

正常健康的兒童，生活在正常的環境中，不會使這類反應有什麼顯著的發展。他們可以壓服他們的焦急，如在遊戲或工作中展開他們的精力，使焦急在外界中消失。或作些好的有用的行動作爲補償。他們轉移其侵略性的衝動於解決問題，與真正的困難鬥爭，或者他們證明他們作好事也有如作壞事一樣的能力，以抵補他們自己作了壞事的感情。許多社會上有用的男女都這樣作，他們也多知道他們的行爲的基礎。就是這種事實，也可以爲政府和宣傳工作者所把握和利用。像在蘇聯那種廣大的建設努力，就是由此造成，所有一切補償的行爲，都曾得到政府的鼓勵。不過兒童的性情如果不是很堅強，環境也不是很好，他也不能自己掌握他的焦急與犯罪意念。假使危機在他的生活中一個跟着一個的襲來，他

將不能與之鬥爭。

人類的心和身體一樣，只能承受緊張情緒到某一限度。我們似乎可能習於不斷的危險，或受長久威脅着我們的環境的壓迫。久而久之，那危險似乎已不再在我們的心上，或我們已把牠除去了。但是不論焦急受了壓抑，或是犯罪意念一經形成，是不能把牠們完全抹掉的。牠們在心的表面之下，累積了起來，於是需要與牠們鬥爭的努力也一天要比一天大，不怕死的士兵喝酒會一天比一天多，汽車司機會一天比一天覺着疲乏，也許吃了飯不能消化，或有了閒暇也不再能消遣。他的脾氣可能變成非常不一定，那緊張情緒給他們的影響，人人都看出來了，可是他們自己却堅決否認那緊張情緒之存在。總之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忍受某一限度的焦急與犯罪意念，也許有人的心可忍受的更多，但不是每人都能。

等到忍受的最高限度（這是因人而異的）達到了，人類的心就不能再保持其正常狀態了。在這時候另一重要心理機構發生作用，那就是所請「逆轉」。他的心又回到兒時的狀態。成人生活應有的責任義務，他感覺太多了，肩負不了。他

希望再回頭去作小孩子，有人照顧他的生活，替他解決問題，希望有人保護他，不論是應付外面的敵人，或是對於他自己的危險衝動，他要求一個全能的父親保護，他再不要自己思想什麼，再不要獨立，或創始什麼，總之什麼都比當時他的現狀好。

當許多人都在此種情形之下時，宣傳工作者要欺騙他們的機會就成熟了。他們的情緒愈緊張，國家的情勢愈無望，他們的機會就愈大。如果宣傳工作者能夠減輕他們的焦急，轉移了他們受屈辱的意念，恢復秩序，告訴他們，他們不應受什麼責難，他可以替他們戰勝他們的敵人，他們自然信仰了他，自視如兒童之於嚴父，認為他是領導者，他們有服從的義務。

不過回到兒童的時代，對於正常而快樂的男女並不是一種愉快的事。在作兒童的時候，他們希望長大，有權威，有權過自己的生活，甚至作自己作的錯事。一個長大了的人，可以自己支配自己的時間，說他們喜歡說的話，選擇自己的朋友。快樂而正常的人願意負責任，自信自己有能力可以把事情幹好，願意以自己

的努力養活自己，自己作自己的主人。他們不願意父母繼續干涉，干涉即使是伴隨着愛的意思或物質的利益，他們也不願意。

兒童時代，是一個倚賴的時代，屈服於別人的專橫意志，盲目的信仰別人認為對的事，但也是一切主要要求有人負責供給的時代，沒有責任，不識有所謂憂愁，只要作一個好孩子，愛父母，保持清潔，守規矩，規矩也許很嚴，然而是一定的，也不是不可能作到的，於是生活就不會受到什麼太大的壓迫，苦惱都有人擔當。如果一個男人或女人遭遇到太難解決的問題，苦了一個相當的時期之後，這種生活就會被回想起來成為失掉了的樂園。爲了逃避成人的苦惱，他們願意再變成兒童，他們會歡迎使他們的生活近於兒時生活的一切情形。

這種情形可以由種種方法而表現。有人會得一種「幻想病」，他坐在一個沙發上沒有病，但否認他一點沒有病，在情緒上他已非倚靠一個醫生不可。醫生能給我們舉出來許多例子告訴我們有許多爲了焦急，感覺無助，或生了犯罪意念而生的病。只要心一想：「這是我所承受不了的」，於是他的身體遂與他的心合

作，而也不能正當的表現其功能了。

最普通的方式是求助於宗教，上帝是公共的父親，他會給我們一切我們所要求的，雖然我們有罪，他也會給。他愛我們直到我們死。他會以他無盡的憐憫圍繞着我們，向我們表示他的仁慈。當一切都失敗了，理性求不到結果，勇氣似乎已無用處，邪患的力量已經臨近，死亡即在目前的時候，人類就要尋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上帝，這種現象，在過去是到處都可以找到的。在現在這情形改變了。政治經濟的災難不能再委諸上帝的懲罰，即使是信仰上帝的也已不作此想。他們各依其所知而認為這是銀行家，軍閥，和平主義者，共產黨，煽惑者，猶太人資本主義制度等等之一，為災難的原因。大多數人已不再向上帝禱告，他們知道這是人類的愚蠢與錯誤的領導所造成的不幸，而想求一個合乎理性的解決。如果失敗了，或經過不斷的失敗造成極大的焦急，理性的方法又被排除，雖不再回去求助於上帝，却要求有一個領袖來代替上帝，或代替在兒時照顧過他們的父母了。

這就是造成現代文明國家的人民服從一個獨裁者的主要心理機構。焦急，無助與犯罪的意念太大了，使他們不能肩負。需要有一個人能叫他們却去仔肩，能代為解決難決的問題，能照顧他們因為他們犯了不能寬恕的罪，失了自信。——獨裁者遂成爲他們企望着的人物！

第九章 人民與統治者

現在我們已可把以前得述的種種心理運用到具體的政治現象來了。

納粹德國的政治制度是最無理性，最專制，而且把這一切交織在日常生活中。本應不爲注重理性，智慧，受過科學教育的德國人所歡迎，但竟一時得到了他們的擁護。反對希魔的一個個的都失敗了，他的政權成爲無上的權威。假使我們研究一九一四年以來的德國歷史，這情形不只是我們都有責任，而且從心理上說，德人是不可避免的要走上這條路。到一九三一年，德國已過了長期的非常緊張的生活。戰爭，和平條約，繼續的封鎖，道威氏計劃造成的蕭條，法國的佔領魯爾區，法國的拒絕履行凡爾賽條約中的裁兵條款，協約國給他們的屈辱感覺，貨價的慘跌，最後政府又不能維持公共秩序。一次次的絕大的努力，一次次的失敗，失望。他們曾經試求適合於戰後的哲學，和平，公正，民主，建立社會主義。圍繞着她的國家拒承絕認他們的這種調整辦法，更不斷的給與屈辱的感覺。他們的

經濟復興努力一粉碎於協約國，再粉碎於全世界的不景氣。他們竟至不能建立一個採取積極手段，從事社會改革，使大家獲得新信心的政府。領導人物像斯垂司曼（Stresemann）又死了。甚至在這情形下，他們也還未傾向希魔。只是當希魔僥倖握了政權時，竟沒有人能起而面對這新的「焦急」，反對他的制度。於是德國民衆恢復了兒時崇拜強有力且能維持秩序的人的心情，希魔再以鼓，旗，光榮，謊言來慰藉他們的自尊心，自然得到了歡迎。他愈要求他們作更多的犧牲，他就更像一點父親。對於那些自覺犯了罪的人，他使他們想：「我們是應當受懲罰的，我們的父親是爲了我們好，才這樣教導我們！」他愈製造出來更多的敵人，他的宣傳也就更適合他們的潛意識的要求。他向民衆要求，以犧牲求民族復興，爲了保全血統，土地，而粉碎這種或那種惡魔，或表現其英雄的不可遏阻的意志。在那情形下，正是他們所覓求的，他們如何能不承認這個父親！

說明經濟與心理作爲根源而造成的政治現象，可引用下面的事實，作爲最好的證例。那就是在歷史上我們找不出來一個國家在繁榮昌盛內外安定的時候，會

放棄了自由的制度，歡迎獨裁者來統治。同時在許多社會革命中，（這裏所說的社會革命，是指包含着改變社會結構目的的革命而言。）結果多是建立成不同形式的獨裁。個人主義的獨裁者自都是反動的，他們都是由反對革命或由領導反對革命的感情浪潮而得到政權。爲什麼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總是以獨裁政權的形成收場？自然這是由於經濟與政治的關係。在革命時期中當然會破壞了社會財富，並阻害了平時的經濟活動，於是社會中不幸日增，賦稅也更加重。經過兩派的相互殘殺，造成了很深的敵意。革命時期雖已過去，他們仍將同在一塊土地上生活，自然仍會造成他們敵對的活動。這種革命多半是只完成了一個階級的目的，而不會使全體民衆俱受其利，於是甚至革命的團體，也會爲了害怕民衆而要求一個獨裁者來壓服他們。至於民衆自己則感覺失望並且失敗了，要求有一種反對這種欺騙他們的革命的宣傳。在這情勢下，於是雙方遂都想有個獨裁者，也許他們會有些收獲。

此外還有一種現象，似乎就不只是經濟政治的原因所能說明的了。爲什麼一

個政黨可以完成一次革命而多半不能成功的恢復秩序，這似乎應當並不太難。還有爲什麼一些政黨領袖，能夠推翻一個皇帝，而往往反不能統治他自己的信徒。這就要引前章所討論過的心理機構來說明了。

當革命時期，大多數民衆要作或寬恕許多在革命之前，和他們自兒時以來，所認爲罪惡的事。在兒時學習到的正確與錯誤的準則，到我們長大了之後多依然保持着他的影響。雖然我們自己相信那些準則有的已被我們發展了，有的已被我們排除了，其實他仍然存在。在不論男女的心中一定都深藏着一個信念殺人，監禁一個人，沒收人家的財產都是不好的事，除非那人犯了罪。即使他犯了罪，懲罰時，也要依照法律與習慣。在革命期間，這些事却都爲了新的理由而執行。例如革命者爲保持他們的地位，特權，財產與意見，也不惜使用。在起初也許他們還想經過合法的審判，漸漸爲恐怖，仇恨，懷疑，一切的手續不能不漸漸鬆弛，於是殺人也許不經審訊，也不能保證一定公允了。「爲了他們的話太有理由不能駁倒，而把他們監禁起來，」這並不是罕見的事。

在美國建國革命中，殺了不少忠於英王的人，當時高德溫，史密司（Goldwin Smith）說這是「仇恨的迫害」，於是他也被認為是「親英」份子。以後又有許多人被囚禁，被鞭撻，自家中逐出並搶掠了他的家，原因是爲了他仍堅持幾年前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爲對的意見。

至於法國大革命時的行爲越軌，就用不着援引證例，近代歐洲納粹法西斯所造成的恐怖就更用不到提出。凡這些越軌的行爲，在最後，民衆一定以爲是錯誤的。所以這情形發展到頂點時，革命是成功了，可是革命時期領袖的權利却反會受了限制，甚至被監禁，被處死。

弑君殺父，在社會上不論那君父如何，總會被認爲是犯了很大的罪惡。因爲這在民衆心中，會引起來其焦急的潛意識，即我們前面說過的兒童想打母親所以造成的那種焦急，所以對這種人不只政府會重懲他，連民衆也全無理由的贊同重懲。

革命之後，後死的黨人常常自悔一切越軌行爲，認爲那是作了他們自己都不

相信自己會作出來的事，自己應當負責。如果革命之後社會繁榮，新的希望建立起來於是大家認為這種幸福是由他們的智慧所造成的，那麼革命中的一切悲劇遂可由革命的成就而補償。但革命的結果，往往是由於國內的意見不合，甚至引起對外戰爭，於是饑饉，賦稅加重，繁榮根本無望，大家就會普遍的感覺到（也許是不自覺的）這是過去越軌的結果，現在是受到懲罰了。人類是會不相信自己的，過去作了惡事，今日受到了懲罰，誰能擔保自己不再作惡事呢？由不幸使他們生出來的焦急，同時又叫他們生出來了「信任自己到什麼程度」的焦急。自然他們希望有一個父親來為他們負責維持生活的驅逐外敵了。這時父親會給他們一些嚴厲的教條也就成爲意中事。

如果不是由一個獨裁者而是由革命黨人自己推出來幾個人來共同收拾這局面是不是可能呢？在過去的社會革命中，這種實例還沒有。過去的革命政黨常常是不信任自己的人，也不信任由自己黨中推出的代表團體，他們喜歡以「手足之誼」爲號召口號，事實上他們也常是像弟兄一樣自己同自己鬥不完。結果往往是一

個獨裁者以恐怖的手段來結束那局面。多數民衆的焦急，也由此獲得了解脫。他剝奪了法律對民衆的保護，民衆之未被懲罰的，甚至會感覺那殘暴是對的。當他要求他們犧牲，他們認爲這是贖罪之道而表示歡迎。他們的感覺爲：「不錯我有點吃不消，但我要忍受，證明我是個男子漢。」獨裁者告訴他們的人民：「法西斯主義鄙視安適的生活。」「肥胖是下等動物的理想，」「我們要造成青年的新的理想，——能犧牲，肯吃苦。」他是在用過去宗教會運用得很成功的那種激起熱情的方法。

那些未受到獨裁者加給他們的直接痛苦的人，仍可能爲了他們自己想像的焦急與犯罪而不安，他們會想「領袖獨沒叫我們吃苦，我們許是還不錯。」但這仍不夠，他們情願放棄了自由，以及一切憲法賦予的權利，且自爲不是犧牲，乃是因爲自由會使焦急與犯罪籠罩了他們，所以甘願放棄，嚴厲法令也受他們的歡迎，是因爲那給了他們領袖將保護他們反對他們自己的衝動的保證。例如婦女可能犧牲了他們的化妝品，像香粉，口紅，她們明知道化妝品足以助長她們的美

麗，她們却以不用可作爲道德革新的表示而甘願放棄。一從此我不再是過去曾經是的那個壞人了！」他們爲這個而服從，而感覺成功！

這種情形我們可用在有空襲時，一些心理不健全因威嚇成病的人進了防空洞即可不藥而愈的事例來相比。那種病人所需要的，只是防空洞。具有自由權但須負責任，還要自己應付生活，這焦急犯罪的擔子似乎一天重似一天，使他們感覺肩不起，於是獨裁者的專制統制遂成了他們的防空洞。只要他們感覺需要，他且可以永久供給，他自能得到熱情的擁護。因爲他給了他們以最大的保證，自應換得極深的愛戴。

民衆大多數都會無條件的自動的愛戴任何在他們上面。統治他們的人，因爲他們不自覺的把他們當作了父母看待，認爲愛戴乃是他們的義務。許多進步的宣傳工作者想改良民衆的生活狀態，在作宣傳時，總是覺得民衆簡直瘋狂的冥頑不靈。完全依附於他們的雇主，不肯反對他們。這種男人或女人，可以說在心理上迄未長大。他們並不是一「逆轉」了，而是始終未能自父母的權威下解放出來，像

一般人由幼年長大成爲獨立的成人，所應經過的階段那樣，解放了自己。他們感覺僱主有錢有權，就應當比他們好，反對僱主是不應該的。在各民族中這種幼稚的性格成了極主要的原素，很少人類，能是真正的，長大了的「成人」。在講體面的階級中更多這類人物。雖然他們的忠順也可能錯用了，並很深入，難於改變，但因他們未遇見太不順的環境未造成上述的心理作用，遂還不至於成爲神經錯亂。英國的維多利亞皇后也曾被英國民衆普遍的當作母親愛過，不過却未達到像德國人在經過第一次大戰之後愛戴希特勒那樣瘋狂。其原因就是因爲英人沒遭遇到第一次大戰後德人的那種不幸，未造成焦急犯罪的心理。也就是這種心理才使一些國王與民衆之間的關係非常牢固。已故英王喬治第五在無線電廣播中對民衆說，希望他們把大英帝國當作一個大家庭，這會叫許多英國心上有犯罪意識的人覺到英王會愛他，所以他也應以愛戴爲答報，英王的這種說法得到了全英人民的歡迎。立憲國的君主並不是真可愛的人，但他能阻止暴烈的社會改革 確屬事實。

一個普通專制的君主都可以得到民衆無理由的愛戴，那麼一個獨裁者自更應當得到民衆狂熱的愛戴，因為他是被人民認爲造成了奇蹟的人。領他們走出了災難。他是不會有錯誤的，如果他的寬恕與同意都無效力時，民衆心上的犯罪與懷疑的痛苦也就會再復活。獨裁者的危機也就在此了。

第十章 幸福的代用品

和作父親應使一個家庭生活安適一樣，統治者的也應當能使民衆生活幸福，民衆是以此來判斷統治者的好壞的。不過納粹法西斯獨裁者却未準備給民衆以幸福，相反的且要求犧牲。墨索里尼曾說他的教條不是「生活的好」，而是「生活的危險」。「法西斯主義，藐視安適的生活。」「社會主義保證人類最低限度的享受：酒，雞，電影，女人，但在實生活中，快樂並不存在。」希特勒也是一樣：「唯物主義是就會破產了，工人們已轉向國家的理想價值了。」「我們正在創造一種新型青年，訓練他們吃苦。」

在前一章我們曾說明爲什麼這種叫人重現世享受教條的，可以有一時的成功，爲民衆所接受。但除非焦急與犯罪的感覺能夠長期保持，普通民衆是不準備長期不重視現世享受的。酒，雞，女人，他倒不一定需要，但是安適的家，可口的飯，夠他們教養兒女的工資，他們是需要的。錢與富足在他們的潛意識中很

重要。當生活增高的時候，他們心上所起的「父親的替身要求」再減少了，這時他們就要怨謗領袖了。

錢本身是被看為有價值的，經濟學者視為「財富的積蓄」而不是交換的工具，或用以建立價格的標準。婦人用出去有價值的錢，一定要換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好換回一些欺騙與失望，她自然不甘心。錢之被人希望得到，不只是爲了牠是錢，或牠可以買東西，還因爲牠是成功的表徵，獎勵的酬報。一個人辛苦的工作了一天，自然要求得到適如其所用勞力的報酬。這就是說他們要求獲得一種自由的保障，不使他們永感緊張與貧乏。

這種要求，納粹法西斯獨裁者無法使之滿足。納粹法西斯國家中，所有工業機構，都是建基於雇工的低微工資之上。如果改變了這一點，就等於向自己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挑戰，資本家們的利益，他們是不能不顧及的，雖然希墨二魔近年已不像初登台時那樣要依賴資本家，而反過來有時且令威脅資本家了。對勞工的小的改良，他們也作了一些，如德國禁止雇主侮辱雇工之類。但他們却從未干

涉資本家，叫他們爲勞工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或減少疲勞工作。一方是爲了資本家的利益，一方在二次大戰之前他們忙着軍需增產，訓練龐大軍隊，以救經濟在長期苦難中，也不可能作這類有利勞工的事。二次大戰之後，人力更不夠，經濟更困難，德國勞工之未被送上了前線的。其生活也更苦痛了。

我們知道人類要求與勞力相適應的工資，不工作的過於疲勞，他人類的智慧聰明完全無關，而是產生於根深蒂固的人類的原始要求。獨裁者即使被承認爲父親，父親有的會是很兇惡的，所以他們的嚴峻在開始尙有人信任接受，如果日常生活永那麼惡劣，在他們的統治之下，情緒永是不愉快，漸漸那原先信仰他們的一切原因就會失掉功效。民衆會這樣想「我們把自己整個的獻給了你，可是我們仍然不快樂，仍然痛苦，也許你不是真正配作父親的人！」領袖與人民之間的關係，爲日常的不幸所腐蝕，如果他不繼續以愉快的感覺他們，他自己就太危險了。

愉快的感覺是可能離開現實而獨立的，我們前面也提到過，猶如以一串假珠

子給小孩子與未見過珠寶的人，他們可能和得到一串寶石一樣的歡喜，所以一些「光榮」，特別是國家領土的增加，對於成人，能夠像得到煙和雞一樣的高興。他們覺着由此就加了權威與安全，其實結果正相反，國家財政會更困難，且為國家招來更大的危機。事實雖然如此，但在國家土地不斷增加中，宣傳工作者一定可以使民衆忘了現實的不幸而深覺虛幻光榮的可喜。希魔的幸運就是由此造成的。他當政之後正遇上張伯倫這一流抱綏靖主義的政客，於他能撕毀洛加諾條約，進兵萊茵，廢止凡爾賽條約，兼併奧地利，侵入蘇台德區佔領米美爾，又攻入波蘭，終至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關於引起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結果，以後再說，只就二次大戰以前希魔的不斷勝利來看，自然使德人感覺獲有無盡的光榮了。墨魔也是一樣，阿比西尼亞，阿爾巴尼亞的獲得，足夠光榮了。對日本，中國東北四省，華北華中南洋羣島越緬泰的侵入，更正是夢境中光榮的實現。

光榮，由光榮造成的快樂情緒，遂成了真正快樂生活的代用品。這光榮成了一個民族或國家的奇蹟，神給大衆安慰，尤其是在第一次大戰後德人在屈辱下過

了很久，自己心上的低劣感由獲得滿足，更覺着得了安慰，自然他們就接受了這代用品。

此外還有一個理由使民衆樂於犧牲的，是領袖與他們共甘苦，或者似乎在與他們共甘苦。如果最高的領袖藐視財富，不要求安適，那麼財富與安適的價值，似乎就會減低。實在財富與安適，人類之所以重視，乃是因爲牠們是成功的象徵。貴族的奢侈華麗，使人類增加了對奢侈華麗的艷羨，錢可以買到尊榮，人才想望牠。在上述的人生存的社會中，只有少數的教徒，學者，科學家，藝術家，叛徒才能輕視尊榮奢侈，甚至他們的輕視，也是靠了堅強的壓抑始獲成功。要求生活的好與模仿大人物，也是一種本能的要求。當墨索里尼也只吃一盆葱湯，一塊黑麵包的時候，當希特勒與其黨徒共同進一樣的簡單食物的時候，這種事都可以使他們的信徒更多能忍耐一點貧苦。一個人爲了一個正當的理由有所犧牲，所得的只是犧牲二字使他感覺到自己已是高貴了，如與領袖爲一種犧牲，又多了一種意義；於是更神聖，也就更能忍受。希墨二魔的個人節食表演，是要求人民自

動的忍受痛苦的最好的宣傳方法。我們知道世界上女孩子都想跟一個年青漂亮有錢的公爵結婚，窮人都希望在街上扶助一個老頭子走過一條馬路時，他忽然贈送了他一百萬元作爲酬謝。如果世界上並沒有公爵，也沒有擁有萬萬千萬財產的富翁，這種夢想也就不會產生了。所以領袖的作出來樸素的表率姿態，乃是爲了要求民衆犧牲。

此外一個獨裁的領袖所能給民衆的真實東西，像德義都會給了的，就是他和民衆是同志關係這一意識，和使每一民衆在社會中都站有一個地位。在納粹法西斯國家中能使每一男青年（除非他是反納粹法西斯主義的）都感覺他爲國家所歡迎所需要，社會上有一個地位在等待着他們。女青年也是一樣，她如果有那要求，自有一種機構安置她。在墨歷統治下的意大利一個小孩子要參加所謂「Balilla」離開「Balilla」的青年就要參加「前衛隊」（Avantgardiste）在那時交給他一桿來福槍，他已須成爲軍隊中的一份子了。這青年被動的將感到自己已是由全國國民所組成的大團體之一人，於是他也不可免的變成了一個須盡義務的人。

這個大團體所要求於他的是什麼？（一）是作砲灰，（二）他被當作不須付代價的勞工，（三）是剝奪了他的發言權，給他養成機械服從的習慣。不過獨裁者也確在社會上給了他一個地位。在那地位上，他的工作是有價值的，他的福利也爲他的上級所關心。雖然納粹法西斯政權所給青年的福利也許我們不同意，而且也不會使全國民衆都享受到這種福利。不過一些青年在不同的這類團體中，都很有朝氣，熱情，大多數，還相當的醉心這種團體。希魔之到今日還能支持他的戰爭，自與這種訓練有關。

民主國家在過去是作不到這一點的，在民主國的大工業區域市裏，不只是一個人而是每一個家庭，都沒有社會連繫。他們不只與任何社團無關，甚至除了少數的親友外，和其他的人類都沒有接觸，這些人或者有點畏縮，有點孤獨，不擅社交，或自覺卑微，是不能自動有什麼組織的。此外娛樂也使他们減少了接觸，本可以在公共場合中，由談談天氣之類談起的時候，他們去看電影了，遂使社會中的人都孤立起來。自還有也許有些什麼會，但是會費之類使他們鬧不清。

而到了他們遇到不幸時，這種組織一點也不能幫忙，都是使民主國民衆不能有組織的原因。還有例如一個失業工人，他當然付不起什麼會費，他也怕人看見他爛了的鞋，更不願意別人可憐他，憐憫他運氣壞，也不願接受人家的他所不能報答的恩惠，他自然就成了爲社會所排擠出去了的人。而自認爲在世界上他們沒有什麼用了。這毀壞了他的自信，增加他犯了罪的意識。這種人自然希望有什麼人還需要他——如果能告訴他他是亞利安種的英雄或古羅馬人的後裔，神明的子孫，並說元首，首相需要你，關心你，自然是很真實有力可以治愈他的心理的影響。

其實就是當一個人有職業的時候，強使他們參加社團組織也是很有用的。人類本是應當過羣體生活的，認識隣居，爲隣居的認識，多有交往，以期艱難的時候可得他人助力，或在自己富足時有機會幫助別人，比誰也不認識，自己只是羣衆中的無名小卒，要好多了。所以納粹法西斯國家於其民衆間建立同志關係，分享「國家意志的表現」如果不管他們的遠的動機，他們可說確是作了一種有直接效力的工作。爲民衆在社會中預備了一個地位之外，納粹法西斯還向蘇聯學了一

些減輕工人痛苦的方法。使工人有機會可以參加遊戲、體育、旅行、看電影，作技術比賽、或職業進修，把這種機會先給那些透過宣傳已對他們有堅強政治信仰的工人。使勞工對工作發生愉快感覺，並為他的工作與工廠而感到驕傲。且相信工廠中的領袖之能有今日的地位，都是因為工作努力成績優良，所以他們已是希望無窮。這些事的確減少了他們對生活困難的不安。以及對現代化工廠中工作之可怕的單調的厭惡。到勃羅的海去旅行一次，不論是在事前幻想着，或是事後回憶，都可以給人一種如實的愉快。實現這種辦法，比增加工資只有省錢，而增加工資的結果是造成個人的獨立精神，實行這類優待獎勵辦法，則可以作為是領袖愛護工人的好意，加諸工人身上，他既然這樣愛他們，自然要他們以愛戴和馴服來作為報答，也不算不對了。

獨裁制度還有一個優點，他們的計劃，可以最高的速度實現。那計劃本身是否曾經長期的深入的研討，民衆是否大多數都有機會參加研討，是另一問題，但迅速執行的態度，使人產生一種自由與歡喜的意識。假如希特勒要修一條軍用公

路，他就修了，不論是要穿過柏林或是什麼大地主的土地，都可照他所想的實現。沒有商討，也沒有什麼錢，靠強佔土地奴役人民把事辦成了，大家自會覺得這是一個大的成就。別國的人民也在感覺有修路需要的，指出來獨裁國家的這種迅速的效率說：「如果我們有了一個獨裁者，也可以很容易的作到。」在二次大戰前，在歐洲這種話時常可以聽到。說這種話的人，自然不會想到，如果民衆想修路，而獨裁者不想修時，根本路就修不成。

還有獨裁者的宣傳機關，當他作成了一件事，照例是大驚小怪的拚命宣傳。納粹法西斯國家爲勞 建築了一些住屋，於是大事宣傳，其實民主國家也許建的比他多，可是因爲少宣傳，遂顯出來他們似乎有成就。像墨索里尼，核准一些老年工人的贍養費，錢既給的不多，人數也核准的很少，可是他把五萬可領贍養的老工人由義大利的各處召集到羅馬，由政府給他們旅費，並設筵招待，舉行給予贍養費的儀式，然後一一送他們回鄉，自然成爲震動全國的大事。工人的老年贍養本是應當給的，現在變成了獎賞，不但使老年工人愉快，且在社會中造成一種

政府優待老人的空氣，並叫青年勞工心中覺得他們有了保障。在英國，老年工人的瞻養費要自己到郵局去領，那情景叫人看來自然有點淒涼。如果在英國，在市政府開個茶會請兩個市議員來講幾句感謝老年工人的話，「爲他們以一生的精力貢獻了給國家，希望他們幸福」，却會被認爲浪費，納稅人協會會出來表示不滿！

在德國的勞動營中的青年們，經常的被當作無代價的勞工，不斷的被送到離家很遠的他方去勞動，據說這是爲了叫他們認識自己的國家。他們曾被教導感覺：「這是我的雙手所作成的工作，我把瘠地變成了良田，以後若干代都可享用，我已幫着養育了比我晚出世的同胞，且使德國可不再依賴外國的供給。」他們列着隊前進，肩上荷着一把乾淨閃光的鐵鏟，自覺着很可驕傲。就說他們被教導這樣作，完全是爲了給普魯士貴族省錢，在感覺上這些青年也會比一個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童工好一點。因爲他們是被欺騙爲了自己的健康才勞動，至於童工則感覺到他是爲了錢才爲雇主的利益而工作。

一件工作作好了，人類會感覺牠很有價值。一件工作由虔敬的精神作成，會使人覺着可以抵償過去的惡行，因而能恢復他的自尊心。給人以這種工作的領袖，也遂會使人認爲值得感謝。同樣的工作，既無值得驕傲又沒有幫助其他人類的意義，只是爲了錢而作時，不只沒有了價值，且不能造成人類間的休戚相關的同志關係。

納粹法西斯領袖既不能給他們的人民以較好的生活的實際利益，又不能使他們機會向上爬升爲統治階級，更不會有國際和平的希望（德義民衆自然也是希望和平的），可是却希望他們能忍受貧乏並擁戴他，遂不能不設法找一種代替真實福利的感情來給民衆。這種感情造成方法爲（一）他能爲民衆爭得對外的勝利，（二）使他們感覺自己是一個有價值的人。因爲領袖需要他們，在領袖的各種機關中，他們可以佔一個位置。（三）稱讚他們的工作有利國家，會作大吹大擂的宣傳，以莊嚴的詞令讚美他們的高貴的犧牲與耐受，然後強調國家種族的意識。這樣作，不只可以使人民產生一種舒服的驕傲，並可不斷的使人民認爲只有這個

領袖才能在國家被外人藐視，祖國被內奸出賣，外國的意識造成國內的百孔千瘡的時候，建立起來中流砥柱，並把國家挽救過來，形成了她使全世界爲之戰慄的地位。

這種方法如能成功，那麼從軍事的眼光來看，獨裁者們已加強了他們的國家的力量，並已能保持社會秩序，而更主要的是加強了他們個人對人民的控制。更進一步他們再能控制了軍隊，使自已成爲軍隊的永久的最高領袖，每一個士兵都要對他效忠，再加上國際的有利環境，如綏靖主義的流行，各國右派政黨的得勢等，於是他們的勝利遂可一樁跟着一樁的到來，造成他們個人至高的地位。希墨二魔在二次大戰前的地位就是這樣造成的。

第三部

獨裁政府的宣傳統治所得的心理效果

第十一章 社會制度的穩固性

到此爲止，我們已對現代的納粹法西斯宣傳是什麼，怎麼進行，爲什麼可以成功，作了一番研究。我們已看出來，獨裁者如何利用人類的某種原始的，普遍的弱點。保持他們自己的地位並維持社會秩序。他們所利用的人類的弱點就是

(一) 人類在某種情形下 似乎無限度的相信他們自己所要相信的一切。(二) 人類不能忍受太多的焦急。(三) 人類都有對當權者採取兒童對長親的態度的趨勢，又當受到攻擊時，易於產生感覺自己犯了不能容忍的罪惡的趨勢。(四) 希望找到一個人能站在他們和生活的壓迫的中間 保護他們，原諒他們，愛他們，教導他們，甚至懲罰他們。愈是生活困難，他們愈覺得不能管理自己。這一切造成了一種反常的願意屈服的態度，致使獨裁者把自己造成了一個半神的領袖，控制了一國的社會，軍事，經濟大權。我們應當說，獨裁者曾獲得了相當的成功。現在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他們的成功不能維持得久這一問題。他們這種手法是不是

不斷的重複串演，仍能發生一樣的結果呢？有沒有破產的可能？發展到那一點，人民就會不再容忍，新的現象就會出現？還有由獨裁者所教養成的下一代，會不會就照他們的宣傳的一切而遵行呢？此外在獨裁者方面，天天喊備戰，多少年他都以防備敵人爲理由，靠了不合理的，不真實的宣傳欺騙民衆，叫他們貢獻一切，一旦戰爭真的發生了，他們的遭際，將如何呢？

對這種問題如果想作肯定的回答，大約只有半神半人的人才能辦得到。不過我們却可以這樣說，一切將會如何發展，是要看經濟和政治局勢而定的。例如德國人會說他們已發明了如何用木漿製造麵包。如果這種麵包一樣可以滋養身體，引起食慾，那麼無疑的他們的第三帝國力量必定增強。假如世界上又發生一次不景氣，那結果一定是採取私人自由經營企業的經濟制度的國家，要最先受到最大的打擊。因爲經濟這社會的基礎構造，會決定一切，同時還有人類的心理機構也很有關係。所以在回答上述諸問題之前，我們可以先研究一下人類能否在欺騙的非理性的納粹法西斯政權下，習於他們所造成的一切環境而認爲是正常的呢？尤

其是像德義日這些國家的人民過去都曾替於享受若干自由。會不會一旦受了納粹法西斯的統治就安於那環境呢？

我們知道最近幾十年中蘇聯美國英國的人類學者，曾對世界各地所被認為是正常人稱生活的情形，作了許多正確的描述。他們搜集不同的現存的人類「文化」的事實。這類文化自然是要尚未與歐美現代文明接觸並受其影響的，這些事實很使那些人類學者吃驚，因為所搜集到的材料證明各種文化的體系是那樣不同，那樣新奇。人類在一個地方居住了幾世紀，在其獨有的法律習慣，道德標準的繁複安排之下，和我們的觀念遂會非常不同。在我們看來是毫無意義的一些事，在他們自己看來，却是非常正確，自然。真實的法律習慣，道德標準。像印度人看到我們社會中的老處女風習，會認為這是非常殘酷的事。可是在我們看來印度人在丈夫死後火葬時把那寡婦一道燒化，才是真正的殘酷。不同的人生生活在不同的環境中，就會造成不同的觀念，不同的環境的制度愈是牢固，在這環境中的就很不易接受其他環境中的人的薰染。於是人與人間的痛苦與不安的數量也就會很

多。就是人同住在一個域中也可能因為各人有各人的環境而見解完全不同，人是一切動物都更能適應環境的，所以人類在今日依然可能由環境的教育而接受許多奇特的習慣，並認為是正常的。所以人類中的不同形式的生活，可能依然殘存很久。像今日仍存在的野蠻民族，他們是與文明民族有一樣長的歷史的人類；雖然也有些民族滅亡了，但那與他們的文化似並無關。洪水氾濫，被牠淹沒的人民的文化生活如何，牠自然不會管的。一個民族也許發展成一種極不衛生的習慣，使一些本來很健康的兒童不能不夭傷。人民的相互仇殺，本是使人口日趨減少，惡風，可是此風盛行的柯西加，阿拉比亞，阿爾巴尼亞已經若干世紀，那裏的人也未嘗消滅。人類是沒有什麼為他們不能適應的。所以一個國家的民衆為了不幸與焦急，遂可能被逼着承認一個暴君，並為了自己的願望與現代的遠大的宣傳所催眠，而迷信了那個暴君。到了他們的兒子那一代，則因為他是在那環境中長大，遂更無條件的接受了一切。

希特勒很懂得這道理，他曾說一個成功的獨裁者要經過三個階段：（一）設法

得到大眾的擁護。(二)用武力保持他，使那擁護能夠很牢固的持續一個時期，(三)在那時刻中，建立起來一個傳統，牠就會支持你了。希魔這話是對的。在人類的個人生活中，習慣很重要，這一點很少人了解。凡我們所說，所作，所想，即使不是全部為習慣所決定，也受了鮮很強烈的影響。人類的許多行動，除了最革命的天才，基於他個人的獨立見解而行的一切以外，其餘的人的行動，可說沒有一個人能夠不受習慣的影響，甚至就是天才。他的行為，也在受着他所處的社會的文明的限度所限制。

所以假使德義日青年是有系統的被教養為服從命令，不論在遊戲中，工作中，不許討論。不能表示反對。要認為凡在他上面的人都比他們好，並須相信他們所說的一切話，即使他們的話完全自相矛盾也要相信。他們自然大多數會無疑的照辦，另有些人則會覺得不能不照辦，因為所以照辦不只是為了反對有危險，且因為與人家不同好像也無用處，還會叫他產出來孤獨，不安，劣等或犯罪的感情。

要作到這一點有一個主眼，就是「穩定」。一種習慣，尤其是不許反對與批評的習慣，須經過相當的時間，才能建立成功，而且不能在建立中受到騷擾。一切事都要能照常進行，沒有擾亂或意外的干擾。沒有阻礙，沒有外來的其他觀念注入。還要創造出來焦急。小孩子一定要從最初起就依照給他限定的道路走。因此我們又有了新的問題，即納粹法西斯國家能不能「穩定」。基於其基本特質，他們能不能使他們的民衆不受過度的震懾，緊張，失望？能不能保障明日至少會像今天這樣？他們本身的特質是那樣矛盾，他們希望協合，共存，發展是否可能？如果可能，那麼他們所運用的宣傳，在掌握這一代上顯然不可能了，掌握下一代可能麼？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文化的競爭。野蠻民族之能殘存着其文化形態，是因為她未與西方文化產物接觸。一旦與西方文化接觸，他們不是被逼着依照文明人的志趣改變他們的習慣，（例如取消酋首，禱體，燒死寡婦之類。）就是他們自動的放棄了那些習慣，因為作爲那些習慣的經濟基礎已破滅了，還有由於一些

傳教士活動的新影響也有關係。就因為他們的習慣崩潰的完全而普遍，致使今日的人類學者的努力常常失望，他們往往只能迅速記錄下來遺殘餘着的一些習慣，在牠們未全消滅了之前。

一種形式的文化，吸取或模倣別的文化之趨勢，是不只限於野蠻民族的。各因具有不同的鄉土習慣，與思想方法的人民，移殖到美國那大陸燼中，其本有的一切漸漸消泯，而為那種由福特汽車、電氣收音、與電影，所構成的生活標準，所代替所同化了。在斯歐，大城市的文化漸漸侵入鄉村，而取消了他們不同的地方傳統。所以事實上各種人類社會中各種形式的殘餘保留，完全靠了他們的孤立。一定要在地理上，經濟上，意識形態上與其他國家無接觸才能做到。

納粹法西斯國家，在地理上是不能說孤立的。德義更是被擁擠在歐洲大陸中，他們自己也不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他們雖喊自給自足却從未作到。在二次大戰前他們總是囑他們缺乏原料，外匯不夠用，他們要被民主列強絞殺了。他們的貨物還要在世界市場上與其他國家競爭。他們的政府所設置的防止外

來宣傳的堤岸。也不能真的使德國完全孤立，外國的觀念完全不能撞入。希魔也不能把所有在他的第三帝國成立之前。德國印行的書籍完全燒掉。希魔可以污蔑共產主義否認他的成就，他可以藐視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但他仍不能不像侮辱誹謗蘇聯那樣努力。鄙視非難英美，而同時也就是承認了他們的存在。德國的中上層階級雖在極其嚴酷的制度之下，一定也還常有資料可資比較。問題可能是他們的心也一樣可受外國的影響，但用鈍而已。不論納粹法西斯國家願意或不願意，他們仍在與世界其他國家在接觸與角逐中。這接觸是他們不能避免的。

因此第二個問題而對着我們的，是納粹法西斯制度能否在現代國際生活的緊壓之中，仍有足夠的彈性、活力、可以殘存？儘管德國是一個軍人的國家，人民的一生都編在軍役中，甚至他和他的妻子也是在國家的軍隊中結合着，不論他學了一枝來福槍或是一架車床，並被教導在有空閒時要跑要跳，而他的妻子則在養着一個孩子或每天作十六小時的農業勞作，——同時，一切的事都是自上而下，不能有什麼選擇，民衆的生活，只有服從命令。像這樣的社會，能夠跟其他

組織不這麼嚴整，可以自由討論反對一切，個人不只有權利反對與他一樣的人民，甚至可以與反對他至政府的社會相比？如果相比，他能夠勝利麼？

在一本討論宣傳問題書中自不能一一討論這些問題，不過這種問題的提出却可以幫助我們答復一些別的問題。不論我們所想研究的是正在尋求救治其「焦急」的方法且勇氣全失了的近一代人，還是他們的心從未自由發展過的下一代人，這種人只要他們的信心尚在，他們就會附依他們的統治者，甚至不惜受苦。而決定他們的信心能否保持的，不只基於外在的原因，如經濟的痛苦之類，還基於那造成其信心的性質和他的個性，比如我們以純科學的精神，離開一切現在軍事的發展情形來研究納粹法西斯的軍隊，可能不可能在二次大戰中獲勝，我們決不能只基於他們的國家是強烈的軍國民主義，其軍隊效率相當高，就斷定民主國家軍隊不易戰勝他們。因為要判斷這一問題，還有賴於其他的因素，我們一定要看民主國家的軍隊是那一種素質的軍隊，兩方將領的才能如何，還有戰爭性質也有關係，像這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戰爭性質上，納粹法西斯政權如何善作欺騙宣傳，

他們的反民主，已嚴重阻礙保衛民主精神了。上次大戰是德國失敗，而非組織不如德國嚴密且愛和平的協約國失敗亦為明證。德國自誇他們的軍國民教育制度，可以毀滅一切他們所不需要的男女國民的衝動與熱望，我們也應當討論一下，這是不是事實，或者在表面上民衆沒有反應，而其力量在暗中聚積起來，却可能在平時或戰時把那制度給粉碎了。

第十一章 納粹法西斯政權的門面

預言那一種政權能否持久是很危險的判斷，很穩定的政府也可能為經濟或政治的意外事變而傾覆，一種制度已延續了一千年只因到了應當改變時他沒能作適應的改變，也可能很快的場合。反之一個組織，看來很不穩當，也可能為了環境有利而能維持很久。所以我們所能作的只是研究其組織結構，尋求其趨向，指出他或者會有的結果。至於納粹法西斯所常用的「不可避免的」，「不能勝過的」詞句，是在事實上不適用的。

在二次大戰之前，各民主國家中的大部分人，都以為納粹法西斯主義已可能維持下去了。甚至有人指出來以納粹法西斯制度與民主國家的政治制度相較，民主制度却似乎有點動搖，混亂，薄弱。這是他們受了納粹法西斯政權的「門面」的欺騙。

在德義，在二次大戰前，他們的「門面」確曾使許多人看起來顯然留了很深的

印象。表面上那兩個國家內部似乎已能基本的團結一致。在目標上，在主義上團結了起來，大家爲服從公共的信仰，準備不惜犧牲一切。而那麼公共的信仰則由領袖的意志爲代表。他們說就是這種團結給了他們力量，德義的作家新聞記者如此告訴我們。外國人去德義旅行，歸來說，兩國人民都很好，且很快樂，並樂於貢獻一切給政府，火車到達與開行都比過去一切的時候準確多了。甚至反納粹法西斯的作家也有人支持這種意見，並寫了書，證明德義人民是一種特殊的人類，適於那種政治制度。用法西斯的術語說：他們是「命中永久注定了」的納粹法西斯黨徒！

獨裁者們以軍隊，欣悅的羣衆，梳着壯足的金黃色髮辮的女青年，荷着鐵鏟或上了鎗刺的來福槍的男青年，用他們來加強別人對他們的權力的印象。他們說他們已發明了一種新的形式的社會秩序，像運用魔術一樣，牠已能適合一切的民衆，至於民主主義，人道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據墨魔說，連資本主義以及某種天主教主義都已是無望的過了時的東西。

但由心理學者來看，在表面上，這些情形可能是真的，但是在人類心上積累起來的潛勢力，却將趨向於粉碎了他們那種制度。不過在我們討論這問題之前我們要問向自己：德義的顯然的意見一致是不是真的存在，還只是一種巧妙的宣傳。

德義的真正情況是怎樣的呢？希墨二魔都是由兩國資本家的金錢協助而掌權。當政之後，立即趁着適當的機會，粉碎了不只反對他們個人及其政黨的其他政黨，且打擊了反對雇主的勞工們。這兩點都證明資本家的金錢收到了極美滿的結果。不過作爲他人的工具而出掌權，希墨兩魔對這地位都覺不夠滿足，因爲這種地位，時間一定長不了，等到社會秩序恢復，工人的組織粉碎之後，資本家們就不再用的着這種新領袖了。據說，德國人喜歡敬禮並撞他們的鞋後跟作響。不過很少有資本家能夠喜歡站在一羣人中，向一羣穿着納粹制服經過的人，行敬禮。在他們得到了他們顯然需要的東西之後，他們就要限制納粹法西斯領袖的權限，使他們成爲名義上的領袖，而阻止他們強佔重大事業上的利益。

雇主們要求的利益是很簡單的，不過却有時很難實現。他們需要社會秩序安定。這樣他們就易於作將來的計劃；在自己的工廠中或工作上，有完全的自由，廉價而豐富的原料；廉價而馴良的勞工；他們的製成品可以售得高價；獨佔國內市場；開始國際市場。希望他們能控制政府的外交政策。達成他們的願望。能使他們達到這種種目的，就是他們理想中的好政府了。一個政府要討好他們至少要能使上述的他們的願望，有一部分成功。不幸他們這種願望並不符合獨裁者的意志，這種願望可以使雇主們獲得更多的利潤。獨裁者卻不喜歡雇主們的資本向高了積累。更主要的是他們由流血屠殺而享政權，不願意有人褫奪他們的權利。所以獨裁者的作法是給雇主們以對付工人的自由權，使雇主們肯安靜聽命，然後用兩種方法，使他們自己脫離對資本家的依賴。即：（一）用直接的宣傳在羣衆中造成個人的崇高地位。（二）竭力抓緊全國的軍隊，藉以保護自己和他的御用黨。這作法除了達到上述目的之外，還可以作到剝奪掉一切民衆的權利。在德國因爲人民的被包圍在混亂，被藐視，愁苦，無自信中，希魔是成功了。義大利雖

未像德國那樣的受親親與亂，但痛苦與無益是更很嚴重的，再加上若干世紀羅馬天主教主義的無條件服從，不容批評的，給御上層的訓練，於是暴魔也成功了。在這兩個國家中，普遍的對政府的怨怒與無自信是怎麼造成的呢？乃是納粹法西斯黨徒被允許公開橫行所造成。希墨爾曼與希特勒其成功的宣傳，於是得到了他們的最好的機會。他們的黨操軍事實權，則盡了實行普遍的徵兵制度。因為僱兵制度，軍隊很容易為直接的軍事領袖所支配。在軍隊中他們混入自己的黨徒，利用所有機會使自已與軍隊接近，竭力使每一個士兵和他們的最高領袖之間的堅強聯繫。這樣使他們成為未來的最高軍事領袖。過去使他們得享政權的資本家們，想趕掉他們已不可能。相反的在一些重要問題上，且使資本家們屈服於他們的腳下。在德義的資本家們曾被迫付出大筆的社會福利事業費用，這是資本家們所不願意出的，還有資本家們的事業也在各方面受到了種種的干涉。原料實施了統制分配，交換的限制也已樹立，物質與生產也受到了管制。納粹法西斯黨更進一步且干涉到工廠的行政，雇主任雇用他們的黨員，爲了政治的理由可以強迫

雇工階級工人。在二次大戰前德義的資本家們一致的意思是：「我們倒不介意希特勒，（或墨索里尼）但是這一羣小希特勒，（或小墨索里尼）半生不熟（或完全渾蛋）的混小子們來干涉廠務，叫人吃不消！」這情形之繼續發展的可能還很大。一面是使人逐求利潤，然後又以種種新的法令來限制。在民主國家中有這種事。資本家可以發怨言。在納粹法西斯政權下，怨謗可以招來危險，所以他們簡直不敢。

總而言之經濟已與納粹法西斯宣傳所造成的人民對他們的信賴動機發生了衝突，資本主義與獨裁結合的動搖已表現出來了。不管資本家多麼怕左翼政治勢力的增長，多麼熱心於躲在獨裁者的羽翼之下，現在他們已發覺自己業經陷於依賴那不可依賴的一切地位，他們於是只有怨恨。他們已不能趕掉這政權，只好試擬進行修改那些不利他們的權益的一切，再進一步，他們自己又分裂而自相爭鬥。等到勞工們發覺資本家雇工間的團結遠不如那些躍躍欲試的軍隊間的團結時，若仍以爲大人物與小人物之間，主要用品與消費品製造廠之間，批發商零售商與原

料供應者之間，會在納粹法西斯的催眠的主義之下，能夠和平相處並滿足於各人
之所得，那簡直是可笑了！

例如在「領袖至上主義」制度之下，大人物比小人物有了說不盡的利益。第一，大人物的觀點與高級官吏往往一致，他們面對着的問題雖不相同，但在一個水平上。即使相反而行，在同一平面上總可碰到。他們可以過一樣的社會生活，他們可以有相類似的知識。（除非他們顯然不配佔其所佔的地位。）至於小人物（或不重要的工業），則站在另一水平上，在這環境中，無機會可向輿論申訴，與同在一樣地位上的人，也沒有機會可以把自己組織起來，也許社會上有幫助小人物的話，甚至他得到了上面以這話作爲一種政策在考慮的消息，可是他沒有機會能與大人物接觸，這是由上而下的社會中，每天都發生着的問題。既然一切都不能由下而上，上面要想接觸下面，也會遭遇到類似的情形。假使這社會中貪污依然存在，那麼大人物自更有使他們自己見重於高級官吏的機會了。

每個資本家都可能具有軍人的心理，感覺納粹法西斯的方法很可取。但是獨裁

者一向民衆或軍隊討好時的他們的利益就受到了威脅。這就是他們的難題了。他們利用納粹法西斯進行他們離間勾當，他們也許以為這樣比有其他的改變還好一些，但在這意念中，他們也有許多悲哀的感傷攪雜着。資本家們有一個一致之點，就是反對共產主義，他們知道英國美國還存在着，他們也知道那裏一樣有對事業的管制，他們也知道他們所需要的是什麼。為了他們的利潤，甚至不惜造成戰爭。等到他們覺着他們的國家就不需要一個獨裁領袖時，那喜歡干涉他們的領袖，不管是怎麼的一個領袖，也要把他犧牲掉。所以一個獨裁者一方支持民衆對付資本家，另一方又要保持民衆的崇拜以支持自己的地位時，就等於雙腳踏在兩隻船上一樣，——這雖不是一定不能作的事，並且事實上希墨爾巒已經作了，但是隨時會有危險發生乃不可免。

在納粹法西斯國家的光滑門面上另一大裂痕，就是獨裁政府與教會之間利益的對立。對領袖的盲目崇拜，狂熱的國家主義，還有依照納粹法西斯的觀念，個人只爲國家而生存，全是根本瀆神的態度。不是教會所能接受的。這還沒有說完

他們之間的矛盾。教會與領袖是出賣同樣商品的「冤家同行」。宗教和領袖相同，一邊是爲人類的後悔，焦急，生活痛苦而預備的避難所。宗教所供給人類的似乎更有權威，更有廣大的經驗，確有影響，於個人的精神的福利。除非一個獨裁領袖也能這樣訓練與對待他的人民，人民似乎已用不着他這第二間避難所，教會遂會完全勝利。教會已看見過不知道多少盛極一時的領袖們的浮沉了，所以他們感覺時間可以解決一切。但在納粹法西斯統治下，是預備屏除一切批評的研究精神，而以隨時使民衆爲了某一政策而犧牲。兩者對比之下，民衆自也會更傾向於宗教信仰。在納粹法西斯社會中，篤信的信徒是最小的構成份子。當他們暫時信仰一個領袖時，是認爲這領袖也是佔在上帝這一方面的。他們的困難，可能是間歇的，等到那社會政治的極端困難一經鬆動，他們就會很快的恢復了他們原來的信仰，放棄了對領袖的感情。

也可以這樣說特別是天主教會，他本身這組織就是法西斯型的。在過去牠也會像納粹法西斯那樣兇暴，所以牠是一個具以他們自己的意識形態與權益的堅固

社團。所以輔與納粹法西斯政權，因為對於控制民衆心理上是一樣的對敵勢力，所以牠們之間很難調協。納粹法西斯的領袖們像希墨二魔，只要相互尊重對方的領土，可能作很長時間的好朋友。而教會則要求他們兩國的人民的信從。如果納粹法西斯們不要理論只有行動即已滿足，情形還不至太困難，但他們要求的也是生活與思想的每一部分的整個的情緒的降服，這就是宗教領袖所不能讓步的了。還有，教會的要求對真理道德的盲目服從，對赦罪的堅信，這還只是一方面。此外天主教乃至德國的耶穌教，還要求正確與錯誤的絕對標準，雖不一定爲了實行，可是他們要這樣教導。那教條如：「人應當愛隣如己，上帝乃是和平的上帝，在上帝眼中每一個人的靈魂是等價的。」這在過去，對世界曾有過不可估計的利益，雖然有許多教會中人並不能實行。尤其是對於正確與公平的判斷，並不基於領袖的命令或由於想來有利，而基於永久的真理，對納粹法西斯國家是可怕的危險與敵對的宣傳，這種教條雖可能一時無效，但輔却是一種可用來判斷每一個人，——連領袖也在內的標準。如果一個領袖很不聰明的與教會對立，引起教會的

反抗，還會引起來另一可怖的現象，那就是他們的反抗會成爲其他反抗的榜樣。

就是在現實政治問題上，納粹法西斯政權與天主教之間也還有些糾纏。在干涉西班牙內戰時，墨魔曾得過天主教的助力，但在希魔當權之後，在德國在奧國，天主教都和納粹有過很深的對立。而在美洲，德國有許多利益都靠了天主教社團而得到。當墨魔的政治空想，驅使他祖護日本對中國的侵佔時，引起了中美、加拿大，對義大利的惡感，天主教就不能不另行考慮如何運用他在美國人民的情緒與意識上所握有的龐大影響。這曾使墨魔擬復活他未當權前，所提出過的反對「共產主義與搖擺不定的天主教主義」的口號，以爲報復。這種複雜糾纏，到今天也可說仍在攪不清。

此外納粹法西斯兩國家中還有一種衝突的意見，即黷武主義者主張組織全國從事戰爭，資本家却要求和平，因爲和平對他們有利。德國過去曾有戈林與沙赫特代表這兩種勢力相互鬥爭，最後是黷武的戈林戰敗了代表資本家利益的沙赫特。但在德國資本家的勢力並非已全消滅。在義大利日本也是一樣，資本家總不

會是贊成戰爭的，在戰爭初起時也許他們贊同，爲了殖民地的增加。但到戰爭拖長，一方要他們出錢供應，一方他們的市場破壞縮小，他們沒有不後悔之理，所以倒掉墨魔的不是義大利民衆而是王室與巴多洛里奧。與其說他們想俯順民意，無寧說他們是迎合美國資本家的要求。這種危機到戰爭接近德日本土時，同樣的情形也會發生。

德義的獨裁政制下所造成的各種階層間的利益的鬥爭，是比民主國家要更嚴重的，在民主國中，不同集團的民衆都被承認具有民權。凡有干犯了民衆權利的事，在輿論的爭辯中，往往可以另得一解決或阻止其進行。社會的不同分野間的攻擊也可緩和。所有可獲鉅大利潤的掠奪行爲，一定會爲大衆所反對，即使事不關己，也有人肯仗義直言。如果有人感覺到受了攻擊，他可以起而爲正當的防禦，自然攻擊就會減少。在民主國家中，自衛是可以作的到的，遇有攻擊，民衆可以以把所受痛苦揭告社會，甚至組成社團與鬥爭，政府不論對那一爭執如何不感興趣，也會被逼着要採取行動。在領袖至上的主義的國家中，大家只有服從；誰也

沒有權利。政府掌握着一切大權，只有幾個親信可以任意橫行，掠奪他人的利益，沒有什麼可以制止，一切都由高官顯貴的意旨決定。大家都希望攬得重要的權益，因為這是一個官吏能否保持其地位的保證，一切事都在暗中進行，沒有一件事可以有一個澈底的解決，日領袖而下，大家可以隨時改變意見，甲官吏的決定，乙來即可推翻，一切都靠了一個人的神經決定，被決定的只好說靠他的運氣。

墨魔曾是一個很善於運用「分而治之」這原理的人，他把義大利分成了若干相互反對懷疑的部分，再由他來控制。靠了「手段與宣傳」作為最主要中心的獨裁政府，自然只有這一條路可走。像把一切爭執公開，建立一個政治意識的標準，可以使大家援用。在他們的國家中，根本缺乏。

審判制度與法律都已失其本意，法律全以當權者的利益與意志為根據，對於壓迫與貪污，人民完全沒有保障。德國的律師訴苦說，他們已沒有事可作了，因為人民一半知道訴諸法律根本無用，另一半則根本連訴諸法律都沒想過，這話並不誇張。再沒有一件事比法律制度非常活動。強有力但又說不盡數不清，叫民

衆感覺厭煩和傷腦筋的了。人民可以忍受一種依確定的原則而製定的嚴酷法律，也可以忍受一種由習慣而形成的法官受賄的傳統貪污制度，因為如此原被告也可以預先知道自己的立場，及其希望如何，但是一種野蠻力量，既不公允，又不依從社會的常識，却太可怕了。當沒有一個人能知道政府明天又會下一個什麼命令，或不知道什麼足以影響法庭的決定時，人民沒有其他方法應付，只好敬而遠之。這結果是造成嚴重的困難，因為人民肯信任的願意去訴其不平的法庭，可以防止不公平不名譽的罪惡，十倍於牠所懲處了的罪惡。

最能使一個獨裁國家崩潰的偉大力量，還是貪污。沒有一個人對他下面的人負責，同時又每一件事都要靠了他的上級的監視。一個懶惰無能的負一部分責任的官吏，往往爲了種種原因爲其僚屬欺瞞，使他與民衆完全脫節，永陷於無法補救其過失的地位。納粹法西斯黨沒有不貪污的。德國本是一個在文官制度方面有優良傳統的國家，可是也和義大利官吏一樣的貪污。一個鑽石胸針或手鐲，已很足以使重要的「物價統制政策」完全失效了。世界上沒有比這種貪污再浪費、破

壞所有的效能與團結的了，這樣可以把人分成若干小團體，每一個小團體都先爲自己的利益着想。歷史教訓我們，只有民主才能衝破這種環境。所有大的社會革命，沒有一次不以掃蕩公開發受賄，官僚主義，尸位素餐，賣官鬻位，圖謀私利的交織現象爲對象，也沒有政權不被毀於這種現象的糾纏不清。一般的說來，在獨裁政體之下。正是擾民的稅吏，尅扣軍餉的軍官們上下其手的最好的環境。

自然不是所有的民主國都能成功的掃蕩了貪污現象，有的甚至並未努力於此，但在原則上，民主國要使一切機關很純潔，却極可能，因爲一個人或一個階級，不只對他們的上級，就是對他們的下級，都能注意到他們的舉措，只要他們願意注意。只是自上而下的密切防範，決作不到這一點。

從事實上來看，獨裁政制之能夠存在，並非因爲牠是敏銳，效率高的機構，或牠比民主政府在決定與行動上都更迅速，精確。只是因爲民主政府的穩定的制度是基於傳統而形成，以致一切改變都特別困難而已。民主國家的主要原則不是每一個人都樂於爲社會犧牲自我，而是承認環境所給與的特權，能夠認識一切

惡事，爲了能夠認識，也就可以阻其再擴大。其中還含有錯綜的交換條件，使不同的階級得以互爲牽制，而謀對於一切的改革。由上而下的不斷干涉事實上對於大多數人是不適宜的，至於在理論上有權干涉一切的領袖，在實行上也證明了阻礙很多。在歷史上我們知道闊人可以利用賄賂使自己沒有服從什麼的必要，窮人則大大的發展了互相幫助逃避政令的能力，逃避由於習慣變成了貧苦民衆的特殊條件，使熱心改革的統治者與之鬥爭時，會覺得這是天下最難與之鬥爭的一件事。

在納粹法西斯國家中，據說這種現象都不存在了，因爲他們現已具有非爲個人而存在，乃是爲國家而存在的狂熱信心。這種說法在他們的黨的集會中用以使大家鼓掌，或把他當作對答復一切「這句話的實踐，作爲對虐政的掩飾都還有用，但這決不是事實。每一個社會都是由利害衝突的人們所組成。除非這種利害關係能獲得某種平衡，而能使大家接受，無人再擬挑戰，衝突殆所難免。每一個資本的工業國都是建築在衝突上面的。不論用多少話，如何鼓動民衆的情緒，這

事實是不可能改變的。在聽完了所有的演講，歡呼了，不知多少次，最後即使最熱情的納粹法西斯黨徒，回去仍要與他的敵人競爭，才能掙得到他的麵包。在理論上說，「迅速」可以息爭，一切都由上級的命令迅速決定，講來似乎有效而動聽。但是迅速的決定不見得是好的決定，就是節袖的決定，也仍不見得會是好的決定。他許沒有足夠的時候研究這主題，或未把問題的兩面都研究過，他或者竟不知道這問題有兩面，或者他的目的只在炫耀一下。而那錯誤的決定，並不能醫治任何爭端，也不能解決問題，所以納粹法西斯的門面即使仍能使他們國內的民衆爲其所欺，然而他們所有的困難，也完完全全存在。

第十三章 老一輩的人民

有一件事在納粹法西斯國家中據說可以算是完全勝利了。那就是勞資糾紛在他們的司法制度高壓下，已不再發生。這是一樁很好的宣傳資料，而對於某些人類，納粹法西斯制度在他門心上也起了極大的吸引作用，「多麼好呵，工人都伏伏貼貼的工作！」

納粹法西斯政權之得維持，自不是全靠了他有了這種控制力量。只要民衆對領袖的狂熱還存在，社會中不同的分野間的爭鬥即可暫時變爲次要的事。還有當一個國家實行了普遍徵兵制之後，工人已不是最有力量的羣衆了。得到徵兵全體擁戴的人，其他的團體就難於起而與之抗衡。不論他掛不掛法西斯這塊招牌，總而言之他個人已成了最有權威的人，只要他能保持得住這一關係。其餘的制度也可與之共存。所以如何保持這一關係才是獨裁者認真注意的問題。

一部分民衆爲了納粹法西斯制度在當時適合了他們的心理遂可能與這種政權

相安一時。因為他們的在不安的環境中養成了獨特的氣質，遂贊成獨裁者的大權獨攬的父親姿態，無盡無休的教訓，困苦縛束的生活，消滅異己，引發暴亂，造成懷疑敵視空氣之類的行爲。這些人可說是真正的納粹法西斯黨徒，在這些人之外，納粹法西斯政權還要與三種不同的民衆鬥爭。(一)是從未承認這種政權的民衆，他們痛恨這種政權，只要有可以獲勝可能的反對運動，他們都會參加，甚至有的連能否成功都不管，仍堅決的圖謀進行顛覆的工作。這種人——獨裁者只好以武力來壓制威脅，並阻止他們感情與其他民衆的感情交接。如果社會一般人的態度改變時他們就是最危險的人物了，與他們的鬥爭是極長期的鬥爭。

(二)是老一輩，前一代，在非納粹法西斯教育下教養成的，爲了環境的不安，已歡迎了這種「新政權」的人。對於他們，要防止。當他們的希望不能滿足時，又轉向反對的方面去。(三)是下一代，一定要訓練他們，使不產生不利獨裁者的希望，並須使其認定只有這新環境是順應自然而且唯一可能的生活環境。這一切能夠作成，那麼他們的政權就有了更多的保障了。

較年長的工人的依附納粹法西斯政權是爲了一時的感情的沖激。感情可能自己改變的，環境一變，那些不正常的獨裁崇拜者，大多數全會轉變爲反對獨裁。這時他們完全看到了壞的一方面。反動因而產生。我們由人類的心理來推測，如此確斷，決非武斷。當人民在不幸的國家內，屈服於獨裁者之下，放棄了自己的批評準則改採獨裁者的標準時，但那引他們向原來的信仰與道德標準的衝動，並不能完全排除淨盡。只是壓抑了，壓抑之後並未消滅，且仍在心上時時蠢動，想回到他的意識中來。一旦那壓抑的力量鬆洩，他們就復活了。到這時候，他們要求自由，民主，人民的結合與自衛權等，又發生了作用，他們不會再樂於以領袖的意識作爲自己的意識，不會再從領袖看一切事物的角度，來看一切的事物。

所以當焦急一鬆弛時，民衆願作自我犧牲的志願一定削弱，他獻身社會的感情會轉而爲支持自己。過去他的自保的衝動使他趨向於獨裁者的避難所的，現在也又使他恢復了常態，他希望得到幸福閒暇，地位的升遷的願望，一一出現。這時候他的心理是：「領袖今後不應再叫我作錯了事！；他應當知道，我沒有作

過錯事，「同時也將爲了領袖的干涉而感煩擾：「我什麼都很好，爲什麼仍不放鬆我！」

不過這種原有的衝動的重現，却不一定是照原樣的重現。在納粹法西斯國家中尤其不能照原樣重現，因爲誰也不能表示不滿，這表示如叫人看出來，將不得了。還有一般民衆都要隨俗與他人一致。在焦急狀態中，尤其需要他人的同情支持，而怕孤獨的自肩憂愁。所以他一定要努力隱瞞那已重現了的一切，可能隱瞞很長的時期，甚至隱瞞一生的也都有。有種種的方法可以施用於這種心理狀態，有許多方法都能使他形成「偽裝」的行爲，例如隱藏起來不滿而在表面上裝作更忠實，馴良，快樂滿足，可是他並不能因此而逃避開反動心情的支配。不順利，忿恨的心理依然健在，壓抑一種感情需要很大的努力，其影響自將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察覺，其損失大致將在這幾方面表現 最常見的是由孩氣的依賴方式表現：「我自己什麼也作不了，最好什麼都能替我預備好。」他成了一個毫無感情的人。但即或成了這種類型，如果環境適於引發他的壓抑感情時，也能產生出來令人想

不到的敵意。這就像久被壓迫的馴良階級，也會突然暴發反抗一樣。

另一種方式是容許其忿恨形成意識，而不使其如實表現，不直接去反對那有權力的可怕的政府，也在政府所指引給他的敵人方面去表現，從宗教史上，我們可證明這種態度可以永久持續下去。爲了反抗災難的威脅，人類會長久的信仰一個創造宇宙萬物的完全良善，公平，仁愛，並有權能的上帝。但當想把一個政治領袖作上帝，並把大眾的敵意歪曲，引向其他的敵人時，就不能像在宗教信仰上那樣有效了。因爲如此，勢須永有一個敵人存在，尤其是因爲這敵人並不是他真正忿恨的目標，又因此可以造成他自己的「犯了罪惡」的心理，於是又轉而造成了新的敵意，這情形顯然的不能維持的太久，像德國的「奸細」猶太人已被處決，義大利的野蠻的阿比西尼亞已被征服，人民心上仍有不滿時，遂不能再要求製造其他的犧牲品。

以這種方式表現的人，他可以把他的敵意向一切圍繞着他的人身上求發洩。他的上司，眷屬，同僚，於是他變求了一個討厭的，招恨的工作者，而他如是納

粹黨員，也就成爲創造令人不滿納粹空氣的人。「我們倒不介意希特勒，——但是這一羣小希特勒……」這種意見的表示，已使獨裁者的宣傳統制失掉了效能。還有一種人他們的心理完全可由政府擺弄，他們自認爲是犯了罪的，爲了贖罪，拚命工作。這種人是一種普通型的人民，在我們周圍隨處可以找得到，他們常常被雇主利用，但即使從當局的人眼光來看，他們也有短處，就是在同伴中招怨太多。

另外一種形式則爲發展成一種悔恨。（尤其是不自知的悔恨）驅使他繼續着自我懲罰。他們會爲憂鬱而成病，或屢因意外而受傷害。由此我們也可發見忿恨感情，隱藏在表層之下起着作用。因爲生病可使人和殘廢一樣子他人以不利，而意外則常常會損毀貴重的機器，或爲他的環境之內的人找很多麻煩，所以發生意外，往往就是不自知的罷工工人的破壞工廠機器的行爲。在士兵中這種心理會這樣發展，他深信他不會打勝仗，甚至甘願受傷或被打死。而注意考察其行爲，往往發見他會得到像他自己所想像的結果。

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的方法，當人類在和自己心中潛伏着的焦急敵意與犯罪意念鬥爭，而又不願直接與其主人衝突時會採用，不過上述各類，則可說是最常見的事。總之不論出於什麼形式，其最後的結果會是同一的情形，那就是一些因失望失敗而感覺忿恨的人，都會產生一種攻擊的意念，但又感覺對自己的統治者產生攻擊敵意，不只在心理上不安，在極權主義國家中如果表現出來，也是一種很危險的態度。於是在意識中把牠否定了，可是牠仍在潛意識中存在，且會影響他們的行爲。

有人或會提出反對，以爲納粹法西斯的黨徒，根本無權表示失望。其領袖並未允許給他們幸福，自由，物質享受。他們自己且曾表示了自願犧牲，爲了國家犧牲自我，他們所得到的也正是這一切。他們被逼放棄了他們的權利，交換到的是光榮，民族的團結，戰爭或外交的勝利，小的社會福利改革，事實上且可以說他們已得到比他們基於理性而希望於其統治者的爲多了，他們憑什麼表示失望？對這問題的第一點答復是，現在我們討論的人類行爲，並不是根據事實的，

自覺的，理性的，有訓練的思想的行爲。他們的焦急，犯罪感覺由理性的觀點來批判，完全是超越事實的，他們非產生於實際的狀況中，而來自過去積累的遺產。所以他們的要求，都是即刻的，孩氣的，絕對的，完全未曾細心思想過。所以他們的怨言常是：「我們現在還是不安逸，你本來許過我們以和平的啊！」

此外，納粹法西斯獨裁者所允許過而不能給的是道德的改造。他們允許過能使民衆卸却犯罪意念，洗淨邪惡，恢復完整，樹立新的民族覺悟，新的時代，新的啓示。這些希望，納粹法西斯黨都還未能令其實現。從心理學的觀點來看，這却是很重要的諾言。強大有力的焦急，是和他們自己的罪惡意識緊緊的連繫着的，如果仍有任何一部分存在，其餘的也就不能解除。在所聽到的都是國家的被藐視，國家的錯誤，國家的痛苦時。那能帶給他們新的信心，新的生活的新秩序，正是信徒們在不自知中渴望着的事。

納粹法西斯獨裁者也曾盡力求能實現其諾言。例如希魔向民衆解釋上次大戰的戰敗，不是他們的過失，而是被猶太人，和平主義者，共產黨所出賣的結果。

黑魔則說他們受了欺騙，上次大戰後沒得到所應得的一切。隨上次大戰而來的國民道德的墮落，經濟的困難，社會的混亂，也誘過於同一根源，他們的人民沒有過惡，所有的罪惡，都是他們的敵人的罪惡。

這方法可以收效一時，外患和內憂是一樣的。如果人民一相信一切罪惡都由於外面的敵人所造成，他們跟着就要相信只要把這敵人趕走，一切就會好了。不過這感情不可能持久，不論敵人趕走了或是沒有趕走，那情勢都將有改變；不論獨裁者失敗了，還是那鬥爭仍須繼續下去，爲了依此而產生的痛苦，或是爲了打擊敵人很成功，遂不免發生流血與殘酷的事，却又能爲他們造成犯了罪的意念。於是第一個敵人消失了，又得連忙製造一個新敵人。德意志第三帝國是由猶太人共產黨等之下，解放出來了，他們會毀壞了德人的智慧，毒了德人的心，但是他們不是死了，入了獄，也是已不會再爲害了。至於口紅，跳舞已經禁止，許多妓院已經關門，一切罪惡已由吃苦努力工作補償了，可是正義的王國仍未降臨，心理的「放射機構」形成了一個欠缺的圈子，他一開始發生作用，危機遂會永遠

存在，最後獨裁者可能變成了罪惡之源。大騙子，背信的人，破壞者，本是半神半人的領袖。最後成了魔鬼。因為這種反動意念的任性，無可抵抗，不合理的情形會和其原來的幼稚的崇拜領袖感情產生時的情形完全一樣。

這一問題——在心理學家看來是一個主要的問題——自己也不只限於納粹法西斯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很快向她的大殖民地屈服，使成爲自治領，曾避免了大英帝國的解體。當時在各殖民地所提要求中，所包含敵意尙不十分明顯，但經英政府很迅速而漂亮的允許了自治，敵意遂未表面化，如果當時，英政府改採另一態度，就非表面化不可。

我們不要再舉社會或羣衆爲例來說明這類心理機構，因爲這基本上是個人生活的現象，尤其是在現代工業社會中，有許多人皆有敵意懷在心上必須找出一出路宣洩了牠。在民主制度之下，無害的出路，在社會機構中極易找到。胸中的忿恨，可以用公開講演發表，可以集會結社攻擊任何惡行，甚至政府。可以發動罷工，反抗，抗議，甚至形成一個有價值的社會活動。於是他們可以攻擊那正是造成他

們的忿恨的惡事，他們攻擊的對象不是歪曲了的，於是在達到目的後，遂能得到真正的滿足。如果不能達到目的，那麼敵人仍在那裏，他們可以繼續攻擊。所以民主國家不像獨裁者，用不着「宣傳部」的幫忙。公開的怨謗，爭執，衝突，在納粹法西斯國家中認為是弱與不團結的表現，在民主國家看來，正相反，因為使確實存在的爭執公開，乃是使爭執不至危及國家主要機構的保證，隨時調整可解除痛苦，比任痛苦存在好的多，這是可使大眾的意識接受的，所以不至造成民衆的犯纒意念，那使有，也很少，且不至於不斷的發生新的犯罪意念。社會的經過許多小的革命可使社會反臻安定，猶如人類長期服一點砒霜劑反有益身體一樣，如果分期吃的砒霜，一次服下去，人就會毒死，阻止小革命，一定會釀成流血破壞的大革命。希魔是不同意這種話的，他在「我的奮鬥」中說：「如果我們自問什麼力量形成並支持政府，我們察覺，就是人們集中一個名義之下，盡其能力，並志願的犧牲個人，爲了社會。」這話引起來極廣泛的問題，像有多少「個人」，或那些個「個人」應當犧牲，又是什麼組織成一個社會。假使我們把他常常喜

歡說的格言，「人民與政府都應集中由領袖來代表」這句話，我們就可以了解他的主旨是什麼了，他們主旨只是要犧牲一切人，爲了他自己而已。

我們再轉回頭來談人類的自然的攻擊衝動這個問題，蘇聯也是能爲民衆潛伏的故意找到一個目標，而不致引起來新的犯罪意念的國家。過去蘇聯的龐大建設計劃，不只爲攻擊的意念找到了一個出路，且可使民衆的努力獲得成功，並給民衆帶來了信心。與山岩、堅冰、濕地鬥爭，建築城市，使荒野化爲良田，需要極大的攻擊力量，同時也掃蕩，減少了犯罪意念。蘇聯的科學的進步，也有助於這一問題。教育的普及，也與有力。「我也許曾犯過罪，但那都是在過去的時候——我那時是一個貧苦無知受壓迫的可憐虫，——現在我已能讀書，能思想，並在爲我的國家工作。我現在的認識也有了進步，我已經是一個不同的人了。」蘇聯民衆自己，並不一定知道自己有過這種心理，在他們的意識中這給億萬人帶來新的生活的革命，是用不着再爲牠作什麼辯護的。不過這種並不自知，並不影響潛在的犯罪，念存在這一事實，而我們由那龐大的力量之用於工業化蘇聯的事

實，來比其他統治者在革命後的所遭遇的情形，可知爲民衆找到這一建設國家的出路是多麼需要，而這一出路又對蘇聯的安定有多大的貢獻。英國現代名心理學者，約翰·瑞克曼博士(Dr. John Rickman)曾說馬克斯主義本身即可幫助一個人處理他的犯罪意念與焦急，因爲他着重於經濟基礎與社會的階級構造，已減輕了個人的責任感。大家都覺得我們的某一衝動並不是造成一切的原因，那是不可避免的歷史力量的發展的一個階段。我們適生在這一代，所以我們遂必須負起來這些責任。」

基於這一心理機構，也可以幫助解釋過去蘇聯人民之所以樂於接受當局的指定政策，及願等待未來的廣大政治自由的心理。其實並不是爲了他們感覺他們亟需這種自由，而是爲了要證明其革命特別成功，才以這種自由作爲牠的基礎。

就爲了蘇聯的主義是訴諸理性的，又得了新教育之成功的幫助，加上征服自然所得的物質報酬，由於這些結果，使人也用不着再有回到兒童時代的心理。工人們覺着他們已爲全社會增加了幸福，知識，健康，——他們已補償了自己的過

惡——所以他們遂能把握自己的焦急了。

人類的心理是大不同了。而他們用以應付其犯罪意念與焦急的方法，也是變化多端。某一活動可以解脫某一個人的心理負擔的，同時即可能增加了另一人的心理負擔。甲用鋤鋤地，會覺着他是把自己的攻擊衝動移用於有用的方面，而生解脫的心情，同一工作對於乙，却在潛意識中可能影響完全不同，例如反增加了他的犯罪意念。在現在依我們所有的關於心理學的知識，還不能在事前確斷某一方法對某人適用，不過心理學專家，有時候可能猜的差不多。現在可能作到的只是幫助每一個人找出來某些事適於他的個性。當一個社會經過了長期而嚴重的緊張時期之後，會產生許多不適合的事。許多人也往往太不能把握機會，使其有利自己。這不是一種簡單的問題也不可能簡單的解決。總之是有利的工作種類愈多，選擇工作的自由愈大，成功的可能性也就多了，這原則非常正確。

在任何社會中，如果爲了尋常的罪狀必須殺反對黨，或必須用特別嚴酷的手段對付反對黨，或混亂了正常的公正秩序，爲了取得信仰，我們可以確斷，這社

會中一定會產生極深刻的焦急，不是產生在民衆的心中，便是產生在領袖心中。這種焦急不是爲了實際的危機而產生，就是爲了內心的壓迫而產生，再不然就是爲了兩者兼備而產生。

在任何時候，我們如要衡量一個社會心理上的堅固性，我們可以由一種暴力所引起的攻擊反應來判斷。

極權主義國家與民主國家不同的，就是很少給人民準備出路。在德國，窮人幾乎沒有機會選擇工作，婦女的機會更少。心懷不滿的民衆，除了政府指定的敵人之外，什麼人也不能攻擊。打了敗仗，受了大的壓迫，他也只能把敵意深藏在心內，把自己包圍在私人的爭吵，家庭生活的痛苦中，或與現實奮脫節而另製造出來神祕的敵人，「特務」，危險。納粹法西斯政府比蘇聯政府的地位不知要困難多少倍。因爲一個政府一選定以光榮，國際侵略，狂妄的國家主義的路線，遂不能不使一切都服從於建立起來軍事力量。大規模的備戰不只使改造社會成爲不可能，同時且創造出來更多的焦急。總而言之，領袖如不能脫除民衆對於他的神經

性的依賴，他就不能解脫他們的焦急。他不敢叫他的民衆恢復自主力與自信力，因爲一旦恢復，他們即將不願再繼續依照他的意思否定自己了。獨裁者於是進退兩難。危險的焦急，常常在找機會把敵意的巨浪用於反對他，這需要應付，需要天天爲那種敵意準備新目標，以期目標不變成了他自己。他一定要作些造福社會的事使大家覺得他愛人民，才可能減輕這些不幸，如果他一作這類事，前面已說過，又和他的本旨衝突了。於是恐怖、清黨之類的手段遂不可避免。他一定要盡力與忿恨的積累鬥爭，最主要的辦法就是使每人都感覺到 只要一想到不滿意領袖，就會發生危險，因爲人自己的感情能叫自己覺着獨裁者的特務永遠在監視着。不過安全的門雖然關緊了，可是民衆內心的壓迫也增加了。

這種想以簡單的心理上的機構來解釋重要歷史的傾向的企圖，讀者也許以爲太新奇而且太單純了。實際上，人類的心理是很複雜的。要想了解爲什麼一個男人或女人，崇拜一個獨裁者，後來又忽然離棄了那獨裁者不再崇拜的真實理由，我們一定要整個的研究過那男人或女人的生活及環境，要從他們的兒童時代起找出

來他或她的獨特的個性的發展過程。例如一個人可能在這兩個政治形態下產生崇拜，不是爲了不可控制的焦急，而是爲了金錢，他是一個感情受利益支配的人；或者他是特別喜歡摹倣別人的，崇拜只是跟羣衆學來的。甚至他崇拜的主因是爲了解救其焦急，而其崇拜之產生，在他的生活史上也是獨特的，反應也與他的隣居都不會一樣。當我們研究一國國民的行爲，可能與他們每個個人的利益衝突時，要解釋那些國民當這事實發生時的心理機構，除了照以上我們所討論的一切來解釋之外，還有什麼解釋呢？在每一個人的事例上當然還雜有許多其他的原因，但我們所指出的總是一根經線，每一個個人的樣式都是基於這經線而織成的。對於一個沒有體驗過焦急的重大負擔的人，也不會自知有犯罪意念。但應注意以上所敘述的並不是一些假定，也不是爲了解釋革命等現象而發明的理論，這些心理行爲的典型，是由於政治黨全無關的原因，研究男人女人的心理而發見的，其存在與其性質及發展的情形，乃是由於要了解每個個人心理對環境之反應的努力而建立。經過千萬個個人的例子證明了有這種種心理的活動在人類中，這才把牠引

用到社會政治生活上來。

現在再轉回來談納粹法西斯國家的統治者，他們也很清楚面對着他們的這些問題。他們並不以為表面上很順利就沒有反對的意見存在，據說萊茵區域的納粹工廠細胞，每月須作報告，答復納粹黨提出的問題，所提出的問題，至少有七個都是有關工人中有多少是附和納粹政權的，還有以前的政治上的反對派，現在如何之類。只有光榮與犧牲是不夠的，工人一定要在工作中有快樂，他們的心也不能只放在政治上，他家裏的問題也很重要。

在德國「一個」工作，已變成了「他的」工作。據說這工作是適於他的工作，是上級分派給他們的黨徒的工作。他們這種轉移一個對工作的觀念能夠成功，其收獲自可能相當的結實，不過不是一切的工作都能叫人滿意。把個人的工作叫作偉大的建國工作之一部分，把工廠叫作「工業前線」，這在一個時期內可能引起來狂熱。但是一個人要是靠了每天的工作才能賺到一口飯吃，使他閉上眼睛永遠不看那工作的工資極低這現實，是太困難了。他很高興知道他的勞力具有社會

價值。但是不論他的雇主是工廠廠長還是農場的地主，他們的觀點，仍放在希望勞工儘可能多爲他們生產利潤這一角度上時，勞工自然不會不察覺這事實，那就很難不叫他也更重視工資的問題了。他的憂愁用送給他廉價的電影券，使他享受免費旅行，爲他建築好的盥洗設備，請他們去聽音樂演奏會講演會，和他好好如何烹調都已不能解除時，於是只有一條路就是告訴他：「你並沒有什麼不滿足，人不能只把心放在權利上而應當放在義務上，生活的目的，也不是爲了幸福而是爲了犧牲。」這種話也可能收效一時，只要在這工人心上，原來的犯罪意念依然在沸騰着，有些人是可能在這意念上忍受痛苦的。

不過甘願犧牲的人總是少數。人類多半不願意自己的生活只是不斷的犧牲。希望幸福也是人類最強的衝動之一，決不能長期屏棄這希望。所以納粹法西斯政府，遂不能不在他們不幸福的時候硬說他們幸福，且希望民衆能夠相信。

希魔以爲這一手段不只可行而且可以成功。但我們依據科學實驗的報告，却是刺激所能產生的效能，可能一時有效，時間一長，即完全沒有了效率，例如叫

一些學生作一樁乏味的工作，像作把數目加起來的算法吧，每五分鐘檢查一次工作的結果，我們可發覺隨着疲勞的增加，工作因而滯緩，例如教員在旁邊說：「盡力作吧，這是最後的工作了！」可能引起極良好的反應，每一個人的工作效率可能大增，假使教員又說：「對不起，還有一點要作完，請仍像將才那樣快把軸作完吧！」那反應是效率減低，不過還不會減的太低，如果第三次再增加工作給他們，效率就要大減，再不斷的增加工作，那工作的效率將會低到正常的水平以下。即使過了一個月再找這些學生來作同樣的試驗，前次曾引發極高效率的話，這次引起的效率也減低了。

科學實驗，是不伴隨着情緒成分的，在科學實驗中的欺騙雖使大家很疲倦，但不致引起忿恨，不像獨裁者的在重要事實上欺騙民衆，或利用民衆的焦急使其崇拜領袖而不能解除其焦急時，會引起極大的忿恨。因為伴隨着情緒，起初引起來極大的狂熱，後來也就產生了深切的忿恨。所以運用不合理性的宣傳是有限度的，過度應用，希望引起的情緒不但不會產生，相反的且將引起來焦急，冷淡

與困惑。

這種方法既然不靈驗，獨裁者只好以力統治以力威嚇。於是老一代的民衆發洩其忿恨的出路，遂只有悶在心裡的恨怒，變成沒有感情，失掉工作效率，或有意識的或無意識怠工。

以機智詭計來控制民衆，只能收效一時，不永久。總有一天戲法已經不靈，謊言無人肯信，他們雖然仍不敢反對領袖，但却寧願去聽跳舞的音樂演奏，而不願領袖的「鬼扯」了。漸漸的怨謗一天比一天公開，獨裁者控制民衆情緒的基礎已經粉碎了。

因此希魔所採取的程序，是對老一代的民衆，以武力控制他們直至最後，他把希望寄託給下一代代替了這一代的將來。——青年並不知道有更好的存在，他們沒有希望所以不會失望對過去社會的危機，他們不會把犯罪的感覺。從小他們被教養成應作苦工，得最低報酬，絕對服從，從事戰爭是光榮的義務，總之，新一代就是砲灰。納粹法西斯領袖把他們教養成這樣，他們以為這就是他們

將來的希望，下一代替了老一代時 他們的統治就不像今日這麼困難了●

第十四章 下一代的人民

用教育，宣傳，懲罰，範鑄出來一種獨裁者所希望着的新一代是不是可能，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方，在同一人類中，既可能產生非常不同的文化，那麼在現代國家中依照着統治者的意志製造出一種典型的青年公民，是不是也可能呢？

無疑的上述的教育宣傳懲罰等與於人的個性具有極有力的影響。在這種種壓迫下，當然會產生顯着的結果。沒有一個人能否認英國的貧苦階級之能獲得健康，自尊，工作能力，不是由於狄更司在小說中描寫了他們的情形。引起了對於他們的教育與環境之改進而造成。至於蘇聯給民衆以出路與便利，已使蘇聯的農工階級在行爲外表上都有了極大的改變，更是不爭的事實。

教育，改善衛生環境，擴展一切的機會既可能使人向變好一方面有極大的成就，那麼阻斷一切機會，限制教育，關閉一切自我表現的出路，自也可以得到同樣的重大結果，在德義青年的行爲，談吐，思想上，我們可以發生許多特點。他

們身上都會留有那種要求他們標準化的制度的印記。留下的是什麼樣子的制度的印記，那是另一問題。不過給兒童以完全的軍事訓練，是否能產生出來一種標準化了的健壯、馴良，在工廠農廠上可以愉快的作苦工，上了戰場也具有無比的狂熱的民族，却大可懷疑。

首先，那標準化除了表面上的成就之外，很難有真正的成功。因為人基於遺傳的個性，可以說生來就不一致，先天的特性對於範疇一個人的性格的影響起作用起的很早。我們現在對這一點知道的還很少，而政府的統治恐怕能改變的並不多。所以在極權主義國家中的每一個孩子，還是個個不同。標準化了的教育施於不同性格的人身上，可能造成一種表面上的一致的行為，尤其是如果不一致就會很不愉快而危險，自不敢不在表面上一致。但真正的結果，却不會一致。每一個人可能被逼着適合於他們的要求，但不能每一個人都適合到像所要求的那麼好。制度非常嚴刻，大多數的人都只好犧牲了健康，幸福，性格的完整以求適合。德國過去的嚴刻學校，曾造成自殺的現象，引起社會的攻擊。希魔當政之後

兒童入限制嚴厲的學校後，又要入勞動營，服兵役，再被派到根據國家經濟制度中指定的崗位……他們受的一切待遇，都以鐵的紀律，服從爲基本觀念。沒有任何方法可成爲例外。元首說過：「整個的教育，應以佔用兒童的全部時間，爲有利於其身體的培植而設計。」（見「我的奮鬥」）納粹的官吏可以隨時走進工人的家，看看他們是否還記得他們自己是希特勒的士兵。

在現代許多文明國家中，窮人仍在受着種種干涉與壓迫，不過如爲民主國家，他們還有機會向上爬，至少他們自己相信可以向上爬。

在「領袖至上」的制度下，就沒有一條路給想上爬的人和有特異稟賦的人。（除了是納粹黨員中的極少數）農民就永遠要留在土地上，工人在他的工廠中。而作工廠的領袖團體領袖的，也永遠在一切方面比他們的下級優越，似乎一種階級制度已製定了。下一代的領袖們，在他們的兒童時代已經選定了，不是基於才能，智識，而是由其身體的健壯與對黨的熱誠。其餘的人就完全沒有了希望。他們在小的時候還可能爲了宣傳和對於他們是亞利安種藍眼珠美麗的頭髮的讚

美，叫他們愛領袖愛國家而一切服從。青年是喜歡隸屬於團體的，也有崇拜領袖的自然趨向。但到長大之後就要不同了。

現代的教育家沒有人相信高壓教育的結果，可以教育成簡單知足，有合作精神的一代，並能夠信仰堅定，勇於戰鬥，樂於犧牲，崇拜領袖。而且正相反，高壓的結果是造成畸形發展。人類的希望開始與滿足，就是在他們很清楚知道已沒有了實現的可能時，這希望依然存在。兒童們還有一種不斷的抗拒作壞事的衝動，像諂媚，搖尾乞憐，怯懦，矜誇，欺詐，違信，背義之類，結果遂可能爲了自恨而走上自殺之途。當他們被逼着過一種標準化生活時，也許與他們的性格不適合，入於歧途的危險也就增加。於是在他們之中，一定可以找到各種心理不健全的人，行爲越軌，性格失常，以及其由心理而造成的身體上的疾病。這本都是好的父母與學校應設法防止與醫師心理學者所應設法醫治的病態。甚至現代的一般雇主，上級官吏，也決不會要這樣的工人和下級職員。

還有在這種教育下教養成的民衆，因爲受了不斷的感情宣傳的激動，在戰爭

的緊張中，他們的忍受能力反會非常惡劣。因為無窮盡的焦急、失敗、連續着訴諸一個人的原始感情時，結果使他再不能忍受再多的焦急。納粹的民衆教育與英國某女孤兒院的教育有點類似。她們學的很少，只是學寫寫信之類，生活都是紀律化的、擦門上的旋手、洗地板，他們所學的都是爲了過一種貧窮，服從，服勞役的工作，正如希魔所希望於德國工人妻子的一樣，結果這些孩子聲譽都很壞，因爲她們出奇的愚蠢，害羞，脾氣壞，叫他們作女傭，都受其他女傭的反對，所以沒有一個能夠找到好的工作。他們都會長期受過宗教的訓練並受過嚴格的教導，何以如此，曾很使這女孤兒院的當局們困惑不解。

現代教育學家對在學校中應予學生以多大的自由雖然意見紛歧，但對要求「完全一致」的教育方法，却無不認爲是對人類性格最不適宜的方法。B·羅素近年在費邊社某次演說中會說，自一七〇〇年以來，每次的大戰，都是比較民主的方面打勝仗，這話很可注意。

從心理學的基礎來看戰爭，想是讀者所希望知道的。先從一般人民來說，民

主國家的人民比獨裁國家人民能享受比較自由快樂的生活，所以民主國家的人民的個人人格，也就比較堅強。現代的戰爭，一天比一天更變成了需要能夠忍受長期的與意外的緊張的事。所以一種有強烈同志感情，能使自己的生活配合現實的友愛，理性型的人物遂變成了最適合的人物。有智慧，幽默，好脾氣，有獨立精神的人才，是現代的優良士兵，好生氣，疏忽，矜誇的人，在中世紀很有用。如今已一天比一天沒有價值，因為個人的冒險精神已一天比一天不重要了。希魔說，軍隊應當由有原始戰鬥精神的人組成，（見「我的奮鬥」）這話已太過時。原始的戰鬥員在作白刃刺刀戰時，用牙咬死敵人時或者是優越的，但在一艘潛水艇中，或在一次空襲轟炸中，怕沒有多大的用處。現在所需要的是在最懼畏的環境中仍能保持愉快，能為他的坦克白砲而感覺驕傲，似乎廝殺對他只有很遠的一點關係的人。我們不能忘掉第一次大戰之前的德國的優良士兵是來自歐洲一個最社會主義的國家。同時更應注意，在第一次大戰中得「害怕砲聲神經病」的士兵，以羅馬天主教的軍隊為最多。在德國方面如此在協約國方面也是如此。

對人類，你給他們的多，你由他們那裏得到的也就會多，在工業中已證明這原則不錯。美國的汽車大王亨利福特，據他的經驗，也認為這原則頗正確。他在許多國家中都有分廠。在第一次大戰前，各廠所付工資都高於各國一般工廠，但工資愈高他由勞工的勞力上所獲的利潤也愈高。所以各國分廠的生產消費與工資的付出，都成反比例。奴隸勞動，現已證明是效率很低的了。受壓迫絕了希望的人，也一樣不可能是好的勞工；也不會是工作時的好的夥伴。

從長期受壓迫的社會中更可證明這事實，曾在美國黑人中和印度賤民中工作過的觀察者的報告說：雖然黑人與印人從體格，性格，文化各方面說都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民族。但在被壓迫下所表現出來的特性，却幾乎完全一樣。他們都對壓迫他們的人，具有深恨與敵意，他們知道他們的進步與野心是被他們用高壓的力量在阻礙着，他們已失了自主權。因而造成那種感情。（見 J. C. Heinrich 牧師著「被壓迫人民的心理」一書）這種情緒公開表現出來既有危險。於是遂被取消，連恨憎也不承認。特別是在黑人中他們作出來喜歡，和易近人，崇拜的門

面，但仍然繼續扯謊妨害你。任何命令都馴順的接受，但一樣也不切實照辦。在南美黑人中工作的白種勞工與印第安教徒，都感覺工作環境困難，這就是因為被壓迫者聯合起來拒絕合作，互相幫助反對白種人。

另外一種特徵則是表現出來令人絕望的沒有工作能力。「我們什麼也不能作！」「我們爲什麼要清潔，忠實，能幹 我們只是賤民呀！」

最後，被壓迫的人都是非常自私，自信，到什麼都抗拒的程度 在他們見到的一切之外，什麼事也引不起他們的興趣，最有力的宣傳 用於他們也是浪費。

這種受壓迫的人民的特性 甚至在他的下一代或再下一代受了基督教的教育之後，只要他們仍然是在白種人統治下工作，就依然還保存着。一切自上而下，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改變他們，只有給這種被統治的人以真實的責任權柄，他們才能產生對工作的志願與熱情。

在納粹法西斯國家中工人是在長的工作時間低的工資 全無自由的制度下工作，他們當然是被壓迫的，所以最初獨裁者即喚起他們以種族國家而自傲的心

理，以期他們有工作熱情，雖然德國工人不能都是藍眼珠金黃髮，而以亞利安種驕人，然而男女工人還都可以我們是德國人而自驕。但是宣傳是宣傳，說他們是能征服世界的民族，他們日常生活却太不像個征服世界民族的樣子，反更多像一點工資奴隸時，自然在潛意識中他們就要尋求其敵意的對象了。

獨裁者於是又想到以福利制度如造些工人宿舍改進工廠設備之類，來轉移工人對政治的注意，使他們由自尊心而產生工作效率與熱情，這也可以收效於一時，不過在納粹法西斯國家中那效果也不能太長。

德義雖也似乎有許多地方效法蘇聯，但其目的完全不同。蘇聯也注重工人福利制度，但其目的，不只在使民衆如此服從政府政策。蘇聯還教育民衆，發展他們的政治意識，誘導他們參加集會，選舉代表，討論一切未來計劃。在改進自己福利上採取極活躍的步驟，由他們的努力而增加的收穫，其利益確實及於民衆的自身。福利制度，不過是改善工人生活運動之一部分而已。全蘇聯每一個地方，每一個人，都被督促着受訓練，改進自己的品質技能，增加收入，使對一切

與己有關的社會問題，發生興趣，這一種制度，自然很容易有成功的機會。

在美國和其他的民主國中，政府私人所辦的半教育半撫慰的社會服務工作也不少，可是阻礙就很大了。作社會服務工作的人到處都碰到妨害他們的工作成功的緣因。像壞的雇主，失業的浪潮，反動的地方當局，貧苦無望的家庭狀況等等，結果是叫他們感覺到「爲什麼窮人會那麼窮」，不是失望，就是領他轉向政治思考方面。所在政治有紛擾可能的國家中，社會服務工作是爲反對現存社會制度的政黨增加大批新黨員的道路。當這些作福利工作的人與人民的利益一致了時，當他們以人民相同的眼光看一切問題時，他們自不難得到人民的信仰與合作，如果他們不是如此而純以慈善的施主姿態出現時，是不一定能有什麼成功的。在貧民中曾工作甚久具有經驗的人，認爲貧民有貪、狡、懶，及忘恩負義的毛病，並不是無稽之談。貧民如果疑心到你的幫助他有什麼將來需要利用他的動機，他們遂往往忘恩且不合作。還有你的幫助是含有藐視的意味，也會有一樣的結果。他們的諂媚可說就是忘恩負義的表現，因爲諂媚已可算是報價了。所以社會服務工

作，在英國，印度這些地方要希望成功，一定要先使貧民建立起來自尊心，自動性，負責任。

在極權主義國家中情形就更壞了。沒有方法可以改變人民的基本的經濟苦痛，沒有方法可以發展人民自動性，獨立性。一切自上而下當然不許有獨立性。社會服務工作者爲了人民的貧窮與工作過度的結果而感覺驚恐，但他們必須壓抑自己的感情，不然就將被「清除」，否則採取一種自愚的方法，對他要幫助的人發展一種極深的敵意，如認爲他們得到幫助而不知感恩之類。J. C. Heinrich 牧師曾說，一個人一定須與受壓迫的人接近而又無法解除他們的壓迫時，其正常的心理反應爲產生一種「深而難測的厭惡心」。這心理是由兩方面形成的：（一）是由他工作所遇遭的一切而生的敵意的改裝出現。（二）他本被授了權，但却無法有效行使。這種心理在人種中，（例如，傳教士在惡劣環境中傳教而造成這種心理）很容易引起來神經病。在過去到中國傳教的教士，得嚴重神經病的有百分之三十六·七，另一統計是在一千二百教士中百分之二十四得了神經病。

美國的心理學家認為傳教工作很容易影響神經不健全的人，其實就是最忠實，心理健全，熱情的宣傳工作者，如果他一定要從他宣傳的對象那裏得到他想要的反響，也可能得了神經病。

在納粹法西斯國家中的作福利工作者，他們面對着的問題也不簡易。爲了不使福利運動有成爲反叛的中心的危險，政府一定要另派一個愚蠢的官吏來管理，他也許根本就鬧不清這工作的意義。再不然他就要一個狂熱型的人，弄的福利的幻象破滅，反發展了敵意的感情，再不然就是以軍事化辦法侵入福利運動，把這運動的救濟與抵償痛苦的功能，完全毀滅。

當然福利事業的明顯功能是存在的，一個有效率的醫藥設備本身是好的，裴多汶的音樂演奏會對愛好音樂的人，也是真正的愉快。如果真愛音樂，聽多少次演奏會他都會很滿意，但是他的太太都會感覺這對他是不錯，但是我的孩子還少一件大衣怎麼辦呢？同樣也許大家都喜歡太太或母親能使家庭清潔，管理的很好，儉省，並肯學習烹調，納粹遂把教她們烹調作爲福利事業之一，但如果婦

女心中充滿了敵意和忿恨，你教的再好，她們也不會烹調的好。

再說好廚子總是希望有值得烹調的好東西給他烹調。甚至一個愛好音樂的人，他也覺得如果吃過可口的飯之後他就更能欣賞一曲交響樂。（至於聽納粹法西斯的黨義演說，就更不必提了。）

我們承認福利制度如不與減少貧窮與工作過度的要求抵觸，牠仍可使人產生愉快，並可有被救出痛苦，保證安定的效用。

不過我們也還不能證明爲了獲得文化與衛生的享受可以使人類永遠願意被褫奪了權利。督勵一個人，忍受一時的緊張，爲了正當的目的，爲了達到他希望達到的成功，是可能的。使受不斷的壓迫，却作不到。有創造能力的藝術家，爲了畫一張畫，寫一首詩，願意挨半天餓，但不是一切人都會如此。許多青年爲了學一個什麼課題，可能不惜一切犧牲，但那課題要是他自己選擇的，他追求牠到多深，也要隨他的高興。看見一件好的東西，往往是使人希望看見更好的東西，沒有一個人能滿足於：「你只是一個工人。」——這對你已儘夠了！——在衛生上也是

一樣。一個母親由一個有名的醫士教給她如何撫養她的嬰孩，於是她變成了一個，好的，健康的，愉快的孩子。不過她之不希望她的孩子被殺在戰場上，和一個有病，行爲不好的孩子的母親之不希望她的孩子被殺在戰場上是一樣的。如果撫育好了爲了被殺，對她還有什麼意義？

能幹的家庭主婦比一個無知的懶婦能夠把錢用的更得法，但她却不見得比懶婦不重視錢。俗語說力量可以產生快樂，其實也可以翻轉來說，快樂才能產生力量。

只有在有秩序的家庭中才能產生正常的意見與感情。在有權自由選擇自己職業的英國，我們可以看出來不同的家庭典型是如何影響着青年擇業的志趣，沒有秩序的家庭常常使其子女走入紀律嚴格的機關，例如軍隊。他們所以願意如此，是想由那裏獲得他們所未經過的紀律生活。卑微而能幹，一生與貧窮奮鬥的雙親，則給英國造成了不少工黨的大小領袖。「我母親那樣好那樣不自私，却勞苦了一生，讓那些資本家們下他們的地獄吧 我們要給我們的兒女創造一個好的世

界？」在一個沒有自由的國家中，雖表面上沒有這類情形表現出來，但這一切是依然存在着。

今日的德國青年都生於經濟不安定，社會無秩序的時代。父親常常失業，母親長年在窮苦中掙扎，第三帝國的鐵的秩序與紀律對他們自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牠把他們這些新一代的人，由一種訓練環境換到另一種訓練環境，使其益大。至於他們能否不逃避紀律與服從，却是另一問題。

不管那訓練如何完備，青年如何熱心的吞下去了他們的宣傳，但是這些青年成爲德國的工人時，早晚一樣要感覺忿恨，不過這感情不一定立即引發社會變革的要求。因爲新一代的人與老一代不同，他們不會有反對政府，反對自己過去的狂熱的自然反應，他們沒有關於過去的記憶，沒有被壓抑了的理想在心理上掙扎想實現。他們的敵意會不會在政治方面求表現，則要看他們的個人環境與所接觸的人而決定了。我們前面曾說過德國兒童到倫敦參觀，對海德公園，公開反對政府，的講演者非常感覺驚異。那時納粹統治德國方只三年，德國的孩子們，已不知

世界上還有言論自由存在了。斷絕了一切世界工人運動的關係和工運的知識與經驗的積累，在未來納粹法西斯社會中，想找到實用的政治表現與反抗感情，自比較不易了。

就是在像英國那樣的民主國家中，也有許多極貧苦充滿忿恨的失業者，他們並不想以有效的方法反抗，如參加政府活動。他們本可能打開那使他們痛苦的枷鎖，但他們却不那樣作。因為這種失業的人，有一種犯罪意念在內心上打擊着他。倒是那些有工作的人，因為受了不公允的待遇或未得到應得的報償，反而易於採取反抗壓迫者的行動，這原因就是他未自感犯罪，而自覺「我已作了有用的工作，所以我不錯」。

還有英國的失業者多半在威爾士及東北部鄉村中，他們移向他處的可能性都很少，即或用腳走，買皮鞋也要錢，在鄉村中他們的反抗可能性也減少了。如倫敦是位於礦區中心，那牠所要遭遇的社會問題就會與現在所面對着的要不同。因為大城市工廠才是新的破壞性思想的發源地。在大城市大工廠中，人才能變成了

無名氏，才能有私生活。工作的地方，住的地方，由工作地到住所的途中，一個人生活的地點是兩個到三個，遂不像小村小城中每一個人的生活別人完全清楚。這樣結社，開會，讀禁書才有可能。地窖樓頂甚至連印刷機都可以藏。有這環境，失業者，由「熟練工人」降作「粗工」的不滿意工人，才不會完全失望。有了別人的鼓勵，他們遂可表示不滿與反抗，有了同志與支持的人，他才感覺反對現存制度的正確。

同時，在都市中，當局也成了無名氏，而不像在鄉間攻擊一個鄉紳保甲長。他們的行為可能很好，為一般人所共知，或者他們有短處也有長處。再不然他們雖不好，可是他們的父母祖父母却為全村所敬重，這都增加了攻擊的困難，在城市他反抗的是「富人」，「雇主」「警察當局」已不能算是一些「個人」了。汽車，洋樓，銀行，大公司，警察制服是他看到的所要反對的代表物，而他也可以把他們這些人當作在報上看到的他們那一階級中最壞的人看待。

所以現代的都市以其大，以其混亂，以其環境的強烈對照，遂使反抗不滿的

組織成爲可能。而農村以其簡單，遂使政治宗教的反對派都感頭疼，而農民受壓迫比工人不易形成反抗，也是爲了這種原因。

大都市既有上述的危險，所以極權主義國家遂對這一切都預行防備，德國納粹官吏可任意闖入人家，至少對工人的家庭可以隨便出入，到處是警察和特務，一切都在監視之下，整個的社會都被分區組織起來加以管理，大家都猜疑，是不是就在某一角落裏，便有人在那裏負着監視並向上級報告的任務，或者他就是上級的人物而爲最高領袖的代表，不過這也沒有什麼效果。

過去在羅馬，巴黎，倫敦，聖彼得堡的民衆。幾世紀來，也曾爲他們的當局害怕過，國王們在首都常常賜給民衆麵包，酒，請看馬戲，以期欺騙並撫慰他們不要作亂。到今天不過把這種工作更好的組織化，系統化並使牠成爲不間斷的努力而已。不過這種機構和使用這種機構所需要的高等智慧與訓練，早晚也就是使他們失敗的因子。他們所用的方法，就會是使他們失敗的方法。例如獨裁者獎勵人民對軍事的热情，目的在注入一種作戰精神到日常生活的奮鬥中。告訴工人他

們的工廠就是他們的戰場，他們在廠中工作，也就是在戰場上作戰，目的是在使他們感覺工業工作上的艱苦，是光榮而且不可避免的，因為在納粹法西斯國家中以參加軍隊活動爲人類至高的光榮。這種觀念的聯合，在蘇聯是有用的，因為蘇聯工廠中要求工人努力，是爲了戰敗貧窮與無知，那確是改善工人生活的偉大企圖的一部分。最愚蠢的人也知道如果他們生產了更多的商品，全社會將蒙其利。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這關係就不同了，商品的增加，可能只是造成貨價下跌，削減工資和裁汰工人。

所以獨裁者把工作與戰爭結合在一起能否收效是大可懷疑的。在並不是每個人都需要服兵役的國家中，或有人樂於獲得作軍人的經驗並以從軍爲光榮，再不然軍隊的本身目的在訓練組織民衆，使在未來的生活中變爲最有價值最有力量的公民，像蘇聯就是如此，這樣以工業前線比作戰場，自是很響亮的宣傳。如果一個國家每人都被逼服兵役，這時把工廠工作也與戰場的觀念聯合起來，却是弄錯了。因爲那本來只恨服兵役的，現在都會連生產工作也恨起來。一個會作納粹黨

員很久的人會說過：「兒童爲了狂熱的崇拜希特勒而加入軍隊，結果是爲了恨那生活而離開」！即或不是對軍隊感覺不快的人，也會是感覺軍隊原來跟工廠一樣的壞的人多，而感覺工廠原來像軍隊一樣好的人少。舉極端的例子說，他們會把這觀念發展爲如果有戰事發生，也許可以給他們一個機會可以把雇主用槍自背後把他打死，而當前的工資太低的事實；或者會成爲證例，而把那整個的制度變成不愉快性質的東西。

戰事如果真發生了，自然除了想乘機推翻政府的人而外，其他的趨勢自都受到了阻礙。甚至爲了愛國家民族的狂熱而有利於獨裁者，不過戰事一延長，這種宣傳的魔力也就消失了。

事實上，特務，警察等在納粹法西斯國家中，似乎已有反納粹法西斯的活動成爲不可能。最後我們有什麼理由能認爲反納粹法西斯活動在各該獨裁國家中仍會有效呢？

我們知道美國工廠中也顯然充滿了特務與情報員和工賊，當過去的不景氣時

代中，在紐約如被指爲反政府，和今日在柏林所受的恐嚇也差不多。任何人如被認爲有赤色嫌疑，所受警察與大企業代理人的虐待，和在今日德國集中營的情形也幾乎一樣。但是這並未能阻止了新的「工業聯盟」的產生。自然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土地，那些人自幼並未受「服從上級是他們的義務」的教育。但是他們却受過基督教理論的薰陶，那理論會告訴他們社會不協調是可怕且可恥的，生活最重的事是弄錢，可見教育與高壓效力也有限。

十九世紀末葉俄國的教育和今日德國的理想差不多。學校的課程漸漸限制到只可研究枯燥的古典學科，以免不穩思想的傳播，窮人根本不能受教育。俄人要學科學的，（經濟更不必說）必須到瑞典巴黎或其他外國中心區去學。沙皇的祕密警察效率極高，一代一代的人被充軍到西伯利亞，但叛黨當時在俄國之多也是史無前例。政府是太無能了。列寧被捕之後，在獄中竟能很活躍的從事革命宣傳。正是因爲壓迫的兇，民衆才都歡迎革命觀念。在政府寬大的國家中往往很少民衆願走極端。愚弄，使爲文盲，充軍，籍爲奴隸，殺，都未能挽回俄羅斯帝國

的命運。

德國人雖不是俄國人，在某點上看，似乎他們比德國的民衆很能容忍紀律與干涉，不過德國歷史上也有過多少秘密會社和農民暴動。在拿破崙征服下的今日的第三帝國、秘密會社像蜂窠那樣多。接受嚴厲統治並不能證明他們的個性柔弱和平。正相反，他們之所以歡迎那統治，只是因為牠可以使他們和他們在潛意識中所害怕的破壞性的攻擊力量相鬥爭。今日的壓抑技術是很進步了，所以反對黨的技巧也不能不高明。最後獨裁者只給留下了很少的太平門。於是那積鬱的忿恨將在最高的壓抑下爆發。抵抗壓迫的表現可能是歪曲了的，或改裝過的。也可能很長期採取與政治無關的形式，甚至在當局威脅之下，出以擁護他的形式。不過在現代工業國家中改裝的感情的真實形式很快就會顯露出來，至於是什麼形式則是要在將來決定的了。

至於納粹法西斯國家內部的不安已是顯然的事實，二次大戰前倫敦泰晤士報記者即曾報告過，當一個前納粹出賣了反政府黨的奸細被暗殺之後，旁邊總有人

民法庭宣告處死的紅色通告貼出，由此可見德國在納粹統治全盛時代，地下反政黨的活動也極活躍，而這也正是納粹統治的最大危機之一了。

第十五章 納粹法西新國家的知識恐慌

我們估計納粹法西新國家前途的可能性時，我們還應當注意的，是在那種制度下國民所能有的知識問題。經濟國家主義也好，非經濟國家主義也好，他們一定需要輸出商品與隣國競爭，於是需要商業方面的才能與發明。還有基於其立國的意識形態所形成的結果，從事廣大的備戰與戰爭也需要種種知識與技巧。只有廣大的可耕的土地，衆多的富於侵略性的民族，勇敢，精力富足，沒有與日俱進的知識技巧，現在已是既不能產生財富也不能打勝仗了。

現在人人都承認，一個國家一定要能產生發明家，組織專家，軍事領袖，至少有的敵國那樣優秀，才能與其敵國抗衡。但他們還未注意到現代的工業也需要有知識的人員的補充。今日的機器工具是只有有知識的人民才能應用。壯而蠢的勞工已漸少需要了，除非是在工業落後的國家中，才仍重視他們。現在甚至連半熟練的勞工也已不受重視，因為能像機器一樣工作的人，用機器代替了他們，

一定更爲經濟。用六個人在那裏作轉遞工作，設一部機器用一個人管理至少可以抵的過那六個人了，今日之仍以人代機器用，一是因爲心理的懶惰，二是因爲缺乏設備的資本。

近年來世界上機器應用的發展之所以未達極峯，有好幾種原因。第一世界經濟不景氣，影響了像美國這種先進工業國家，使他們改良工廠設備與實驗緩滯了下來。因爲機器再發展，將更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失業增加。德國一工廠中雖作到了除非必要用手作的工作之外，其餘的一律用機器，但仍未能作到更廣大的應用。再則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管理，竟出人意外的，多未能注意到節省重複工作。不過今後各資本主義國家把人當作機器用的事一定一天比一天少，而人則將具有相當的知識技巧，不只會不斷的改進所製造的東西，且將改進所用的工具。甚至在農業方面，在軍隊中也是一樣。在這次戰爭中我們已證明熟練的技巧需要受過一般的普通教育，男女都須經過短期的訓練，才能派遣去負擔各種不同的工作。各種工作中的人員其完成使命的能力，當依其所受教育之多少而不同。許多

工廠廠主現在也已多肯承認。現代機器的進步要靠了現代工人教育的進步了。

因此納粹法西斯除非能產生不只無量數的發明家、科學家、組織專家，還要大批的熟練工人，且須與其他國家產生的一樣優秀，才能在世界各國的競爭中，不至落後。但是在政治刻板化的國家中是不可能訓練出來這些知識專家與技工的。

現在納粹法西斯國家仍有過去政府訓練好的思想家、勞工可供他們應用，但對這些人他們也是漫不經心的把他們浪費掉了。他們的卓越的科學家，教授為政治的原因都逃亡出來了，這是無可補救的損失，而且是損失在與日俱增。這些優秀份子，本人走了，家屬也走了，他們所起的鼓勵與模範作用也消失了。德國這個科學的進步為舉世所羨的國家，現在已幾乎不為人注意了。這種缺陷決非短期內所能彌補。這次大戰前我們已聽見了德國學生埋怨其教授的低能。（且其上課時間常為遊戲與宣傳所代替）而他們的科學教授則在埋怨不許用錢買外國書，至於德國自己出版的書則是全無價值。但這種埋怨是一點結果也沒有的。

在商界金融界，軍界中人材的缺乏還不很顯著，因為有許多雖也反對納粹法西斯政權，但以地位比他們的意見更重要的關係，仍在爲希魔服務，但是他們是會死的。後繼的人都不知道在那裏。蘇聯就會遭遇過這種人材的恐慌。曾聘來大批的外國人來訓練他們的人民。德國是以亞利安種自居，亞利安種是世上最優秀的人種，自不會請外國人來訓練他的人民！

納粹法西斯國家把自由與世界交換思想之路割斷，在這種情形下，他們的國家將產生一些怎麼樣的本國人才呢？他們的前途似乎不很光明，在一種階級制度中，換句話說就是一個降生在怎樣的一個社會階級的家庭中，於是他應受什麼教育將有些什麼機會被決定了，這是最妨害知識人才之養成的了。現代一般的意見都以爲在產生智慧人才這方面，遺傳有的極大的關係。再者即使一個人人生來並不愚蠢，但受了愚蠢的教養，也會把他毀掉。有許多有智慧的人因爲受了環境的阻害，心理上的妨礙，以致不能充分應用他的智慧。事實上人類大約很少能夠充分應用他們的智慧力量，不過人不能比他生下來所具的智慧更有進步，也是沒

有問題的事實。於是限定只有生在某一階級家庭中的孩子才是能輪得到訓練或為知識份子的人的辦法，就等於把「國家造成人才的資本」投到海裏邊去一樣，因為人類的歷史早經證明人類的才能是沒有階級限制的。還有科學的進步，一般說來不只要靠了人的天姿，環境也很重要。有研究的團體生活，有先知先覺的領導，經濟不成問題，自然會產生出來人才，貧窮當然是養成人才的障礙。英國的兒童能夠由小學一直讀到大學畢業的人就很少，他們為了吃不飽，睡不夠，父母供給不起，或自己感覺應當早找到工作，以減輕父母的負擔，在這種情形下毀壞了的人才也非常之多。

在資本主義的國家中，人的才能與技術並不被視為國家的財富而予以注意，也不會為了社會的利益而予以訓練，並帶着感謝的心情雇用他們，每一個人都要等着有了職位出缺時，去競爭取得那職位。在一個國家中，其教育制度主要的是為了某一特殊階級而備，不願意有低下的人家子弟來與他們競爭，自不可能避免上述的情形。像在蘇聯，人人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權利，人人都有獲得工作的權

利載諸憲法，其情形自己優於英國。不過英國却仍優於極權國家。因為極權國家根本要使勞工階級永久無知永久貧窮。德國大學會限定只收二萬一千名學生，入大學的學生一定要經過種種體力試驗。如射擊、足球、競走等，不能及格者不準升入大學。受大學教育的機會都很少，人才養成自極困難了。

還有在極權國家中，學科學的人須感覺自己已是一個貴族階級。自然而然的成了一個上級人物，他的話需要特別注意領受。這情形自然的阻害了一切青年的自動性，研究心，使天才屈服於嫉妒的前輩之下。使國家的人才難於產生。

很顯明的，科學需要有使智慧發展的環境。科學家必須能自由搜集一切事實，只要有關係而不問當時有用或無用，應否承認。或已否證實。然後根據那些事實。他可以依其思想自由演繹而不必問其含意如何。此外因為人不是上帝，每一假設皆可引起來反對。其他的科學家應有自由加以批評。甚至偏私的攻擊也應允許。這就是說爲了科學的進步，不能爲了什麼信條什麼人，對科學研究加以阻礙。在領袖至上主義的國家中，這自然也是不可能的事。

有人也許反對這種說法，而認為科學家所需要的只是他所研究的主題範圍內的自由，納粹法西斯也許可以允許在各技術團體內，有關於技術的自由。這問題且放在一旁，我們知道一個有專門研究的科學家，對政治的見解，可能非常幼稚。在日常生活上他會非常不科學，沒有忍耐心，不講理，自私，不能合作。常常會非常反動，藐視無知民衆，再不然就是一點社會意識也沒有，只要能有所需要的工作給他作，一切都可以同意。這類人自然可以在納粹法西斯政府下工作。有不少受過自由制度教育的人，現在仍在爲他們工作，他們只注意有工作環境，其他都不管。

不過納粹法西斯國家所依賴的嘈雜宣傳，已夠使一個科學家恨的了。像那種完全扯謊，反理性，以政治的關係干涉科學信仰等等毛病，即使他們是承認了獨裁政權的，爲此也會變爲漸不信任。也許物理學家、冶金化學家，爲了其技術的性質與政治無關，可免衝突，但是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組織專家以及與這些科學有血緣關係的工作者，不能不發生衝突了，這種學者除非得到某一有權

勢者的保護，他是沒有研究自由的。什麼樣的保護可以給一個真的大思想家呢？所以這種學科的研究如被允許，一定也會被限制於抽象的不實用的方面，否則即須有利於納粹法西斯主義。但是像納粹法西斯國家的經濟問題，實在很容易解決，尤其是領袖是：「我們只需要行動，不需要思想」的，他隨時可以干涉，使研究完全歸於無用。

總之在納粹法西斯國家中自由批評是不存在了。教育一個兒童一生只許信從一個主義，並且以信從一個主義爲他入大學和獲得一個研究科學地位的交換條件，然後再告訴他在你所研究的學科界限內有討論批評自由，這是不夠的。因爲等到給那他極小範圍內的討論批評自由時，他的自由批評心力在長成的中途已受了損傷了。

現代的科學與發明，是在宗教改革與民主政治萌芽之後才展開的，在天主教的長期統治下，人類的自由思想即受了損傷，等到那縛束解除了科學才能滋生。在統一思想的國家中，可說從未產生過偉大的思想家。

有人也許以為蘇聯在政治思想上也是只有一個主義的，為什麼他却仍有極多的科學家產生呢，這我們可由事實上來研究，蘇聯的青年自幼即予以科學的教育並在教導，質疑 批評各方面都予以極大的鼓勵。蘇聯人心目中崇拜的人，達爾文是一個。達爾文他發見某一事實與他所信仰的結論矛盾時，他一定立即把他記載下來。這種精神正在今日的蘇聯中發揚着。不錯，蘇聯的政府政策一經決定，現在即不能再加批評，但在決定之前，却總是展開廣大的討論，儘量容納各方面的建議。「在決定之前你本有機會反對，現在已經決定，你就不能再來反對了。」這態度與根本上不許過問，情形自全不同。在蘇聯的地方政府，是有完全討論與自主的自由權的，在大工廠中，民主國家中工人都沒有發言權，在蘇聯工人却有權申訴，討論，建議，以此與納粹法西斯國家相比，當然不可同日而語。

現代各國教育家所公認的教育基本問題 為訓練兒童；使他們能夠糾正其祖先的誤錯，而不要以威嚇、壓抑、阻害了他們作這種工作的心力。

現代研究人類智慧的專家所得的主要結論說：要使兒童的心力能夠獲得正常

的發展，有兩件事是必要的，（一）不要以邪惡與危險爲藉口，阻礙兒童的好奇心，（二）兒童要求作的工作，不要使他感覺有不可肩負的困難。愈是在幼年時，就愈重要。小動物都生而具有一種應付其生存環境的本能，像很小的鷄雛便能啄食，如果我們不許啄，牠這本能就消失了，以後我們要用很多的苦心教育牠，才會再啄食。兒童的好奇心就是克服困難的力量，父母如加以阻害，將使他失掉了研究的慾望。父母再誘導他從事研究也困難了，因爲過去的阻害已在兒童潛意識中造成了一種恐懼。給兒童的工作太困難了，使他遭逢了失敗，將造成兒童規避的心理，不怕失敗的能力就易養成。還有一要屢說兒童的能力低、長久如此，將使他不信任自己的能力。

再者教育兒童時決不能不具同情心，不了解兒童的困難。以難看的臉色，暴戾的聲調教訓，都沒有好處。一個聰明的兒童受父母的威嚇失掉了自信，將永難成功一件事。

父母教育兒童如一切部憑自己的意志處理，兒童只有服從。叱來罵去，甚至

以兒童作出氣筒，自然也無好結果。父母暴躁，兒童也會要暴躁，父母喜歡壓迫，兒童也將傾向壓迫，父母焦急，兒童也會心懷恐懼。有的父母說：「孩子自然應當服從我，如果他沒作他應作的事，我如何能假裝出來喜歡！」事實上假裝是沒有用的，兒童的感情多半都像父母，他的感覺也往往都依照他父母所說的話。

這種家庭的影響是很難爲了政府的直接而緩滯的影響而有所改變的。還有一個人的智慧能力的自由運用，也會在學校中受教育時受到阻礙。他人學校時本具有一個活躍的，批評的心力的基礎，如果教育是高壓的，一切只能照命令行事，否則重罰，命令且有時完全是違反理性的，於是在學校中他本來具有的優點也會喪失。不過被阻礙了的好奇心工作能力，也許會在崇拜領袖上找到了出路而發洩了他全部的精力，但這能養成什麼樣的人才呢？也許有好的教導，可以成爲數學家，技術家，至多不過如此。

到現在造成什麼樣子的教育環境，可以使不同的兒童都能充分發展他們的智

慧能力，還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沒有定論。但破壞歪曲這種能力却是既不困難也不複雜，只要懲處兒童的好奇心，創造性，和批評精神就夠了。

在納粹法西斯國家中，却以為這並不成問題，因為一切思想都是自上而下的。至於下一代的納粹法西斯領袖們——自然都是選擇出來的堅韌如精鋼，迅速如鷹隼，忠於黨，具有有勢力的背景的青年——無疑的也以為不成問題。因為他們自己也不是具有什麼能力的人，這樣下去什麼也都會以為不成問題了。

不過這種日趨衰頹的表現出來是需要較長時間的，德國過去重視學術的風氣甚深，所以納粹政府雖然忽視知識的研究，德國的國民，私人間大約還可以把研究學術的精神保持一個時間。爲了追求所謂「光榮」，大約納粹政府在德國能感到人才成問題之前，牠自己已被粉碎了。

第十六章 · 戰爭促成納粹法西斯政權的崩潰

獨裁者的掌握政權不會長久這一問題，到此為止，我們已解答的不少了，在人民以對待父親的心情對待獨裁者，並差不多像崇拜偶像一樣的崇拜他們時，獨裁者却以民衆當作發財和博取光榮的工具，以爲他們是無告的孤兒一般的虐待他們，這不只不配算是一個好父親，就連過去時代的帝王都不如了。過去的好帝王自己要求享受之餘，還可以注意到民生疾苦，重學術，提倡教育，在中國歷史上，這種好帝王那一朝代中都會發見過，就是壞的帝王，其昏庸自然增加了民衆的痛苦，但以那時候的社會組織與科學發明都沒有今日這麼進步，所以民衆的痛苦還不至像今日納粹法西斯國家那樣嚴重。現在納粹法西斯治下的民衆，不只每一個人的職業要受到獨裁者的干涉，甚至生活觀念也要受到干涉，而且什麼都沒有保障，因爲一切只有靠獨裁者的一時高興。他自己的主張可以改變，一個機關也可以忽然改變，這都是憑他一個人的意志祕密決定的。民衆今日睡下，明日他

的環境會變得什麼樣子，沒有一個人知道。什麼人能長期安於這種樣子的生活呢？

而且在這種環境中，對獨裁者自己，也一天比一天不利。不許批評，有了錯誤只有他自己發覺，否則沒有一個人敢向他說。他不會有朋友，墨魔就說過，沒有一個人可以算是他個人的朋友。一切都是他的下屬，就是有歷史的僚屬也不敢多說話，（一）是不知道他當時的喜怒如何，說不定會招來大禍，中國俗語說：「伴君如伴虎」，伴納粹法西斯領袖，實在比伴虎更可怕。（二）有歷史的僚屬不只一個，相互之間還有傾軋，多說話就會得罪同僚，或被當作被攻擊的罪狀，所以每一個人都會凜於「多言多敗」而噤若寒蟬。至於新幹部，獨裁者根本不易接近。有歷史的僚屬雖相傾軋，但在杜絕後起接近他，却完全可以合作，因為這是關係着他們的共同利害的。獨裁者接近新幹部，可能把他們全部貶入冷宮，這非他們所能容忍。

在獨裁者所能接近的人當中，他所將得到的是什麼呢，只有逢迎與諂媚。他

的錯誤也是絕對的正確，這樣就更養成他的自以爲是。肯逢迎諂媚的，當然不會有什麼好人，所以最後獨裁者一定陷於宵小包圍之中。和古代帝王完全一樣，弄臣女寵將是他最接近的。在中國宦官、外戚、斷送一個朝代，史不絕書，那正是一個專制帝王的環境，造成他必然要蹈的覆轍；帝王年紀愈老，以精力關係，愈願少問事，愈厭煩一切，宵小愈有機可乘，所以帝王愈老愈昏聩，這情形獨裁者也不會成爲例外。因此即使納粹法西斯國家不遇到什麼外來的因素使其崩潰，這內在的人民的不堪壓迫與他自己的被包圍與日趨昏聩，也會引發崩潰的危機。

在歷史上昏聩的老帝王，往往是大興土木，窮奢極慾，任意殺人這都是造成混亂的因子。而最使帝王不放心的是軍人，愈有功的軍人愈感自危，所謂「功高震主」，不是他被殺就是他奪了帝王的政權，在納粹法西斯國家中，這可能也一樣存在。一個高級將領向由小納粹法西斯黨徒組成的軍隊說：「領袖現在被宵小包圍了，那宵小都是外國派來的好細，我們要救他出來，來啊，跟我來救領袖！」於是獨裁者落到了一個將領手中，胡裏胡塗他死了，然後再由那將領出來說：「

領袖不幸死了，他遺言叫我向他效忠，繼續承他的遺志保衛帝國的光榮，這是我義不容辭的，帝國萬歲！於是一頁歷史翻過去了。即或不是如此，獨裁者平平安安的死在楊上，（人不幸總是要死，獨裁者自亦不能例外）雖然他指定了第一第二繼承人可是在他死之後，繼承人之間的對立，民衆的反對……總之納粹法西斯國家即或環境順利，他們的前途也完全不容樂觀，在國際間和平的經濟文化競爭中，他們將變成落後國家，在國內也決不可能長久安定。

現在是事實上他們遇到了戰爭。遇到了他們雖然天天在喊着準備，而心內實在很不願意牠發生的戰爭。納粹法西斯政權的壽命，自然比我們想像的要短多了。

戰爭將葬送了納粹法西斯政權自經濟政治的觀點來看，是必然的，世人討論的已經很多，本書的中心在由心理的觀點來觀察，所得的也是同一的結論。現在我們即在心理這方面再略作一些解說，至於經濟政治方面的說明超出本書範圍之外，且市上一般讀物涉及經濟政治方面的探討極多，自可無庸多贅。不過心理也

是不能與經濟政治分割的，所以從心理方面研究，仍未離開經濟政治的基礎。

從心理學的立場來看，戰爭帶給納粹法西斯政權的也不只是單純的有害的一方面，也仍有有利的方面。不過利少害多，並且害的方面因戰爭時間的拖長，（即使不一定戰敗的話）也將與日俱增；如果戰爭再是節節敗退，那害的方面，更會有無從估量的增長，最後終於造成獨裁統治的滅亡。

先論利的方面，這次世界大戰雖全由納粹法西斯政權一手造成，但在德國一般民衆心理上，在戰爭發動後，他們大半不會再能理性的意識到這問題。納粹法西斯的宣傳却反得到了他們最有利的機會，猶太人，共產黨，國際金融機構，外國的蛇蠍果然聯合起來向第三帝國，義大利帝國，大日本帝國進攻了，這敵人力量的強大，每一個軸心國家的人民都會意識到，凜於覆巢之下無完卵的教訓，他們一定會：原本忠於獨裁者的加倍的效忠；原本有點動搖的，變爲堅定；根本反對的，也認爲環境惡劣，只好暫時蟄伏，待機而動。這時獨裁者更可利用宣傳號召團結，加強統治，高壓與蒐斂，平時需要有所顧忌的，現在都可放手去作。民

族意志，國家光榮的口號，自更能響亮的成爲幸福的代用品。如果再能時有勝利消息傳來，納粹法西斯政權的環境，一時可能比平時更爲有利。德國的無窮勝利，如使法國屈膝，把英軍逐出歐洲，東進一直打到莫斯科的門邊；美國的分得使法國屈膝的光榮，進佔非洲英屬索馬利蘭，侵略希臘；日本的席捲南洋羣島、越、緬、泰、諸地。都會大大的造成德意日領袖的聲威，同時却也大大的增加了三國民衆的負擔與痛苦，但是光榮的成爲幸福代用品，一時相當的淹沒了民衆切膚之痛的感覺。

不過好景不長，而時間是最無情的，納粹法西斯國家第一步就遇見了經濟的難關，更由經濟而入於政治的難關，德義日以其本身傳統的不同，在這難關中所得的結果自亦不能相同，但是痛苦是一致遭遇到了。軸心中最有力的一環，德國，以其民族傳統各方面的優長，仍不能不感到了物資的缺乏，人力的恐慌，（除了戰爭的死亡，因生活痛苦而表現爲消極厭戰——怠工，也是一個原因。）消化侵略贓物的不易。先天即較德國爲弱的日義，自感到更大的困難。所以盟國的由

敗退轉爲能夠與敵人相持，更進變爲反攻，與其說是盟國在軍事上的勝利無寧說是在經濟（物質人力）政治上已先取得了勝利；而軸心國家的敗退，也是在軍事上失敗了，軍事的失敗只是經濟政治失敗的事實表現而已。

戰爭是最大的消耗，物資人力都較平時有不可估計的損失隨着時間增加。納粹法西斯政權，本寄託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上，在平時獨裁者對資本家的態度是放任他們壓榨勞苦大眾，只要對自己恭順。在戰時自仍然是如此，甚至爲了獲得資本家的支持，對他們比平時更要讓步一些，於是資本家在戰爭中發財遂成了必然的結果。資本家愈發財，民衆自然愈痛苦。

在平時，民衆的生活在納粹法西斯個家中，本已極爲艱苦簡單，隨戰爭而來的定量分配，更使民衆生活降到水平以下。戰爭愈延長，這種痛苦也自然隨了物質的缺乏而增加。德、義、日的官吏的貪污，也隨着戰爭日甚一日。三國的黑市猖獗現象，正是資本家發財，官吏貪污，民衆痛苦的最好表徵。

納粹法西斯政權下，人民本已沒有了任何自由，到了戰爭使他們的人力缺乏

日甚之後，人民在獨裁者眼光中，更是比機器都不如，要任他毫不愛護的役使。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德國發表了全民動員令，要求從十六歲到六十五歲的男子，和從十七歲到四十五歲的女子以前不曾參加每週四十八小時工作的，必須接受任何派定的工作。獨立的營業，不准有五人以上登記。所有商業公司店號、凡與民生直接無關者，一律停業。德經濟部長芬克在一九四三年五月說：「由於零售商店和工匠作坊的封閉，已有了一百萬工人參加軍火生產。」在戰時工廠裏工作時間，事實上都超過十小時，大多是十二小時，例外的更須作到十六小時。人民在這樣被壓迫役使的情形下，其痛苦當然可以想見。

生活到吃，穿，工作，都受到極度的限制，再加上盟軍飛機的轟炸，前線的潰敗，更重要的是家屬鄰居在前方的死亡被俘消息頻頻傳來，說全體德國民眾都已爲此而心理上發生不安，或者是誇大；說全體德國民眾都不會動搖，那就是希魔自己也不相信的。

隨着戰爭的失敗，戰事的逼近本土，根本反對納粹法西斯的，老一輩的，有

政治組織的份子，將漸漸開始活動。此外老一輩中本來對獨裁者就有點不滿的，遂可能成爲接受反對宣傳的對象。但是因爲納粹法西斯的特務制度的可怕，逐漸抬頭的堅定反對份子一定會遭獨裁者的毒手，甚至因莫須有的罪狀而被處死的也會不少。德國的報紙和無線電台在一九四三年下半年中，每天幾乎都要報告六七件或者更多懲罰不法之徒的案件，爲了表示德政府對於違反戰時紀律的行爲，處罰的多麼不留情。上西里西亞的興登堡城有個名叫密台的銀行經理，因爲他的談話「沒有能夠給他的職員們作出忠於希特勒的榜樣」，竟被處死刑。（見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八日時代雜誌「納粹的死症」一文中）這種壓迫使許多民衆心理上雖已形成反對的人，爲了怕納粹法西斯的兇殘，也仍不敢表現，但改裝出現，與歪曲了的表現，是一定很多的。據說德國工廠中工人工作能力日見衰頹，婦女常常在機器間暈倒。工廠內請假者日衆，不能不制定新規章，私人醫師簽發的證明書請假無效，必須工廠或政府的醫師證明方生效力。柏林交易所新聞會刊載：「有一個醫師在一年內曾爲一萬五千個病人簽證明書。」（見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八

日新共和國週刊所載：「今日德國内幕」文中）又因爲安眠藥和興奮劑在社會中暢銷，德當局已下令禁止售賣。還有由蘇聯戰場上我們知道了納粹的士氣已遠非昔比，西南太平洋戰場中日本士兵也不是寧死不降了，在這裏面我們也可找出來納粹法西斯統治下人民心理變化的明徵。

就是所謂新一代，自然應是納粹法西斯政權深所依賴的力量。因交換戰俘而得回英國的六十二歲老牧師格倫第說，有兩件東西在推動德國作戰，祕密警察和希特勒主義青年團。他又說「希特勒製造了希特勒主義青年，這種青年在統治德國。這兒有一個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叫俄國人佔領普魯士三個月，我想三個月就足夠把事情辦好了。」（見納粹的死症）這老牧師的辦法且放在一旁，他之恨希特勒主義青年團，可說明今日希特勒創造的新一代，確已在起着作用，不過同時我們也由別的報告知道了新一代中的不穩情形。據說慕尼黑和其他德國大學中曾發生「學生陰謀」。德官方公布已有十七個「陰謀者」判處死刑，多人判徒刑。學生的罪狀是製造反戰宣傳，印刷並散發鼓吹停戰推翻現政府的傳單，並擬

在戰時工業中組織怠工團體。這種青年都是由十至十二歲起就受納粹教育的。這種青年的行動已可證明希特勒的辦青年團是妄費了心機，而證明了我們論新一代的結論的正確。不過我們也應認清這類青年在德國當然還是少數。在標準化的教育下養成的新一代，一定要真到有一天蘇聯佔領了普魯士，大約他們才能大多數都覺悟過來。在現在，他們仍能在希魔的指揮下爲他效死。

義大利的崩潰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說明一個獨裁政權的崩潰。戰爭帶給民衆種種痛苦，抹去了他們的光榮幻象，地下的反法西斯政治組織存在着由墨魔被推倒之後，都靈等地示威運動可以證明，但在墨魔未倒之前却在法西斯特務魔掌之下，組織不成推動反法西斯的力量，結果推翻墨魔的還是軍人——巴多格里奧。在德國日本當然不會與義國完全一樣，但到盟軍真正接近了德、日、本土時，依然是由一種民衆的政治組織起事推翻希特勒東條政權的可能，小於由資本家軍人聯合起來推倒他們向盟方投降以求自保的可能。因爲在納粹法西斯高壓下，民衆的組織幾不可能，而資本家軍人聯合犧牲一個獨裁者，却相當容易。一九四三

年八月號的「戰時世界」雜誌中，載有「歐洲最危險的人物——沙赫特」一文，指明沙赫特已由德國的金融工業巨頭與陸軍領袖認為是向盟國妥協，以期再捲土重來的適合人物，日本自也不缺少這種人物。如果第二次大戰是以巴多格里奧、沙赫特，牧野伸顯或幣原喜重郎之流出場，而盟國竟亦認為如此即算結束，那結果所將引起來的德義日人民心理上的影響，等一在後面我們還要談到，現在我們先說在德日這種可能一定在增漲。

德國現在有許多潛在的不利希魔的危機。東普魯士國社黨地方領袖考赫曾在一九四三年下半年簽發過一個告東普魯士國社黨同志書說：「領袖（希魔）已處於危險中，反動勢力打算取消領袖，把德國置於軍事獨裁之下，並且違反民意，立時開始和平談判。領袖寬宏大量，為使陸軍不在這危急時候失掉領導人才，所以對於這些國賊不採激烈手段。你們發現關於領袖任何可疑的事情，任何流言，任何有色彩的或誹謗的言論，應該立刻報告給最近的黨部警察或禁衛軍」（見納粹的死症）如果這文件是真實的，這多麼像在本章之初我們所說的軍人取獨裁者

而代之一的那一套把戲呀！這的確並不是不可能的。在日本我們已知道了中野正剛的切腹，這可說是日本民衆心理所加於他的心理的壓迫的結果，在特殊的封建集團中，日本的法西斯主義應只有這一下場，所以他也許正是東條英機的榜樣。不管被殺自殺、被囚、逃亡，獨裁者之終將成爲他們的政策的犧牲者，大約已無疑問，時間的早晚則將看戰爭失敗的早晚。獨裁者們很明白這一切，所以他們正拼着一切，在作孤注一擲。

希魔的歐洲堡壘計劃，東條的竭力調整軍需工業，在在都說明着他們的掙扎野心未死。不只野心未死，在本書寫作時（一九四四年一月）來看，他們確還都具有相當的實力，雖然他們的敗勢已成，然而盟方距得到勝利也還需要極大的努力。德日本土都還沒有戰事。德日大多數人民的心理在他們的宣傳下，還在受着催眠；有的明知頹勢已無可挽回，但仍懼於淫威不敢不表示服從；有的雖在活躍的作着顛覆獨裁者工作，但展開不易，而且犧牲的可能極大。所以從人民心理來說，也是新焦急正在動搖着他們對獨裁者的信念，轉向以獨裁者爲對象而發洩其

忿恨敵意的途徑中，所以現在的表現，就是前線士氣的頹敗，後方戰業工業效率的減退。這兩種行動是可以不必直接起來反對獨裁者，而一樣可以宣洩其忿恨敵意的方法，德日人民可能意識的這樣作，也可能受潛意識的支配不自知的這樣作，總之這將成爲促成德日在戰爭中一天比一天困難，主要原因之一。只要盟方在政略戰略上不犯重大的錯誤，德日獨裁政權的覆滅，在德日人民由他們心理上自知或不自知的前後方怠工情形下，已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這種可置納粹法西斯於死地的前後方怠工，希魔是很知道其可怕的勢力的。在去年的一次演說中，他曾說：「我既能夠叫我的士兵千千萬萬的死在前方，那麼我也就會毫不遲疑的，在國內把幾百名罪犯和叛徒置於死地。」蘇聯紅軍在前線上還會得到過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希魔向前方軍隊所下的「鎮壓軍隊中的政治犯」手令：其一款爲「我下令在軍隊裏成立中央軍事特別法庭，以便緊急澈查蓄意破壞對政治軍事領導的信仰爲目的的政治犯，這種法庭可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視犯罪的性質而定，案件當立刻就地判決。」（見合衆社駐蘇記者沙皮羅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九日發自

莫斯科的電訊）可見他是如何在企圖以威力與宣傳鎮壓前後方的不利情勢。但是他不知道這不是他的威力與宣傳所能鎮壓的，一種連士兵工人自己都不一定自知的心理所造成的士氣頹衰和工作效率低降，武力與宣傳的鎮壓能有什麼用！

除了盟方的經濟的富足非德日所能比擬之外，德日政治上的弱點造成其人民的對戰爭怠工，也將使盟方穩定的得到勝利。羅素的一七〇〇年以來每次大的戰爭都是由比較民主的一方獲勝一語，在這二次大戰上將再度獲得證明，自己毫無疑問。

但我們站在研究學術的地位上來看，這次大戰，雖然造成德義日失敗的主因，除了盟國人民的努力出錢出力而外，軸心國家的人民的不努力，自也有一部分力量，不過這是未聯合無組織的前後方怠工，他們雖然幫助了盟方，但到最後傾覆獨裁者的工作，却多半不會是由他們組成的團體來執行。因此推翻獨裁者應得的收獲，可能又為在最後投機的人所劫掠了去。義大利的事實已擺在了我們的面前，如果解放的義大利的政府仍是由薩伏亞王室和軍人資家登台接演，那顯然

的義大利民衆的生活，將依然是在剝削壓迫下展轉呻吟。義大利有例在先，德日自可依樣畫葫蘆。從心理學的觀點來看，這是在這三國民衆心上製造焦急，犯罪意念與敵意，又伏下了第三次大戰的危機，因為使民衆心理上痛苦，就是給野心投機者造機會，本書已闡述甚明。盟方全體民衆現在就都在企盼如何能阻止下一次世界大戰再發生了，世界的學者也已都在不同的刊物上討論着這一問題。其實很不必把簡單的問題故意弄複雜了他，只要盟方的政治領袖都能一致的爲世界民衆的福利着想，對真正的德義日的無辜民衆也不存什麼軒輊。不縱容納粹法西斯的每一個罪犯，也不在已被他們蹂躪了的德義日民衆身上去追取損失的賠償，幫助他們樹立真正民主的政府，幫助他們恢復生活的幸福，不再爲他們的心理製造焦急犯罪意念與敵意，世界和平的基礎即可由此獲得。

然而也正是這一簡單的問題，反很不容易作到。因爲一些政治家們的心理太複雜，遂可能使簡單問題複雜化起來，所以世界上不希望再有第三次大戰的民衆，在這次大戰獲勝之後，更不能鬆弛他們對世界問題的注意與努力，不可上

「現在目的已達」的欺騙宣傳的當，否則又將是戰爭雖然勝利，他們所企望的目的却仍失敗了！

另外世界的政治家，也應當在這二次大戰後有所覺悟了。以宣傳伎倆欺騙民衆，在納粹法西斯政權下，總算已運用的登峯造極。但他們終因為欺騙而失敗了。虛偽的宣傳除了在民衆心理上種下對他們的極深的敵意根源而外，只能有極短暫的效用。根本未把民衆的幸福放在第一位，未想以真正的民主給民衆，而想以宣傳掩蓋事實，即或民衆一時因上當而相信，但將來的禍根也由此種下了，希望這本書能幫助他們得到這種聰明。

(完)